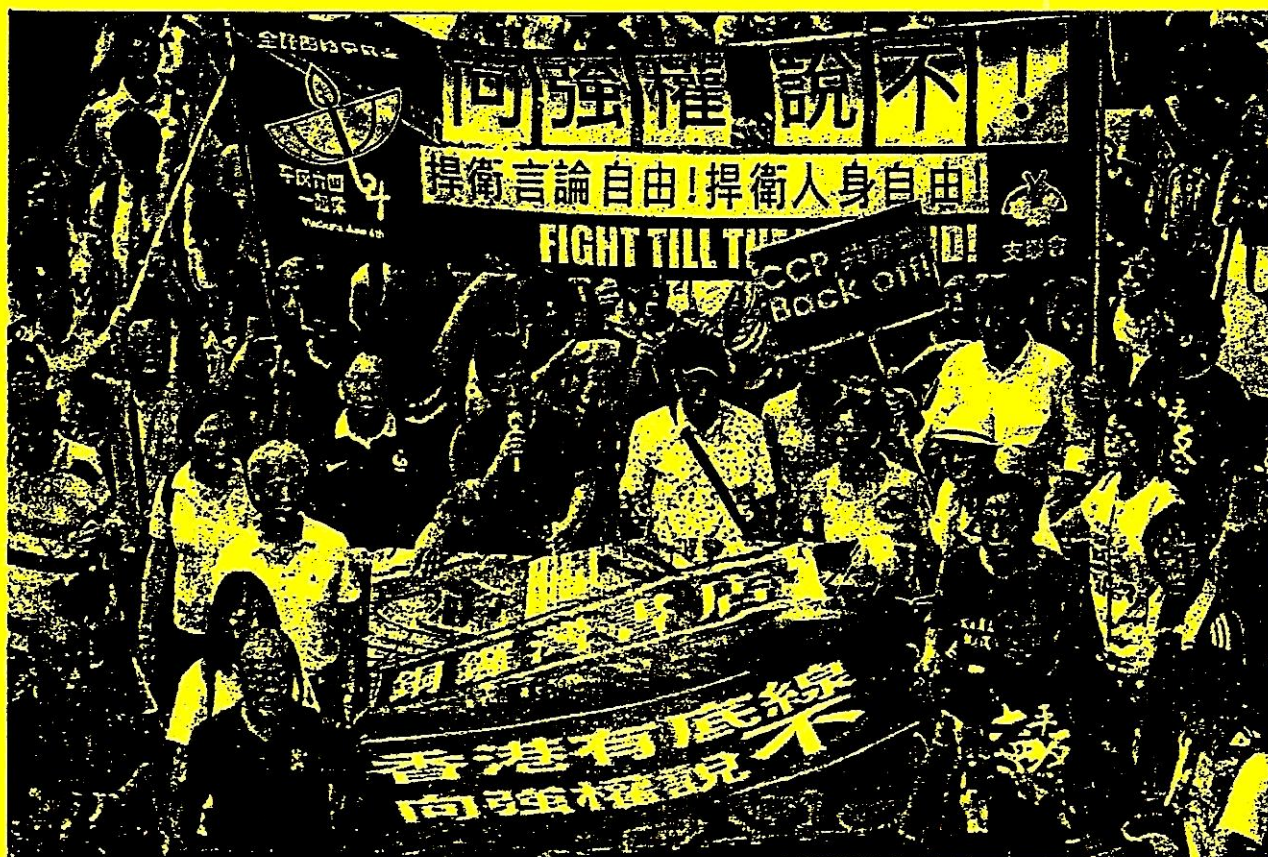




支持林榮基, 捍衛言論、出版、人身等自由!

中國資本主義復活證據明確

中共加強控制網絡

氣候災難逼近!

伊斯蘭國簡史

彭述之: 我的一生經歷憶述

支持林榮基，捍衛言論、出版、人身等自由！

振言

約在8個月前開始，銅鑼灣書店5人陸續被內地人員拘捕、扣押。其中李波是被以購書為名，騙到柴灣的書店倉庫取書時被數人合力強迫他上車，經秘密通道擄到內地，因而港當局沒有李波的出境紀錄。李波原本無意到內地，所以回鄉證等留在家中。這完全是無法無天的越境擄人、橫行霸道，任意踐踏《世界人權宣言》、《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原則規定。在全城震驚、幾乎人人自危之下，北京承認是「強力部門」幹的。

該店店長林榮基在經羅湖過關時被拘捕，扣押8個月後，中央專案組派他回港取購書顧客和撰寫中國政要醜事的作者資料，然後再到內地；但他再三考慮，終於決定不出賣購書者和作者，不到內地，轉而到支聯會與何俊仁開記者招待會，向強權說不，說出自己8個月內在內地的遭遇，終於拒絕大陸的操控，要捍衛言論出版等自由，為六千港人在6月初上街遊行同情支撐他所感動、鼓勵。

判決；如原訴人勝訴，有關出版物便不應再銷售。但如果不動用龐大的官媒黨媒據理力爭，而只靠國家機器橫蠻鎮壓，那只反映黨官的理屈詞窮而已。

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多數人都能夠正確分辨是非曲直，誰是誰非。早在中國當局開始拘捕銅鑼灣書店的人員後，港人便斷定是打壓港人的言論、出版和人身安全自由，侵犯「一國兩制」的原則，因而迅速舉行大遊行，以抗議中國當局，用行動支持林榮基等人。現在，當林榮基返港表示向強權說不後，港人又立即舉行大遊行，以表示對他的堅決支持、雖然兩次都匆促舉行，人數都是六千人，但已算是不少；相信在將舉行的七一大遊行，可能加入聲援銅鑼灣書店、支持林榮基、捍衛言論、出版及人身安全自由等有關訴求，熱望市民大眾能踴躍參加，團結一致對抗強權！

22/06/2016

公安及其順從者指林榮基說謊，指他已對罪行供認不諱，寫了悔過書。但那是在威脅對他家人和女友不利等極大壓力之下，有如肉在砧板上，被強迫簽字的，不應作實。

林榮基責備，中共統治一個堂堂的大國，竟容不下一間小小的書店，企圖摧毀香港言論出版等自由，事件清楚反映中央要收窄香港人的言論出版自由尺度，已經逼到香港人無路可退，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林榮基從而感到義憤填膺，要向強權說不。

香港是法治之都，人人都享有言論、出版、人身等自由。如果被批評者認為有關出版物所言失實，或有譏謗之時，大可以提出訴訟，由法官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3卷第1期（總第240期）

2016年6月30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悼念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在香港

軍行

支聯會今年悼念六四遭遇很多批評。首先是樹仁學生會編委會總編吳桂龍罵支聯會為「龜公鴿母」，連帶也會暗示參加大遊行和燭光晚會的市民為娼妓。這真是下流無恥的污蔑。

其後，中大學生會長周豎峰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以「垃圾食物」比喻支聯會，並指支聯會最大問題是「建設民主中國」綱領、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看法以及對抗爭的規限，認為這些不利民主抗爭，必須反省。（引自本月6日《蘋果日報》）

其實，這條綱領是正確而必要的，與香港息息相關，如果中國繼續在一黨專政的官僚統治下，港人的應有民主自由權利也隨時會被限制。例如，國務院在兩年前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故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及監察權；加上8.31決定，便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來享有權力大大剝奪去了。這反證爭取建設民主中國對港人是必要的。

今年初內地特務越境秘密擄走李波，又拘捕了銅鑼灣書店4人，任意壓制香港的言論出版自由，使香港出版業界人人自危，出版自由大遭剝奪，顯示中國的官僚專政對港人確是很不利的，極需建立民主的中國。

11間專上院校的學生會，集體不參加支聯會舉辦的27周年悼念六四屠城維園晚會和大遊行，而另外合辦討論會，這樣就分散了悼念的力量，不能做到求大同存小異的團結一致，對抗殘暴的官僚獨裁。

雖然遭受許多的困難和打擊，今年的六四晚會仍然坐滿了維園六個足球場和兩旁草地。大會公佈有12.5萬人參加，再次顯示港人27年來的堅持，不離不棄，人數雖比去年少了約一萬，但捐款卻從去年的134萬元，增加到174萬元，增幅達3成，顯示出席港人的更衷心支持。

世界各國的人民包括僑胞，特別是國內的難屬和同胞，都會從港人的熱心支持中得到慰藉和鼓舞，有助於推進民主發展。點點維園燭光都是抗爭。

對於平反六四，港大民意調查結果，有78%年輕人表示支持，顯示市民的六四家國情懷仍然濃烈。這與另外一些年輕人打著「本土」旗幟，與六四切割，藉此顯示內地的事與他們無關等言行，是大為不同的。

前趙紫陽秘書鮑彤的兒子鮑樸，在八九年春夏之交，為北京科技大學四年級學生，全程參與學運，親眼見證子彈橫飛、軍隊射殺學生一刻；十多年前來港定居後，幾乎每年都出席悼念晚會，他對放棄悼念的言論不感難過，只覺可惜。他指香港有表達己見的自由，可以說，但不會成功；因為不顧中國民主，只爭取香港民主，註定失敗。兩地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方面，都是分不開的。

「27年的悼念，是給六四添上光彩。」他說，香港人堅持了27年是偉大的事情，不是爭取了多年沒有成果就放棄，沒有其他爭取平反的方式比六四晚會更好，這也是香港人對中國民主的最大貢獻。他解釋，晚會每年都有十多萬人出席，全球關注，加上晚會每年都教育新一代，讓他們接觸六四歷史，同時提醒老一輩，要繼續爭取民主，「它的最大作用是教育港人，效果不可估量」。鮑樸這些意見是很對的，值得考慮以至同意。

10/06/2016

摸著石頭過河？

大進

今年「六、四」悼念所引發的爭拗，對香港的政治團體，清楚展示了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怎樣去面對中共政權？

廿七年前，中國學生和市民的反貪腐運動風起雲湧。香港學生組織「學聯」和民運人士積極支援，提供金錢及物資，甚至跑到天安門去串連。八九年六月四日，運動最終被血腥鎮壓。「學聯」和香港民運團體成立「支聯會」，希望能繼續支援中國民主運動。

這麼多年過去，部分香港人曾經很自豪。因為在中國境內，每年就只是在香港，仍有這麼多人走出來，公開譴責中共政權的暴行。維多利亞公園點亮的燭光，反映出對當年犧牲抗爭者的思念。不過，這一切都在褪色中。

學聯退出支聯會、十一間大專院校學生會不參加維園悼念活動、學生覺得悼念應有個終結、有學生又甚至覺得支聯會的悼念活動，是欺騙群眾的感情……這些尖酸的批評，都是匪夷所思。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政權並無改變，卻因經濟力量增長，近年變得更跋扈囂張，對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全面封殺。「民主回歸」和「一國兩制」等等建基於一個中國的概念，在2014年，被國務院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和「8·31人大決議」打得稀巴爛。香港人，特別是年青人，失望之餘，否定以往的策略，自然另謀出路。況且香港回歸以來，連番施政失誤，民怨沸騰，又受「強國」自由行旅客衝擊，年青人尋求本土身分，來抗衡中國這個「他者」，是可以理解。

時光倒流廿七年，當時香港人自視為同胞，以愛國情懷去支持中國學生。「愛國」這名義在一般人心目中，有很大的正當性，亦出師有名。但實際可怎樣做呢？雖然當時曾流傳過一些激烈抗爭建議，例如：擠提中資銀行、籌錢買軍火等等，似乎都只是一時意氣之言。而就算是計劃中較激烈的「三罷：罷課、罷工、罷市」，也因支聯會的領導層，恐怕出現騷亂而臨時取消。支聯會綱領之一的「結束一黨專政」，初初提出時亦引起很多爭論，質疑應否直接挑戰現政權。

支聯會能夠怎樣跟中共對著幹？公眾所知不多，稍為了解的，便是拯救民運分子的「黃雀行動」，以及試圖打破內地新聞封鎖。但這些都只是支援性質。或者主流大眾的看法，並未想像要提昇到主體抗爭的領導角色。支聯會以至其他海外民運團體，最可做(或公眾所能知悉)的，便是製造輿論壓力。但在現實政治中，單靠批評痛責和道德感召，又何曾損害政權？

當年青人摒棄上述的路線，究竟怎樣才可取得實質成果？在部分「本土分子」心目中，既然中國是一個他者，沒有需要去關注中國民主化，這應是他們國民自己的責任和取態。不過，香港不理會中國的事情，本土分子是否就可自由地，去建構香港的制度甚至建國？這似乎是將中共的「河水井水論」，放到最完美的情況來看。六四之後，中共亦有藉這個觀點來唬嚇香港人：不要把香港變成反共基地。可惜這個觀點明顯難以站得住腳。沒有人相信中共政權「會」和「要」遵守這個承諾。香港回歸後的發展，亦証明中共沒那麼克制。無論你有否行動，中共怎樣也會伸手進來。

在「大一統」思維的中共政權看來，相對於傳統民運團體，是更難容忍要求高度自治以至獨立的本土分子。誠然，追求政治理想之士，不會怯於對手的強勢，歷史的發展也必定有起伏。在後「雨傘運動」的形勢下，一直以來和理非非的議會抗爭，像顯得蒼白無力。不過，部分本土分子提出的勇武抵抗，內涵是怎麼回事？是野貓式洩憤，抑或是具策略的游擊戰，甚至乎是全面(包括武裝)對抗的一部分？似乎仍然有待商榷。在強大國家鎮壓機器面前，抗爭者勇武極也會相形見拙。如果他們宣佈要全面對抗，亦可能再不能公開活動。若發展到這些景況時，他們又是否已有後著？

中共政權可以是墮落的官僚層、黨商勾結利益集團、香港的新殖民者、一個霸權強國……，視乎你從那個角度去分析，香港政治團體要跟這隻巨獸爭民主，有甚麼策略？由只是從旁吶喊，到跟它玉石俱焚之間，尚有甚麼選擇？亦怎樣才能牽動廣大群眾？是否暫時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我反抗 故我在》謝辭 (轉載)

梁國雄(長毛)

承蒙錯愛，這份花甲厚禮，實在愧不敢當！

所以有此過譽的書，與其說是幸運，毋寧講是不幸。古往今來，抗爭者能在被告席上放言抗辯，申述己見，本已是萬幸，更多不幸者根本欲辯無從，就犧牲於當權者之斧鉞。我之幸運，乃是香港仍未完全極權，好歹仍有公開審判。更且，抗爭之焰未熾，未足搖撼專制，法庭尚可不受政權把持，操弄為絞肉機器。如此說來，未來抗爭者之不幸，又豈非香港之大幸？

幸運者都會把握機會，為效命志業申辯，無懼後果，甘之若飴。我這個幸運兒與之相比，簡直小巫見大巫。人家自辯，恍似遺言，我則刑期太短，能不汗顏？

以身殉道的自辯士，莫過於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被權貴指控煽惑雅典青年不敬神祇，於公審中拒絕屈膝認錯；不但如此，更毅然推辭友人疏通以罰款代飲鴆極刑之好意，滔滔雄辯為理性辯護，留下一句：「臨別之時已屆，我赴死，大眾生，何者更佳，惟上蒼始知。」

視死如歸，千古絕唱！

至於近代，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於1953年起義失敗被捕，面臨軍法審訊，在秘密法庭娓娓道來，列舉親美軍政府殘民自肥，禍國殃民，臨末慨然宣佈：「判處我吧，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其辯詞本應不見天日，但蒙探監之女同志分別將之藏於髮夾，偷運出獄而公諸於世，儼如一篇控訴極權之檄文，民意為之沸騰。卡斯特羅亦因此逃過死劫，尋且獲假釋流亡島外，於一九五九年捲土重來，完成革命。

如此勇邁，又令我想到陳獨秀被國民黨政權控以「叛國罪」，於庭上推翻當時律師泰斗，其老友章士釗之有罪辯護，改以洋洋灑灑之自辯詞述志，力陳一黨專制誤國，塗炭工農大眾，推翻一黨專政，乃是護憲革命。辭甜盃而就苦盞，視

庭審若有講壇，一如其在獄中應友人之求所撰之句：「行無愧作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晚近之例，乃是1979年3月魏京生以言犯禁，遭中共政府以「反革命宣傳煽動」及「洩露國家機密罪」檢控，並破格予以公開審理，然旁聽席卻須預約取票，嚴加限制。他在被告欄毫無懼色，宣讀其自辯辭，痛斥「反革命宣傳罪」為惡法，與憲法賦予公民言論、出版自由相悖，更揭穿當局芝麻小事亦列為機密，民眾動輒得咎，羅織入罪之荒謬恐怖！有高幹子弟得以旁聽，冒險將之錄音整理付梓。

思之不覺想到俄國文豪高爾基筆下的人物巴威爾，他在小說《母親》裏向帝俄法官詰辯：

「我現在講話，並不是為自己辯護，而是按照我那些拒絕辯護的同志們所願，試試向你們解釋一些你們不懂的問題……在我們看來，專制制度並不是束縛我國唯一鎖鏈，它只是我們必須從人民身上打碎第一條鎖鏈…」

壯哉斯言，但願有日香港法庭亦有巴威爾在！

「我們都是巨人肩上的侏儒，之所以比他們看得更遠，並非目光較之更敏銳，而是巨人肩負我們，把我們提升到他們的高度。」

一名哲人如是說。

多謝編者、作者，你們的厚禮令我反思，感悟巨人的召喚！

2016年母親節

後記：

這篇後話，乃是應《我反抗 故我在》編者之邀而寫成，這本書由不同人士合作，縷述對我過去廿年「司法抗爭」的觀感，是一份送給我六十周歲的「賀禮」。

後話如此，正本如何，還待各位閱後評奪。

中國資本主義復活證據明確

張開

中國經濟實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發展蓬勃，能夠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可惜的是，一直被定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越來越被非公有制經濟遠遠地超過了。雖然筆者近幾年來難以看到官方的有關各種經濟成份的比例數字，但不久前卻從3月12日《文匯報》轉載《南方日報》3月11日發表的評論文章中得到解答。該文指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目前，中國非公有制經濟數量已佔市場主體總數的90%以上，並創造了超過60%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80%的社會就業，超過65%的固定資產投資，超過67%的對外直接投資。面對如此驕人的成績，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改變現行政策。要把經濟社會發展搞上去，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需要各方面齊心協力來幹。「任何想把公有制經濟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經濟否定掉的觀點，都是不符合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國改革發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錯誤的。」

上引的數字表明：中共過去所重視的公有制經濟，現在已不再是「主體」，即主要部份了，它只佔有市場主體總數的10%以下，只創造了不到40%的國內生產總值，不到35%的固定資產投資，不到20%的社會就業，這些都表明公有制經濟(或稱「國有」經濟)已不再是中國經濟的主要部份，即中共所稱的「主體」地位了。近幾年來，中國官方都似乎避免發表如此不利的具體數字，免致影響他們所堅持的「主體地位」。但《南方日報》發表的上述評論，卻明確地以具體數字表明，公有制(國有經濟)這種「主體」地位已不再存在，而且，官方還要「為非公經濟發展提供政策『定盤星』(發展的準則)，一方面仍然說「堅持公有制為主體，與非所有制經

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动摇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同時又說「毫不动摇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引自3月12日的《文匯報》)。這樣一來，非公有制經濟將會比公有制經濟更加蓬勃地發展，公有制經濟將會更加被私有制經濟所壓倒，中國將更加鞏固地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了，中共政策造成中國這樣的發展，是非常可悲的！上引的最後一句「想把非公有制經濟否定掉的觀點」，反映出國內存有反對官方助長非公有制經濟蓬勃發展這種「大政方針」的異議。

中國的實際情況雖已如此變化，已復活為私有制佔壓倒優勢的資本主義國家，但中共仍然一直宣稱中國為社會主義國家(儘管在前面加上「中國特色」的形容詞)。例如，就在去年11月發表的《中共關於制定十三個五年規劃建議》文件中，就寫著：「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毫不动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這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因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以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要消滅剝削制度，在初級階段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在高級階段則實行「各盡所能，各取各需」。現時中國所實行的、存在的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社會主義，而是復活了資本主義制度。中國一直以來，至今仍未實現「各盡所能」，而是存在大量的失業者 and 半失業者。中共的現行路線政策既背離了社會主義，還要冒用「社會主義」的名字，實在是非常嚴重的錯誤！

01/05/2016

中共加強控制網絡

劉山青

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CNNIC)發佈的《第35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國線民規模已達6.49億人，全年共計新增線民3117萬人，互聯網普及率為47.9%。手機線民規模達5.57億，較2013年底增加5672萬人。

中國互聯網協會、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發佈的《中國互聯網站發展狀況及其安全報告(2015)》顯示，2014年全年新開通的中國網站數量約95.2萬個，平均每月新開通網站7.9萬餘個。

網絡控制

中共早已在2004年成立“中國互聯網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和不良資訊舉報中心”。它在2014年增加獎金，「對舉報有功人員視不同情況分別給予100元至10000元人民幣獎勵，對提供重大違法案件線索，重大涉恐、涉暴線索和違法人員較詳細基本情況的最高給予10萬元獎勵。」

它的舉報數字，顯示國內正加緊打擊互聯網資訊，和案件越來越重大。於去年5月，它將政治性事件從「暴恐等其他有害資訊」抽出。「根據全國舉報情況，淫穢色情類有害資訊舉報仍居首位，達83.4萬條，占比58.8%；政治類有害資訊舉報占比24.4%；詐騙類有害資訊舉報占比7.3%；侵犯線民權益類有害資訊舉報占比3.4%；暴恐類有害資訊舉報占比2.6%；賭博、私服外掛等其他有害資訊舉報占比3.5%。」

中國的新聞封鎖很嚴。自《互聯網用戶帳號名稱管理規定》在去年3月1日施行以來，共處置各類違法違規帳號7000餘個。國際線上則全面實行用戶實名註冊。

1. 人民網

人民網以線民舉報等方式處置涉黃、涉賭、涉毒等六類違法違規帳號近3400個。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2. 中國網論壇

中國網論壇採取四項措施處置違法違規帳號2100餘個。一是手機驗證；二是技術平臺；三是舉報；四是擴充編輯隊伍。

3. 中國青年網

中國青年網以“後臺實名，前臺自願”處置冒用媒體名義發佈(虛假)新聞、低俗文化等帳號702個。

4. 法制網法制論壇

法制網法制論壇按“後臺實名、前臺自願”和“邀請制”進行用戶註冊。

5. 新華網

新華網全面排查清理論壇、博客、微博客等互動環節用戶帳號，共清理帳號200餘個。

6. 光明網

光明網全面排查光明網論壇95萬用戶，共處置帳號300餘個。同時收到舉報資訊200餘條，並進行處置。

7. 中國日報網

中國日報網對註冊用戶，尤其是英文互動論壇中的海內外使用者帳號使用情況進行全面核查，共處置博客規帳號近200個。

『網路敲詐和有償刪帖』專項整治工作自去年啟動以來，各地網信部門採取了取消備案、關閉網站、執法談話、立案偵辦等措施共關閉63家網站，公安對800餘條舉報進行偵辦，478家網站制定整改方案。

2012年中國國防部網和中國軍網表示每月平均遭受來自境外的攻擊達14.4萬餘次。來自美國的攻擊占62.9%。中共為應對美國互聯網戰爭，組建網路部隊。2013年5月25日，國防部證實在廣州軍區建立了『網路藍軍』，以美國為假設敵，用於類比藍軍的資訊化進攻。

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工作座談會

習近平在今年4月19日在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工作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提出“營造一個風清氣正的網路空間”。一時間，《人民日報》連日報導，“網路空間不是法外之地”、“領導幹部要上網看”、“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網信事業”等等，不絕於耳。

它實質是壓制網絡自由，與全世界的網絡文化對抗。習近平所提出的並非虛晃一下，它還有經濟上的考慮。互聯網經濟較適合小型發展，如中國的農村經濟。遠到偏僻鄉野的“淘寶村”正在發展起來，村民希望能夠脫離貧困。在習大大講話的同時，國務院辦公廳在2016年4月15日發表了意見。

“互聯網+流通”行動計畫的意見

其《意見》集中在經濟發展。其本上為：7項任務：

1. 增強老字型傳統品牌創新商業模式；
2. 發展協同經濟；
3. 推動智慧物流、加大農村寬頻建設；
4. 拓展智慧消費新產品；
5. 發展綠色流通和消費；
6. 推進農村電子商務；
7. 完善“一站式”服務消費功能。

5個保障

1. 完善流通保障制度、開展道路貨運無車承運人試點；
2. 引導社會資本、境外資本投入；
3. 建設商務公共服務雲平臺；
4. 健全流通法規標準體系；
5. 打擊侵權假冒、無證經營、虛假交易行為。

中共“十三五”規劃的網路強國戰略、與幾份中央文件有關。2015年3月31日「關於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指，關乎政策措施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網路出版服務管理規定》和《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

法》、《網路出版服務管理規定》和《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

它的第四章為「權利的限制」，與香港的版權法修訂的爭議較相關。其基本限制(豁免)為：

第四十條 在當指明出處時，可豁免版權限制的有：

- (一) 為個人學習、研究；
- (二) 評論；
- (三) 報導時事；
- (四) 已經發表的時事性文章；
- (五) 公眾集會上發表的講話；
- (六) 為教學或科學研究；
- (七) 國家機關為執行公務；
- (八) 圖書館、檔案館、紀念館、博物館、美術館等；
- (九) 免費表演的作品；
- (十) 陳列室的藝術作品臨摹；
- (十一) 漢語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
- (十二) 將已經發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由此看到，它完全不尊重使用者權利，例如以戲仿等手法表達個人意見的權利。

網路出版服務管理規定

它是工信部發布，在今年3月10日起施行。其規定所有在中國境內從事網路出版的服務。當中有控制地區權力，擔心地方勢力容忍出禁書，挑戰中央的意味。它的網路限制反映了目前中共對言論自由的總體看法。

第十四條《網路出版服務許可證》有效期為5年。省、自治區、直轄市出版行政主管部門將相關資訊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備案。

第二十四條網路出版物不得含有以下內容：

- (一) 反對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的；

- (二) 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 (三) 洩露國家秘密、危害國家安全或者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
- (四) 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破壞民族團結，或者侵害民族風俗、習慣的；
- (五) 宣揚邪教、迷信的；
- (六) 散佈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定的；
- (七) 宣揚淫穢、色情、賭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 (八) 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
- (九) 危害社會公德或者民族優秀文化古早的；
- (十) 有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規定禁止的其他內容的。

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

《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已經在2011年3月17日施行。它規範出版物的全國統一市場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它對音像製品的限制反比印刷品較寬鬆。

它規定：

(四) 有與出版物總發行業務相適應的設備和固定的經營場所，經營場所的營業面積不少於1000平方米；

(五) 註冊資本不少於2000萬元；

(三) 有與出版物批發業務相適應的設備和固定的經營場所，其中進入出版物批發市場的單店營業面積不少於50平米，獨立設置經營場所的營業面積不少於200平方米；

(四) 註冊資本不少於500萬元；

這等於限制了個體出版和發行的可能性，也就是限制了市民的自由。

第四十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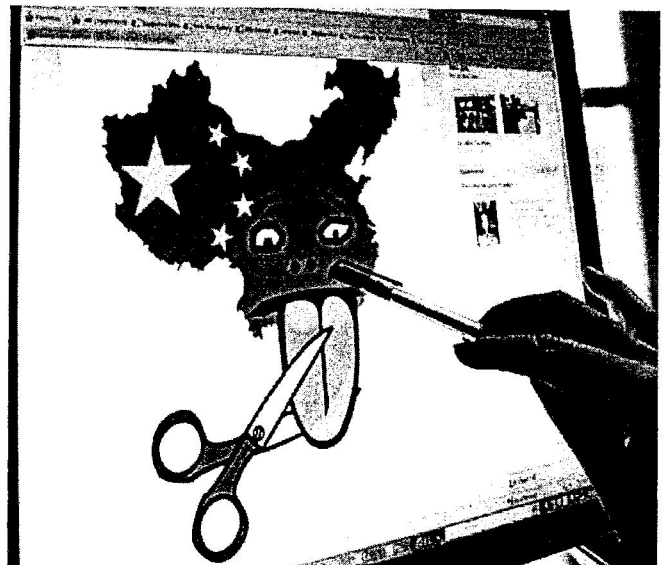
(一) 允許香港、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以獨資、合資形式提供音像製品（含後電影產品）的發行服務；

(二) 對於同一香港、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從事圖書、報紙、期刊連鎖經營，允許其控股，但出資比例不得超過65%；

(三) 香港、澳門服務提供者應分別符合《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及《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關於“服務提供者”定義及相關規定的要求，取得香港、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明書。

總結

由以上看來，網絡對中共來說，是一把兩刃刀。中國的網絡發展有其客觀需要。中共一方面依賴它發展經濟，而同時又加強其鉗制，加強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權利。



對中國境外非政府組織法，社聯應據理力爭(轉載)

劉山青

德國世界報記者在3月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新聞發布會上，提問：「現在中國以及外國的非政府組織都對中國全國人大審議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非常關注，也有很多爭議。大家都關注這部新法將給予公安部門更多監管權力。我想問的問題是現在這部法律審議的情況，將在最近決定還是在不遠的將來對這部法律進行更進一步的審議和通過？」

中國目前有7000多個境外非政府組織，其中不少來自香港。他們對審議中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抱悲觀態度。首先，他們入中國境內是為做善事的，他們不喜歡與公安打交道(注1)。其次，草案不准他們設立分支機構(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注2)，要求他們設立首席代表(注3)，限制境外工作人員的比例不得過半(注4)，監視其財政狀況(注5)，限制臨時活動(注6)等，讓人感覺不受尊重，維穩味強和不受歡迎。當中尤其是支部問題，實際上令不少非政府組織將無法運作。

社聯的機構會員中，超過100家機構尚在內地參與社會工作。它在2015年5月26日舉辦了座談會，收集機構會員的疑問和意見。

其建議軟弱及偽善。就向公安登記一條(注7)，它不敢提出異議(社聯只在其他意見上提及)。慈善事業本屬民政，部份已進行工商登記，不應交給主要與刑事相關的機構處理。

它在問題核心的分支機構上，沒有據理力爭，指出其惡果。(注8)「分支機構」的設立就是要杜絕工作站／聯絡站／辦事處，社聯的明知故問小聰明只會引來恥笑。正是這些建制、半建制、制度內的組織的對強權屈服，加劇香港青年人的本土意識更為高漲。

附注

注1

第七條 國務院公安部門及省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是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開展活動的登記管理機關。

注2

第二十三條 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境外非政府組織及其代表機構不得在中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注3

第三十四條 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應當設一名首席代表，可以根據業務需要設一至三名代表。

注4

第三十五條 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中的境外工作人員的比例不得超過工作人員總數的百分之五十。

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的工作人員不得同時在其他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機構中任職。

注5

第二十八條 境外非政府組織應當按照代表機構登記的業務範圍或者與中方合作單位協定的約定使用資金。

注6

第十九條 境外非政府組織開展臨時活動，應當經業務主管單位同意。但是，國家機關或者經國務院公安部門確定的單位為中方合作單位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辦理審批手續。

注7

第七條：國務院公安部門及省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是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境內開展活動的登記管理機關。

社聯建議：為了減輕國務院公安部門及省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的工作負擔，建議增加由公安部門和公安機關授權的市級公安機關／組織／機構／單位作為登記管理機關。

注8

第十條及第二十三條(第十條)境外非政府組織只能在中國境內設立一個代表機構(第二十三條)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境外非政府組織及其代表機構不得在中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

問題：位於不同省市的工作站／聯絡站／辦事處是否屬於「分支機構」範疇？

建議：不少非政府組織可能在不同省市進行工作，根據工作需要於境內不同地點設立工作站或聯絡處，建議將「分支機構」定義作進一步說明。

中國治理土壤污染難度

青岩

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陳能場指出，近30年來，中國的土壤環境主要存在著三大問題：土壤流失、土壤污染和土壤退化，而後兩者直接關係到土壤的健康情況。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正如火如荼進行，可惜，環保監管和治理措施卻不健全，土壤污染問題日益凸顯。再者，土壤耕作過程中施肥類型的變化（從施用有機肥到施用工業化肥）、施肥和除草劑劑量過大、農藥的施用、大量農膜的應用等，對土壤環境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導致土壤退化，出現變酸、板結、養分和微生物分佈不平衡等現象，造成農產品品質下降、產量降低、重金屬超標等一系列問題。

全國人大環資委從1994年起就開始關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問題；環保總局與國土資源部於2004年12月提出《全國土壤現狀調查及污染防治專項工作》；2005年初，中央財政專門設立了全國土壤現狀調查及污染防治專項資金。

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中國開展了首次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並於2014年4月發佈了《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調查點位元覆蓋中國大陸地區的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設用地，實際調查面積約630萬平方公里。《公報》指出，“全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重，耕地土壤環境品質堪憂，工礦業廢棄地土壤環境問題突出……土壤輕微、輕度、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分別為11.2%、2.3%、1.5%和1.1%……從污染分佈情況看，南方土壤污染重於北方。”

2011年，新聞報導《鎬米殺機》在中國掀起了對於土壤污染的全民關注，土壤立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2016年5月28日，國務院簽發《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土十條》，明確提出，到2020年土壤污染加重趨勢得到初步遏制，2030年全國土壤污染品質穩中向好，到本世紀中葉，土壤環境品質全面改善，並且落實到具體數位：2020年受污染土地（包括耕地和其它地塊）安全利用率達到90%以上，2030年達95%。

信息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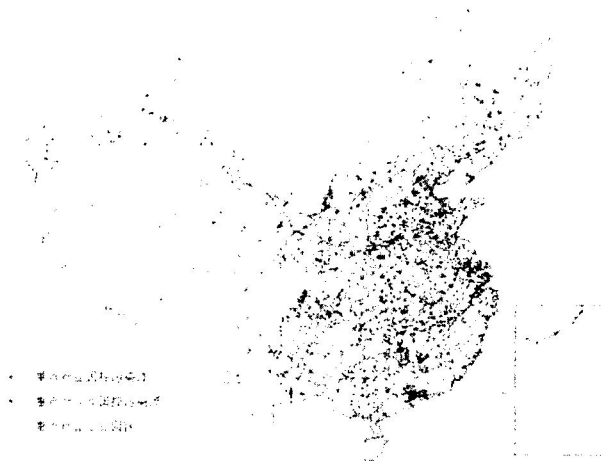
陳能場認為，土壤是珍貴的、難以再生的戰略資源，也是國家和人類安身立命之所。但在現如今的發展建設過程中，缺乏對土壤足夠的尊重；在面對土壤治理的問題時，缺乏對土壤必要的瞭解。

陳能場解釋，原則上，土壤治理時應該考慮兩個問題：一是土壤污染的嚴重程度，二是土壤治理後的土地用途。土壤是個高度不均勻和高度複雜的系統。首先對污染土壤的結構、微生物等方面進行科學分析；接著根據分析資料結果，因地制宜地制定治理策略、設定不同的治理目標。一般來說，如果地塊用於農作物生產或涉及到人類的食物鏈，在治理過程中的土壤安全性方面制定更加嚴格的標準——目前中國的土壤治理在生態方面的考慮仍需完善。在具體案例中，還需要考慮對特定區域的生態環境，以及對某些特定物種的食物鏈的影響等——中國目前現行的土壤環境品質標準制定於1995年，雖然有些數值過寬（如鉛），但總體上是全世界最為嚴格的標準（特別是鎘和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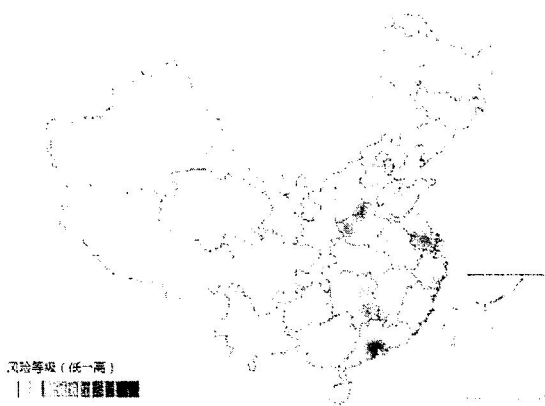
陳能場認為，《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宏觀管理的思路沒有問題，例如計劃建立土壤污染監測網路、對農用地按污染程度進行分類管理、強化未污染地保護等都很好。但是，最關鍵的是現在土壤污染的基礎如何並不清楚——有多少受污染土地，在哪裡，當前達到“安全利用”的受污染土地是多少，並沒有公開的資料支撐。他無法判斷可能的工作量和操作難度。

2014年《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過於粗略，未能真正體現污染的程度。2016年4月常州外國語學校土壤污染事件之後，環保部部長陳吉甯曾拿表態要對全國污染狀況進行一次詳細的摸底調查。《土十條》第一條也提及：2018年底前查明農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積、分佈及其對農產品品質的影響；2020年底前掌握重點行業企業用地中的污染地塊分佈及其環境風險情況。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在常州外國語學校事件之後，發佈了一張土壤污染風險地圖——中國第一張公開的土壤污染源風險地圖。IPE篩選了化工、礦業、冶煉等13個土壤污染重點行業，選取4500家重點行業企業和廢棄物處理單位（包括國控污染源3998家，有過環境違規問題的非國控污染源502家），以及729個重點行業工業園區，通過將這些企業和園區定位繪製完成。



根據篩選的污染源資訊繪製的點點陣圖。圖片來源：IPE



根據4500家重點行業企業和廢棄物處理單位，以及七百多個重點行業工業園區位置資訊繪製的風險等級示意圖。圖片來源：IPE

治理成本高

另外，治理成本也成難題。加州大學聖達戈分校的張俊傑副教授認為，《土十條》中的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誰污染誰治理”以及“污染治理和修復終身責任制”的提法和美國土壤污染治理法案《超級基金法》的力度應該是不相上下的。不過，當前《土十條》並沒有明確污染者“負責”的具體形式（例如，繳納治理資金、委託協力廠商治理等），後續還要討論。馬軍則擔心，現在企業轉讓之後污染責任由接手企業承擔的規定是個漏洞。若接手企業沒有治理能力，或在嚴格追責下破產，就得政府接盤。原企業可能利用這個制度缺陷逃避責任。

中國政府於2010年設立重金屬污染防治專項資金，每年投入數十億人民幣，2015年激增至90億多，但和土壤治理的數以萬億計的資金需求規模來比，則顯得微不足道。“土十條”提出加大政府資金投入、撬動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等，目前還沒有具體的實施辦法。產業在治理中的參與度暫時不明朗。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著名土壤學家陳懷滿則認為國家要出面才能落實《土十條》。他解釋，土壤環境品質監測網路，需要發揮基層單位的力量。環保部環境監測站和農業部的農環站、土肥站在基層都有分佈，關鍵問題是如何明確的賦予他們職責，怎麼樣把這些基層單位組合起來參與到這項工作中來。怎麼樣把基層力量回歸到他們原本的職責範圍內，這個是國家要很好地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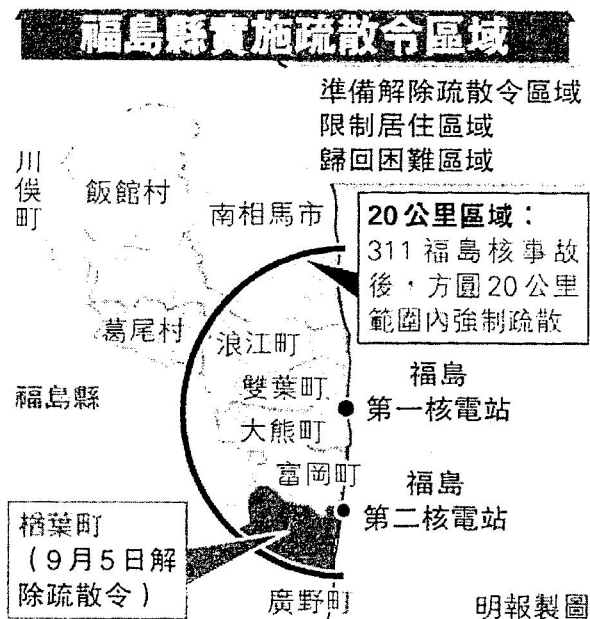
對於重度污染地區的農民，一般來講，很少是由農民自己造成重度污染的，一般是工廠或者礦山的排放造成的污染，所以，國家應該制定一個賠償制度，比如國家把這塊地使用權先買過來，之後再由國家去安排“誰污染、誰治理”，落實修復問題。重污染的土地，由政府出面，才能有效地推進政策的落實。

引用資料:

- (1)著名土壤學家陳懷滿:“土十條”具體明確,執行會有問題嗎? 2016-06-04, 土壤觀察, 轉引自《農業環境科學》(微信號nyhjx)(2016年6月2日)。
- (2)張春,“土十條”有了,土壤污染就有治了?, 14.06.2016, 中外對話。
- (3)從“鎬米殺機”到“土十條”, 2016-01-19, 土壤觀察, 轉引自《景觀設計學》(2015年第3卷第6期)。

五年之後：福島核輻射泄漏遺害真相

破謎



頒布解除令

2016年6月12日，日本福島縣首次解除了核輻射水平比較高的一個“居住限制區域”的避難指令，允許避難者返回受核泄漏污染的原居住地。

福島核事故後，福島第一核電站周邊地區根據核輻射水平高低被劃分為“返鄉困難區域”、“居住限制區域”和“避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

福島縣葛尾村大部分地區的“居住限制區域”、“疏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被解除，當地舉行了村商工會主辦的災後重建活動。

6月15日，日本政府原子能災害當地對策總部部長高木陽介前往福島市政府，通報將於2017年3月底部分解除對福島縣飯館村除的疏散指示。飯館村在福島核事故後全村都被劃入疏散區域。解除對像是占飯館村大部分面積的居住限制區域和疏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2個區域的人口截至5月底共有1770戶家庭5917人。輻射量較高的返家困難區域將繼續保留。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這是日本首次解除核輻射水平比較高的“居住限制區域”的避難指令，也就是允許災民返回家鄉。雖然避難指令已被解除，但有災民直言，日本政府在這種狀態下說可以返鄉，是不負責任的做法。災民對核輻射的擔憂依然未消，指日本政府急於解禁核污染區是為東京奧運會造勢。

6月16日，福島新能源社會構想實現會議第二次會議在日本經濟產業省召開，該會議旨在使遭遇核事故的福島縣成為可再生能源先驅地。會上彙總了構想要旨，包括推進規模達到全球最大的氫能源生產以及重視環境的城市規劃。為迎接2020年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也將向世界傳遞福島重建的訊息。

信息與真相

根據常駐日本的新華社記者報導，自福島核事故發生之日起，日本方面就多次出現資訊公佈不及時、不完整甚至前後矛盾的情況。比如在事故發生後，檢測服用放射性碘污染的水對孕婦和兒童的影響時，日本當局公佈的資訊可以說是亂成一片，日本婦產科協會和日本醫學放射線協會公佈的資料自相矛盾。

福島核事故初期，國際社會就難以獲取相關資訊。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天野之彌告訴新華社記者，在他親往日本與當時的日本領導人會晤之後，日本政府才提供了更多事故資訊。

曾擔任日本廣島大學教授的俄羅斯防輻射科學委員會成員瓦列裡·斯捷潘年科對新華社記者說，他曾多次詰問日本同事，為何不對福島核災民進行人口劑量回顧性分析，所有專家學者都選擇沉默或語焉不詳。

日本岡山大學教授津田敏秀等人2015年在國際醫學雜誌《流行病學》上發表論文指出，受

福島核事故洩漏大量放射性物質影響，福島縣內兒童甲狀腺癌罹患率是日本全國平均水準的20倍到50倍。

津田敏秀告訴記者，福島縣和日本政府不承認核輻射與兒童甲狀腺癌高發現象之間的關聯性，他對於福島縣和日本政府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態度感到不解。而福島縣方面拒絕就這一問題跟他交流，也從不允許像他這樣的學者參加政府的相關會議。

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顯示，由於資料匱乏等原因，現在仍然難以十分準確地估計福島核事故對周邊人類健康以及環境造成的潛在負面影響。而來自日本官方的資訊，幾乎一律是“核事故影響有限”、“善後處理進展順利”等措辭。

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專家肯·比塞勒說，福島核事故對海洋的影響是空前的，因為洩漏的80%都進入了海洋。

日本海洋大學副校長、日本海洋學會副會長神田穰太為記者展示了海洋放射性物質類比動態圖，顯示現在太平洋西側海域的放射性銫水準反而沒有東側的放射性銫水準高，這說明隨著洋流運動，放射性銫已經到達美國西海岸。

北美科學界已經有了實地調查證據。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去年刊登加拿大貝德福德海洋學研究所科研人員的報告說，在北美太平洋一側沿海檢測出了來自福島核事故的放射性物質。

在遮掩這一事件的過程中，力量強大的日本“原子能村”不可忽視。這個特殊“圈子”裡的產、官、學三方相互“提供支援”：電力公司向政治家捐款；學、研機構獲得電力公司捐款；制定原子能設施安全標準的半數委員與電力公司有關聯；相關檢查中，從有關企業獲得捐款的大學教授會將檢查標準定得比國家的標準寬鬆……。

互相推諉

2016年5月30日，東京電力公司相關負責人在記者會上承認，過去5年有關福島第一核電站輻射洩漏事故相關反應堆“堆芯損傷”的說法，是隱瞞了事實。日政府多次否認隱瞞危害程度事實是，核反應爐發生了更為嚴重的“堆芯熔化”。

據日本傳媒報導，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在核事故發生後兩個多月的時間里都沒有承認核反應堆出現了堆芯熔燬的嚴重事態。針對這一問題，在東電委託下，由律師等組成的第三方委員會6月16日發表了驗證報告。報告稱，時任東電社長曾以接到官邸指示為由，授意有關人員不要使用“堆芯熔燬”這一措辭。

鑒於此，東京電力公司核能及選址本部選址部長守正樹前往福島縣政府彙報了驗證結果。他道歉說：“通過驗證，我們認為當時應該告知地方政府和縣民出現了‘堆芯熔燬’。我們的做法給大家帶來了麻煩，並讓大家感到擔心，我們表示衷心的道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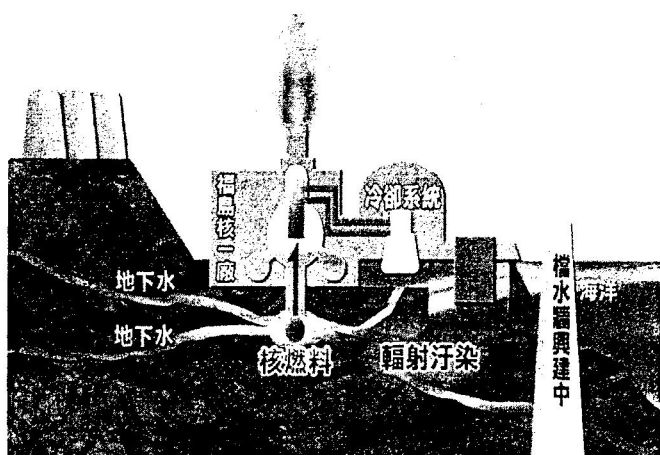
福島縣原子能安全對策課課長菅野信誌直斥其非：“避免使用對己方不利的措辭，只能說你們有這樣的不良習慣。”菅野還抗議道：“你們無視當時充滿惶恐的縣民的心情，令人極其遺憾。希望你們採取措施，防止類似情況再次發生。”

據日本《朝日新聞》6月22日報導，關於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發生時，延遲發表“堆芯熔化”一事，東電社長廣瀨直己於6月21日承認，當時的社長曾在公司內下達不要使用“堆芯熔化”一詞的指示，該行為屬於隱瞞，並對此做出道歉。據悉，對於東電第三方查證委員會指出的“首相官邸指示”，則不予開展追加調查。

東電發表聲明稱，時任社長的清水正孝做出的指示，“如果站在社會大眾的立場，那麼被解讀為隱瞞也是理所當然”。記者會上當被問到個人看法時，廣瀨社長坦承“就是隱瞞”。此外，

東電還在此基礎上發表了預防此類事件再次發生的對策，包括直接向社長提議資訊傳達、以及即使存在外部壓力也能夠將事實公之於眾的訓練等內容。

關於前社長下達該指示的理由，東電第三方查證委員會於6月16日發表的報告書認為“推斷原社長從首相官邸方面收到要求”。對此，前首相菅直人等人否認，“從未做出過這種指示”。



毫無反省

日本核能監管機構原子力規製委員會6月20日宣佈，允許關西電力公司兩座核反應堆重啟，並繼續服役20年。

福島核事故後，日本實施了新製定的核電站安全標準。據此標準，這兩座核反應堆運轉已經超過40年，本該“退休”。而這將是新規實施以來首次有老舊核反應堆獲批延期運轉。這兩座核反應堆分別是關西電力公司下屬高浜核電站的1號和2號反應堆，位於東京以西約350公里處，分別於1974年和1975年投入使用。

共同社分析，鑒於高浜核電站的1、2號反應堆獲批“返聘”上崗，擁有老舊核電機組的電力公司可能會“跟風”提出延長申請。

綠色和平組織日本分部批評原子力規製委員會的最新決定是“監督的失敗”。日本地處環

太平洋火山地震帶，是世界上最活躍的地震帶之一，火山地震活動頻繁。綠色和平組織日本分部能源領域負責人肯德拉·於爾里克批評說：“原子力規製委員會正在盡其所能地忽略地震所帶來的威脅……原子力規製委員會的舉動表明，他們沒有能力也不願意保護日本民眾的安全。”

據日媒報導，鑒於日本四國電力公司6月24日啟動伊方核電站3號機組的核燃料裝填作業，當日，反對重啟核電站的民眾在愛媛縣伊方町的核電站正門附近進行了抗議。他們舉起寫有“不重啟核電站，報廢反應堆”的橫幅，高呼“不允許裝填”。

家住核電站方圓30公里內的個體戶檜田直子望著反應堆說“真可怕”、“疏散計劃什麼都是騙人的”。日本市民團體“阻止伊方核電站會”成員長穀部孝誌語氣堅定地表示：“福島核事故尚未得到妥善解決，就重啟(伊方核電站)，簡直豈有此理。雖然阻止不了自然災害，但可以阻止核電站。”

資料來源:

- (1)<東電承認隱瞞福島第一核電站核事故“堆芯熔化”>，2016年6月3日，核電縱橫。
- (2)<福島縣葛尾村解除核事故疏散指示 開始重建家園>，2016年6月13日，中新網。
- (3)<福島解禁核輻射高污染區域>，2016年6月14日，新華網。
- (4)<福島將建超大規模氫能源生產基地 服務東京奧運>，2016年6月17日，新華網。
- (5)<福島縣飯館村將解除疏散指示 災後重建之路漫長>，2016年6月15日，新華網。
- (6)<逃避責任 福島縣抗議東電規避“堆芯熔燬”措辭>，2016年6月18日，新華網。
- (7)<核反應堆“返聘”引日本國內質疑>，2016年6月22日，新華網。
- (8)<東電社長承認隱瞞福島核電站堆芯熔化>，2016年6月23日，新華網。
- (9)<日本伊方核電站啟動核燃料裝填作業 遭民眾抗議>，2016年6月24日，新華網。

氣候災難逼近！

第四國際書局

地球氣候正在快速變化，比專家們想像的快得多。毫無疑問，造成這樣情況的原因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的燃燒，產生了以二氧化碳（CO₂）為主的溫室氣體，這些溫室氣體的排放，致使氣候變暖。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地球已變暖0.8℃度。這足以在未來的數世紀內使海平面上升幾乎兩米。沒有人可以阻止它。數以億計的人將被迫轉移，數百萬公頃的糧食種植土地將喪失，城區將要疏散。南方人民，應負的責任最小，所受的影響卻最嚴重。

各國政府都忽略了警告。里約首腦會議二十三年後，全球溫室氣體年排放量的上升是1990年代的兩倍。儘管還有經濟危機！

按照這個速度，在世紀末氣候變暖不會是2℃，而是6℃。這將導致可怕的災難，是完全不可想像的災難。

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 21）：蒙蔽人民眼睛，禮物送給老闆

因為我們本應採取的措施已經遲緩了數十年，所以事情非常緊迫。

“已開發”國家必須立即開始以每年至少10%的速度減少排放，到2050年則完全消除它們。新興大國必須迅速跟進。其他國家仍然有餘量，但它正在迅速減少。

如果沒有什麼變化，在全球變暖不超過2℃的情況下，仍然可以燃燒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的數量，到2030年將被耗盡。

2015年12月，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 21）將在巴黎舉行。這一次，政治領袖們試圖欺騙我們，說他們將達成一個“雄心勃勃”的協定。

這是事實，為挽回面子，他們可能會達成一項協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份協議在環境方面將是完全不夠的，在社會方面有非常不公平的地方。它的內容事先由主要污染國：美國，歐

盟，中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承諾而決定。在此基礎上，到世紀末，地球將至少變暖3.6℃至4℃。

這些承諾均與產業和金融遊說團體協商過，是按照他們的利益定做的。面對新的市場：碳市場，“綠色”技術，林木補償，捕獲封存，為應對全球變暖而進行調適等方面的開拓前景，跨國公司躍躍欲試。

但變暖4℃，意味著長期的10米海平面上升以及更直接的影響：加速生物多樣性的下降；更多的暴風雨，颶風，乾旱，洪水，熱浪；農業生產率的減少等等。

挽救資本主義，還是挽救氣候？

既成事實已經數十年了。警監會（IPCC）是一個政府間機構；各國政府都應該遵守其報告的大綱。技術解決方案存在，財政手段也存在。那麼，為什麼政府不採取必要的行動呢？為什麼他們要推薦虛偽的或危險的“解決方案”，如葉岩氣，農業燃料，核能，地質工程等？

答案很簡單：因為政府是為跨國公司和銀行服務的，而後者正在進行利潤競爭最大化的戰爭，一場促使企業進行更多生產（因此消耗更多的資源）的戰爭，而他們所使用的能量中，超過80%的來自煤，石油和天然氣。

為了拯救氣候：1）4/5的已探明儲量的化石燃料必須留在地下；2）依據這些化石資源（以及核電）的能量系統必須盡可能快地摧毀掉，並且沒有補償；3）不必要的或計畫要淘汰的有害生產，必須放棄以減少能源和其他資源的消耗；4）專制和不平等的唯生產力/消費主義的制度，必須由一個可再生，有效的，分散的，社會和民主的能源系統所取代。

阻止氣候災難的同時，保證所有人有尊嚴的生活，這是可能做到的。但有一個條件：採取反資本主義措施。各國政府寧願毀滅地球，以野蠻混亂威脅人類而讓軍火商獲利，不惜危及

數以百萬計的窮人，工人，農民，婦女和年輕人的生命，而後面這些人已經是氣候變化的受害者，。

資本把大自然和工作當作其財產。在氣候危機和社會公正之間沒有選擇；它是同一個鬥爭。讓我們動員起來。撇開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 21），申明我們的權利，展開我們的鬥爭，讓我們組織起共同行動，建立一個全球的群眾運動。

在所有戰線上一齊行動起來

化石跨國公司需要擴展其爪牙。讓我們阻止他們。動員起來，反對為他們服務的基礎設施專案：新機場，新管道，新的高速公路，以及新的葉岩氣瘋狂。譴責提供給海運，空運和公路運輸公司的稅收及其他優惠。

“發達”國家的強權應是全球變暖的主要責任者，但他們卻排斥難民，然而正是他們的統治政策和嚴重武力引起的危機造成了難民。拒絕歐洲堡壘的牆壁和集中營，要求給予氣候移民以避難權。

農業綜合企業和木材工業要負責溫室氣體排放量的40%。動員反對轉基因生物，支援地區的有機小農農業和糧食主權。建立生產者-消費者網路和協會。支持土著人民掌握自己資源的權利，支持婦女鬥爭，南方國家的婦女生產了80%的糧食。

我們正在目睹一個毀滅生物多樣性的災難。所謂的第六次滅絕：自恐龍絕滅以來的最大物種滅絕。到本世紀中葉，地球上所有物種的40%至50%，可能滅絕。所有哺乳動物的四分之一，目前瀕臨滅絕的危險，而自然（天然）物種滅絕速度只是每700多年一個。組織起來，保護生物的多樣性。

有良好標準的住房，清潔水，運輸，取暖和光亮，是每個人的權利，對於氣候和就業是有益的。組織起來，以確保公共部門提供水，運輸，房屋的保溫和裝修，把這些置於生產者和工人的控制之下，讓這一切的使用，都是免費的。

在傢俱，紡織品，電子，包裝等方面，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瘋狂，大為加劇了全球暖化。拒絕一次性的，計畫淘汰的產品，拒絕不可修復

或不可回收的產品。組織起來，支援這些行業的工人，尤其要支持低工資國家中這些行業的工人。

工人不應承擔轉型的成本。在浪費，有害，污染的工業中的工作者，應動員起來，在不減薪的情況下，集體向有用於社會和環境的負責任功能轉換。

自由時間的權利對環境，健康和就業是好的。我們要動員起來，讓大家工作越來越少，靈活地減少工作時間，但不減少工資，而是補充招聘和減輕工作節率。

化石跨國公司和銀行在阻擋過渡。要求撤銷對這些部門的投資。把私營部門從能源和金融業驅逐出去，不對其做賠償或收購。這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以使社會迅速，合理地組織過渡。能源是大自然的恩賜，它必須不屬於任何人。讓我們動員起來，爭取一個分散的，在工人和用戶控制之下的公共能源服務系統。

生態社會主義還是野蠻橫行主義

氣候危機，對於“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的選擇，給出了一個大題目。一個真正的革命是必要的。我們必須改變一切！不僅要以一個平等的方式分配我們工作的成果，同時也要決定我們生產什麼，如何生產——沒有炒作，沒有廢品——並且質疑專制資本主義賦予男人女人的角色。

總之，這是文明的一個轉變，在團結和尊重環境的基礎上，轉型過渡到新的社會，生態社會主義的，生態女性主義的社會。這個社會，主要的管理決策，生產和消費的輕重緩急，將不再由少數唯利是圖的剝削者，官僚或偽專家決定，而是由所有人決定。這種變化，不會通過選舉獲得，而是通過我們的鬥爭取得。總之，只要我們想做，我們就可以做到！

面臨生態緊急危機

丹尼爾·坦努落

2014年4月，美國兩組不同的南極冰河研究專家——根據觀察，用不同的方法——達到了同樣的結論：由於全球變暖，冰原的一部分已經開始移位，而且這種移位是不可逆的。

雖然科學家都不願意說，他們的預測是100%肯定的，但有一點卻是明確的，即：“我們已經越過了無法挽回的那一點，”他們在聯合記者招待會上說。據他們的說法，在未來300-400年內，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海平面上升1.2米。他們的看法是，這種現象將加速相鄰區域的不穩定情況，隨後又可能導致海平面進一步上升三米多。[1]

災難正在悄然形成

這種規模的海平面上升，產生社會後果，讓任何人都無法倖免其害。要曉得，有1000萬埃及人生活在海拔不到一米的地方，同樣狀況的還有1500萬孟加拉人，大約3000萬中國人和印度人，以及約2000萬越南人...更何況還有位於沿海地區的所有主要城市：倫敦，紐約，三藩市...

你當然可以建造一米高的堤壩——只要你有足夠的財政和技術手段這樣做。但你不能建造十米高的堤壩。而且，即使可以，也沒有多少人可以接受在它們背後的生活。

但為了全面衡量威脅的情況，我們必須知道，南極冰蓋的移位只是海平面上升的四大原因之一。其他三個分別是：大量水的熱膨脹，冰川山的融化和格陵蘭冰蓋的移位。如果積累在陸地上的冰完全融化，它將導致海平面上升90多米。

安德斯·勒烏曼（Anders Levermann）試圖建立的海平面上升全球預測模型，估算了這四個原因。他的結論是驚人的：相對於十八世紀後期的表面平均溫度，任一攝氏度的增加，將相當於海平面增加1.3米，才能達到平衡[2]。相對於基準期的溫度差，現在是 +0.8°C。如果勒烏曼

是正確的，為達到平衡，海平面1.84米的上升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國際能源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法提·比羅爾（Fatih Birol）並不是布爾什維克或生態社會主義者。他最近承認，目前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到世紀末，完全會讓全球溫度增加6°C，也可能上升11°C以上[3]。

假設勒烏曼的調查結果是準確的，那麼，我們製造的環境條件，將會讓海平面上升13.8米以上，才能達到平衡狀態。在九十億人的一個世界，要如此大規模的對全球氣候變暖作調整，之所以沒有可能，這就是原因之一[4]。

在這些預測中，術語“平衡狀態”是指：在某個時刻，平均表面溫度和存在於地球表面的冰量之間達到了一個新的平衡點。具體而言，達到地球系統的這個能量平衡，應該需用大約一至兩千年。

一兩千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但重要的一點是，這個過程一旦啟動，就不能停止：對於溫室氣體X的一個大氣濃度難免會出現對應的溫度增長Y，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大量的水Z的膨脹和數量Z的冰的熔化，轉化為水，導致海平面升高。

終止這條因果鏈的唯一途徑是把地球放在冰箱裡。存在一種天然的冷凍機：就是冰河期。但冰河期顯然尚未啟動。天體物理學家相信，下一個冰河期最早將出現在3萬年後。

到目前為止，我只討論了全球變暖對海平面上升的影響。它給出了一個生動而可怕的危險畫面——按人類的時間尺度是不可逆轉的——正悄悄地建立在我們頭上。但是，如所周知，這只是氣候變化的後果之一。這裡我只簡明的提一提其它幾個，這幾個在短期內比海平面的上漲更具威脅性；它們中的一些已經很明顯了：

- 農業生產率的下降。相比十八世紀，如果全球溫度變暖3攝氏度，估計整體生產率將增加。但截至目前，在一些熱帶地區，尤其是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生產率正在下降；

- 極端天氣事件。如果兩個星期前你來到這裡，你會達到熱浪，35°C以上的溫度超過一個星期，在這些地區，這是非同尋常的，但這種情況的出現，正趨於越來越多；

- 對健康的影響後果：如果好天氣再臨，而你就躺在灌木叢裡，可要謹防蜱蟲。這些攜帶萊姆病（Lyme disease-carrying）的小蟲比以前多得多，因為冬天也變得較溫和了。在亞熱帶地區，易於瘧疾發展的區域在擴大，成了一個嚴重影響健康的問題。

所有生態指標的加速惡化

與此同時，氣候變化只是環境加速惡化的一個表現所在。我們把這一點說成“生態危機”。在我看來，這種表達是不恰當的，稍後我會對此加以解釋。現在，足以認為，“生態危機”有許多方面。主要的有：

- 海洋的酸化 --- 它對許多海洋生物構成了嚴重威脅，因為這些海洋生物的外骨骼由碳酸鈣組成，不能承受過多的酸性；

- 生物多樣性的下降 --- 我們正在經歷的，是生物學家稱之為生物物種“滅絕的第六波”，它比前一波的速度更快，後者對應於六十億年前的恐龍消失。

- 氮和磷迴圈的擾動 --- 這可能會導致一個比較陌生的海洋猝死現象，在地球的歷史上，這似乎已經自然地發生過；

- 保護我們免受紫外線傷害的平流層臭氧層被破壞 --- 這是唯一獲得了確認的重大環境問題，稍後我會回頭談它；

- 水資源的惡化和過度開發 --- 目前，因為過度吸掉水分，尤其是農業灌溉，使得25%的河流不再流向海洋；

- 生物圈的化學毒物 --- 一個世紀以來，化工業已創造了十萬個不存在於自然界的分子，其中一些是特別有毒的化合物 --- 無法被天然製劑分解；

- 土壤的破壞和耕地的流失。

所有這些現象是相互關聯的，而氣候變化佔據中心地位。例如，海洋的酸化，起因於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同時也是主要的溫室氣體。生物多樣性的下降，部分原因也是全球變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暖所致：它是如此之快，一些物種因無法遷移而無法存活下來。

特別地，所有這些現象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的圖示揭示了類似的曲線，指數式曲線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十年，在所有情況下，它們都有明顯的加速。

- 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曲線，按時間度量，是指數式增加的；

- 按時間度量，正在消失的物種數量曲線，是指數式增長的；

- 按時間度量，海洋酸度的增加是指數式的；

- 遭受破壞的土壤數量呈指數式增長；

- 釋放到海洋的磷酸鹽和硝酸鹽的數量也呈指數式增長。

所有這些曲線的共同特性明顯地指向共同的源頭。問題在於：它是什麼？

肯定的是人口轉移，否定的是轉移方向

對於這個問題，反動和憤世嫉俗的潮流，確實存在於大眾媒體中，其反應指向人性或族群，或兩者兼而有之。正如詹姆斯·拉夫洛克在他關於蓋亞（Gaia）論文中的結論那樣，地球是患了所謂的“人類病”[5]。這些先生們站在典型的家長式立場，讓女人受到他們的特別關注。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非常堅定。不用說，地球的人數是環境方程中的一個因素。否認它是愚蠢的。而且，我們贊成人口的穩定 --- 一個所謂的人口結構轉型。但是我們要警惕專制，新自由主義和野蠻的解決方案，例如，人口的迷惑已經在一些人心中萌生了這樣的想法，即在“污染權利”模式的基礎上，建立可交換的“生育權利”。

人口結構的轉型根本上取決於兩個因素：婦女控制自己生育的權利（特別是在良好條件下的自由墮胎權利）和名副其實的社會保障（特別是養老保險制度，使老年人即使沒有眾子女的幫助也有體面的生活）。

如果我們排除了野蠻的解決方案 --- 我們顯然必須排除它們！ --- 人口轉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不能對環境緊急情況做出反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警惕：在大多數情況下，那

些尋求一個方案，以解決生態危機的人，想要從人口的問題開始，把真正的原因轉移掉。然而，原因並不是因為有太多的我們：

- 在世界範圍內，所生產的食品中，有50%從來沒有達到我們的盤子裡或冰箱中；

- 達到我們的盤子或者冰箱的那部分食物，往往不必要地旅行了數千公里；

- 這部分包括越來越多的肉，特別是牛肉，而過多的肉類飲食對我們的健康是不利的；

- 企業把錢財花費在廣告上，刺激我們產生人為的異常消費需求，對這個社會人際關係的貧乏，是可悲的補償；

- 公司競相制定出巧妙的方式，讓他們賣給我們的貨品失效並快速地損壞，而且讓這些貨品無法修復；

- 政府在軍備和安全監控設備上花錢和浪費巨大的資源；

- 經濟和政治決策者，他們完全知道危險，但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拒絕認真地組織向一個基於完全可再生能源作系統的過渡，而這個系統可以綽綽有餘地滿足人類的所有能源需求。

資本主義的雙重困境

你會明白，事實上，所有這些現象的原因既不是人口，也不是人性，而是資本主義，因為其生產模式的“本質”，是反自然的。事實上，環境惡化的指數曲線，只不過顯明了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貪得無厭”。

沒有增長的資本主義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原因很簡單：這個制度的基礎是競爭，以盈利為目的，每個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者被迫持續地尋求降低成本，特意用機器取代工人，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個限制是無情的：任何尋求逃避的人，將立即被處以經濟的死刑。

因此，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唯生產力的。它產生大量的商品，這意味著徵用和掠奪更多的自然資源，越來越多的剝削勞動力（在直接生產或間接服務方面，以及在勞動力的再生產上），還有，它日益破壞人們對其暴食特性的認識，破壞可以取代其暴食性的其它方案。

按這個瘋狂的資本主義的邏輯，“生態危機”本身被認為僅是“一個強大的新市場機會。”因此，商業媒體強調的是市場機會，可再生能源，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污染權市場，（偽）有機農產品市場等。全球性的問題消失了，全球解決方案也消失了，給一個個資本家的利潤胃口吞噬了。

很明顯，這個“綠色資本主義”的偽解決方案，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不會浪費時間來解釋它。正如愛因斯坦說的，你不能用導致問題的手段解決問題。市場機制和生產主義是生態危機的肇因，我們不能用它們解決生態危機。

在這個問題上，要注意這一點：正如我所說的，生態危機中，唯一打破指數破壞動態的一面，是臭氧層的消失。自從蒙特利爾議定書（1987年）以來，導致這一現象的氣體排放量確實顯著地下降了。然而，恰恰是僅在各國政府（由於一系列非常具體的原因，我不能在這裡詳敘）實行了監管措施而非市場機制的領域裡[6]，才達成了這個結果。

結論昭然若揭：不是大自然，而是資本主義社會，處於危機之中。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階段，這種生產方式的荒謬，嚴重地擾亂人類與其所屬自然之間的關係，以至於大部分人類已面臨著致命的威脅。這就是為什麼我不喜歡“生態危機”這個說法的原因。

所謂“危機”的說法並不正確。一個危機是一個系統的兩個狀態之間的轉換時刻。在我看來，我們不能用“危機”的說法，來形容我剛才講的指數式環境惡化現象的全部，因為在過去兩個世紀，這個現象已經擴大了。

這不是一個我們正在處理的“危機”，而是資本主義的雙重困境，同時在環境和社會層面（簡單來說：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以及資本如何對付它）的困境。

令人吃驚的是，在這兩個層面——社會和環境——該制度面對它甚至無法識別自己的限制。這完全證實了馬克思的分析，他說，“資本唯一的限制是資本本身”，他得出結論說，這個火神，如果我們不及時排除它的話，會耗盡“一切財富僅有的兩個來源：地球與工人”。

生態鬥爭，階級鬥爭

這種方法使我們能夠為必須發動的鬥爭，提供一個框架。這不是一個“生態鬥爭”——對於那些沒有太多社會問題的人，是某種過分的鬥爭。這是一個保存這個地球上生存條件的社會

鬥爭，特別是對工人階級，婦女，青年，農民，土著居民 —— 總之，對於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對於這些受資本主義威脅要被犧牲的群體來說，意義更是如此。

我們必須進行的環境保衛戰，是一場階級鬥爭，一場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它涵蓋幾乎所有的其他鬥爭，而且有可以凝聚所有這些鬥爭的潛力。鬥爭的結果，將決定選擇一個名副其實的人類 —— 愛護自身也愛護其所屬的自然 —— 還是選擇破壞社會環境的野蠻混亂。

這場鬥爭既是詩意的 —— 充滿感性和激情，因為要挽救世界的魅力，使我們成為真正的人類 —— 又是特別理性的。但是，我們不抱任何幻想：要贏得鬥爭，既不能依靠詩情，也不能依靠理智，至於是否美麗第一與嚴謹第二，則無關緊要。

鑒於最近幾個星期的新聞，我要以一個希臘比喻加以說明這個問題：在希臘財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和主要環境協會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就是幻想：相信人類的悲劇和諾貝爾獎得主支持的合理論證，可能說服對手，讓其知道他們的政策是荒謬的，即便是從他們自己的資本主義利益角度看，也是這樣的。

這種信念其實是虛幻的。問題原本不是“決策者”這方面的愚蠢或資訊的缺乏，而是物質利益之一。為了拯救氣候：1）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公司應該放棄開採其擁有的化石燃料儲備的五分之四，而這些儲備是其上市的根本；2）全球能源體系的主要部分 —— 幾乎占全球GDP的五分之一 —— 應在分期償還期滿前就報廢。在這兩種情況下，這種資本的摧毀會導致巨大的金融危機。

因此，我們可以作另一個希臘式比較：德國財長朔伊布勒（Schäuble）和世界銀行總裁拉加德（Schäuble）與氣候變化懷疑論者什麼共同點？是一個鐵的決心，旨在保護他們的制度，即資產階級制度，他們屬於這個制度，而且兩個多世紀以來，這個制度依靠對化石燃料的開採，建立了其大部分的權力。

各國的朔伊布勒和拉加德們準備以巨大的破壞為代價，維持這個制度，不惜犧牲數億人，甚至要把世界推入混亂裡，而這個混亂，除非用與所謂的“文明”完全無關的手段，否則是無法控

制的。

當損害造成時，朔伊布勒和拉加德們將會為受害者流下鱷魚之淚，奢談“自然災害”。你看，那些人認為市場規律是自然規律，同物理定律一樣 —— 如果不是更多的話 —— 是無法捉摸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熊彼特說，資本主義通過“創造性破壞”，從它的週期性危機中興起。歐尼斯特·曼德爾所稱的“晚期資本主義”，依靠“創造性破壞”，無法避開其社會和生態的雙重僵局。

所以，這真的是一場鬥爭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學術爭論，希臘的例子是一個縮影，告訴我們，這場鬥爭會多麼的無情。

解釋，阻擋，“謀取共識”？

“要做什麼？”就像人們所說的。... 必須做些什麼，使氣候災難最小？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不厭其煩地到處解釋事態的嚴重性及其原因，特別是在民間組織，工會，婦女組織和青年運動中做解釋工作。一個巨大而長期的教育工作是必要的，我們必須參與其中。宣講就是行動，播下巨大憤慨的種子，這是不可缺少的行動。

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反對服務於化石行業的所有重大投資專案：新機場，新管道，新的高速公路，新的鑽探，新礦，新的葉岩氣瘋狂，還有新風尚的地緣-工程師，後者夢想提供給地球一個溫度調節器... 而他們則控制這個調節器。

納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是絕對正確的，她呼籲要到處加強這個她稱之為“Blokadia（阻擋）”的抗爭運動。她是正確的，因為這種阻擋確實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基礎設施發展的現有水準，不允許資本持續燃燒大量化石燃料，而後者正在把我們置於這樣的處境，即到2100年，全球變暖6°C [7]。

有些運動，比如諾特爾達梅-代朗代（Notre-Dame-des-Landes）運動，或克依斯頓XL輸油管（Keystone XL pipeline）運動，或亞蘇尼園區運動（Yasuni park），就像是阻止它的攔路虎。我們要捍衛這些運動，讓我們協調

一致以捍衛他們。

第三個要做的事，是支援所有集體的，社會和民主的替代性倡議，推進共識，就共同商品及“像好父母那樣”共同管理地球，推出理念。例如，我們不要小看購買有機農產品的地方群組，也不要小看針對糧食主權的其他倡議。我們顯然不認為用這種宣傳蔓延的方式就可以推翻資本主義。然而，這些倡議可以幫助開發人們的覺悟意識，特別是當他們組織對話，從而打破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分離——資本擴展造成的——時，或當他們涉及工會運動時，更有意義。

但是，不言而喻，長期教育，阻擋行動，以及提倡使用普通產品，是不夠的。鬥爭需要一個可以取而代之的社會選項，一個計畫和戰略。我會很快就闡明這三個方面。

社會的選項：生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讓我們直話直說：所建議的替代社會只能是一種社會主義的。所涉及的是抑制生產的交換價值——這個價值服務於少數資本家的利益，並用生產的使用價值代替它——這個才是為了滿足真正的人類需求，是民主決定的。不存在其他可能的選擇，對於這種生產模式，沒有其它可能的替代者。然而，這種替代基本上對應於社會主義的定義。

婦女自治運動挑戰我們的組織，使我們充分衡量這個事實，即社會主義不僅涉及廢除雇傭勞動的剝削，還有反對壓迫婦女。無酬家務勞動服務於勞動力的維持和再生產，是該制度的一極，被父權精心掩蓋著，父權也壓迫同性戀者。我們的運動要嘗試從我們想要的那種社會主義中，吸取所有的結果。

以同樣的方式，我們需要探討的是，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生態危機的嚴重性意味著什麼。在這裡，一個現代化的改革也是必要的。我將簡要地提三點：

•技術。列寧說，“社會主義就是蘇維埃加電氣化。”顯然，如今這個定義是不夠的。如何生產電力？從煤，石油，天然氣，核能？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要求完全從可再生能源生成電力，並以最高的效率使用電力。換句話說，“生態危機”導致我們得出結論：技術不是中立的；

•限制。恩格斯全力主張“生產力的無限發展”將是可能的，他說，前提是，只要人類一旦擺脫了“資本主義的束縛。”我們可以討論恩格斯這句話的確切意義，他給予了知識等非物質方面的生產力以重要意義，但有一點是明確的：社會主義計畫充滿了丹尼爾·本薩義德稱之為“唯生產力糟粕”的東西，讓我們剔除它。我們正在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是尊重資源限制的，尊重生態系統和大自然迴圈節奏和運作模式的。是一個應用預防原則，放棄“對自然的支配”的社會主義。

•權力分散。馬克思說，巴黎公社是“最新發現的解放勞動力的政治形式。”在此革命經驗的基礎上，他放棄了較為中央集權的概念，宣佈他贊成以公社聯盟替代國家，並開始研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社區形式。事實上，要獲得聯合生產者的真正民主，不摧毀國家機器並代之以自我協調的自組織結構的分散聯盟，是沒有可能的。必要的能源轉型鼓勵我們以更大膽的方式選擇這種觀念，因為可再生能源涉及到權力分散，後者有利於社區管理或控制。因此，我們可以補充完全馬克思的公式：“公社是最新發現的解放勞動力和保持環境可持續性的政治形式。”（在該術語的真正意義上）。

我想，這三點就足夠以表明，生態社會主義並非某種舊瓶子新標籤那樣的東西：在環境遭受的資本主義破壞和“現實社會主義”的災難性經驗的情況下，這是一個解放計畫，它綜合了人類面臨的新挑戰。

方案：一個必然激進的特性

關於該方案，我會說，有人認為生態問題，會有轉移我們反對資本主義財政緊縮政策的風險，那些人的認識是嚴重錯誤的。恰好相反的是：在現實中，環境危機的緊迫性和嚴重性，給出了充分合法理由，要大力推進極為徹底的革命方案，它的基礎，是在工人的控制下，對能源和金融部門，實行不作補償或回購的雙重徵用/社會化。

這兩個行業非常深刻地交織在一起，特別是因為化石部門（勘探，鑽井，採礦，煉油廠，發電廠，電力線等）的巨大投資是長期投資，是信貸融資。上面談到，必須在能源系統攤銷期

滿前撤銷它，讓化石儲量留在地下，有鑑於此，國有化是前提條件，因為要集體運用杠杆和手段，在分散的框架內，以便能夠組織能源過渡，不受盈利需要的影響。根據這一重點，我們可以組織許多直接的需求，在此我不作詳敘。我只能說，從應對緊縮和傳揚共同財產理念這一雙重視角看，有兩個似乎非常重要的問題：

- 第一個是自由使用權：例如，免費使用對應於社會生活必需的水，照明，流動性和熱能（結合超越這些需求之外的快速進展式定價體系）的基本服務；

- 二是減少市場領域，以有利於民主的公共部門，例如：保障和改造住房的公共公司，公共交通公司等，後者具有民眾參與並有控制權這樣的機制。

策略：把農民，土著人，工人和女權主義的鬥爭融合起來

我將以策略作結束。很顯然，人類只能通過革命的手段打破資本主義造成的僵局。同樣清楚的是，必須進行的反資本主義鬥爭意味著工人階級（也即是說，所有那些直接或間接依賴於資本主義剝削他們的勞動力而生存的人——在生產，服務，或在勞動力的再生產方面剝削他們）的核心作用。

但革命不是兩個明確的軍隊——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界限分明地在戰場上針鋒相對。每一個革命形勢，是由全社會的危機，各階級，以及各階級部分，社會階層等的思想動機混在一起發酵而產生的。在這個發酵過程中，工人階級必須在實踐中展示其方案，提供問題的答案，並給一切被剝削和被壓迫者以希望，從而爭取主導權。

這裡，明確這一點是特別緊要的，因為“生態危機”就像核戰爭的威脅：它挑戰並攪動數以百萬計的社會各階層男人和女人，因為他們擔心這個星球的未來，憂慮自己孩子的未來。

巨大的生態動員，像大規模和平示威，往往有跨階級的一面，就是這個緣故。誠然，工人們（至少，在“發達”國家，工人階級形成人口的大多數）是多數，但他們不是以具有特殊角色意識的工人身份參加到其中的。

在我看來，在這個背景下，革命者的任務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不是停留在道路上散發傳單，呼籲作社會主義的反應。這些傳單是當然是有用的，但我們的任務，也是構建群眾運動，把它引向反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

本策略討論更為重要的是，工人階級現在是氣候鬥爭的後衛，而農民和土著人民處在反資本主義需求的鬥爭前線——這兩種情況下，婦女都起著關鍵的作用。我們必須打造的群眾運動，在戰略上要優先考慮把工人階級納入其內，工人階級的作用將是決定性的。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要明白具體原因，以解釋在一般的生態鬥爭中，尤其是在氣候方面，為何工人運動的參與比較次要。

解釋並不複雜。今天，當小農戶都在爭取他們的生計，反對農業綜合企業，他們提出的直接要求，同用以拯救氣候的土地綱領大體上相一致。此外，他們知道他們需要獲得普通人民的支援，以面對一個非常強大的想要消滅他們的敵人；因此，他們更傾向於“工農”聯盟而不是小資產階級的方案。經適當修改後，這同樣適用於土著人民，例如，幫助他們捍衛自己基於同森林共生的生活方式。

在這兩方面，婦女都發揮關鍵作用，這並不奇怪。不是因為有一個生態“女性本質”，而是因為一方面婦女負責世界上80%的糧食生產，而在另一方面，父權制分配給她們的勞動分工，是“養育”的角色，讓她們直接受到氣候變化，如水資源的日益匱乏，帶來的一些最殘酷影響。

對於工人，事物本身各顯差異。但是，事實上，緊張甚至是明顯的對立——起初——出現在他們這一方面自發提出的捍衛自己生計的需求，同另一方面從生態角度看應該實行的方案之間，這並非巧合。

不言而喻，這對立只是表面的，但它仍然代表一個障礙，特別是在企業對企業的鬥爭中。此外，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工作在污染企業的工人們說，他們意識到自己工作的生態有害性，又需要保住自己的飯碗，夾在兩者之間為難。

要克服這個緊張情況，只能做出反資本主義反應，單靠它，就有可能既對社會需求又對環境制約做出回應。這就是生態社會主義的總體戰略方針。

我不打算制定這些要求的目錄——它們多半需要在具體的鬥爭中得以發現明確，特別是

開始於為工作場所健康條件而做的戰鬥——但在我看來，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在工人控制下，大幅減少工作時間而不減少工資並補充招聘人員，還有大幅減少工作強度。

這是一個具決定性意義的要求，因為大幅度削減工作時間加上較低的工作強度，是反對失業的鬥爭，同時也是打擊生產主義的最佳方式。為了從生態角度瞭解這種要求的戰略重要性，特別有必要知道，考慮到氣候約束，工業生產和運輸的減少，是向可再生能源過渡的一個先決條件。在工人運動中傳播這些生態社會主義要求，有許多障礙。其中之一，顯然是一個工會官僚階層的存在，這個階層搞的是階級合作，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又一個幻覺！——可以伴隨一個走向社會生態資本主義的“公正過渡”。

致力於建設一個保護一般環境的，特別是保護氣候的群眾運動，使我們能夠從這項運動開始，在行動上，在群眾基礎上譴責資本主義的邏輯。這只會鼓勵工人拿起他們的武器參加戰鬥，扮演他們應有的最終決定性的角色。

革命的策略不是被列寧指責的工人自治主義 (workerism) 或經濟主義 (economism)。沒有結束綠黨 (the Green) 的問題。所需要的，只是在每一個層面和每一個環境裡，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僵局作出一個全面反應。這意味著隨著工人運動最好的革命傳統的更新，就像這首維也納工人的生態社會主義的美麗歌曲所表達的那樣，這是一個超越時代的歌曲：

我們才是新世界的建設者

我們是土地，播種者和種子

我們是下個豐收季節的收割者

我們是未來，是生活。

這是2015年7月28日第四國際的第32屆青年國際會議給的出一個部分成果單（已由筆者作了縮簡），該會議是在比利時舉行的。對所有幫助筆者做出修改和澄清一些觀點的人，筆者致以感謝。

註腳

[1]

<http://www.nytimes.com/2014/05/13/s...>

[2]

<http://www.realclimate.org/index.ph...>

[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

[4] 科琳娜·樂·寇勒 (Corinne Le Quere)，東英吉利大學廷德爾氣候變化研究所，“激進減排量的科學案例。”

<http://tyndall.ac.uk/communication/...>

[5] 詹姆斯·拉夫洛克 (James Lovelock)，地球是一個活的生命，蓋亞假說，Flammarion 出版社，香榭麗舍大街，巴黎，1999年。

[6]

<http://www.esrl.noaa.gov/csd/assess...>

[7] 科琳娜·樂·寇勒 (Corinne Le Quere)，同前。



南非的食物政治經濟學

傑克琳·科克

在當代的南非存在糧食危機，它的特點是浪費和饑餓的共存。它深深地牽涉到危機頻發的現存全球新自由主義政權。正如蘇珊·喬治所寫的，‘糧食正面臨生態、社會和經濟金融危機的十字路口，這是一個生動的例子，說明了它們彼此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在全球和國家的層面上，新自由主義糧食制度是一場災難，受益的只有主宰它的公司。強烈的市場集中，意味著大約四十個跨國公司有效控制全球糧食的制度，他們因而獲取可觀的利潤。僅僅三個跨國公司——孟山都（Monsanto）、杜邦（DuPont）和先正達公司（Syngenta）——就控制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種子市場。‘世界最頂級的十糧食加工公司控制了 28% 的全球市場，雀巢（Nestle）是遙遙領先的一個最大公司，接下來是百事可樂公司（PepsiCo）和卡夫食品公司（Kraft Foods），’約翰·希拉蕊說。

南非的全球化積累模型所顯示的樣式，同企業主導的糧食嚴格控制體系供應鏈模式是相同的。少數公司決定所有糧食消費的可用性、價格、品質和營養價值。

大公司的控制：麵包的例子

在南非，這種控制的方式是小麥麵包這個商品鏈的全球化，自從放鬆對農業的管制以來，小麥的生產、儲存、磨制、烘烤和零售這一條鏈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的集中，則是這種控制的標誌。所放鬆管制，包括在1996年廢除小麥委員會，以及在1992年取消麵包補貼。放鬆管制導致小麥對全球趨勢的反應越來越敏感。國內市場前所未有地受到蘭特（rand）對美元匯率波動的影響，受到國際小麥價格以及大宗商品投機的影響。政府對農民和農業商品關稅的支持，因管制的放鬆而被解除，農民面對來自歐盟和美國政府補貼的競爭以及貨幣幣值的變動，無可奈何，任其擺佈。

隨著城市化的進程，相對於小麥，玉米的消費降低，麵包正在成為一種主食，特別是在非正式居民區，那裡的人們缺乏可用的能源。

在過去的三年中，麵包的價格增加了80%，這對工人階級是災難性的。價格增加的部分原因是這個事實，即南非現在是小麥淨進口國，進口大部分來自阿根廷和德國。小麥的價格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得以制定，受制於投機和匯率的波動影響。但價格上漲也是南非的四家公司對價格壟斷的結果，這四家公司主宰了麵粉的碾磨和烘烤，另外三家占主導地位的糧食銷售公司的市場支配力也是導致價格上漲的原因。

農場的所有權變得越來越集中，同時，在過去的二十年裡，種植小麥的土地總面積下降了50%。南非現在有 5000 至 6000 名小麥農民，主要分佈在西開普省、自由州和北開普省。農場工人屬於收入最低者，而他們的數量在減少，並且以臨時工、季節工取代永久，全職員工的趨勢很強烈。農場所有權高度集中且被大公司控制，控制土地的只不過是三個糧食存儲公司。只有兩個種子公司向商業農民供應小麥種子。南非80%左右的麵粉加工行業由四個公司控制：先鋒食品公司（Pioneer Foods，產生了Sasko麵包公司，轉過來又產生了藍鳥麵包‘Blue Bird’公司、薩利叔叔麵包‘Uncle Salie’公司和天然收穫麵包‘Natural Harvest’公司）、虎牌食品公司（Tiger Brands，生出奧爾巴尼‘Albany’公司）、第一糧食通用食品（Premier Foods Genfoods，產生了藍絲帶‘Blue Ribbon’公司和BB公司），還有食品公司（Foodcorp，產生出陽烤‘Sunbake’公司）。這四家公司——食品公司（Foodcorp）、虎牌食品公司（Tiger Brands）、第一糧食通用食品（Premier Foods Genfoods）和先鋒食品公司（Pioneer Foods）——擁有他們自己的麵包房和生產大多數南非人食用的麵包。

正式零售部門也是高度集中的，由三個連鎖超市有效地控制著，這三個超市是‘需品來’（Shoprite），‘取與付’（Pick n Pay），以及斯帕（Spar）。團結工會曾批評這三個零售商，在進口成本下降和糧食價格通脹降低的情形下，牟取暴利。不平等深深植根于小麥轉成麵包這個鏈條中的每個節點。南非最大零售商‘需品來’（Shoprite）的市場價值明顯地反映了這一點。2010年，其首席執行官懷特尼·巴森，賺得了627百萬蘭特的薪金和津貼，包括其594百萬蘭特的股票期權的現金兌現；同時，需品來公司全職工人的平均工資是一個月3600蘭特。在2014年頭六個月，巴森獲得了49.9萬蘭特，同他2013年整年賺得的（50萬蘭特）差不多一樣。這使得他的工資是其員工平均工資的725倍。巴森作為‘利潤的天才’出現在2008年的‘金融郵報’的封面上，巴森被描述為‘令人難以置信的嚴行紀律的人，很聰明、大肆努力者，可能是在南非最被低估的首席執行官。’

‘麵包的政治表明了糧食體系的錯誤，’2014年約翰尼斯堡女權主義者圓桌會議的一位參與者說。這些‘錯誤’包括這個事實，即現代企業公然蔑視他們追逐利潤的道德後果——幾乎在小麥麵包轉換鏈上的每一處都出現了密謀勾結和控制定價，這就是明證。例如，2007年，虎牌食品公司（Tiger Brands）被罰款98.9萬蘭特，它承認曾與競爭對手（第一糧食通用食品（Premier Foods Genfoods），先鋒食品公司（Pioneer Foods）和食品公司（Foodcorp））串謀提高麵包價格，每一條麵包漲價30到35分錢。正當競爭委員會開始調查麵包定價問題時，虎牌食品公司的四個高層管理人員兌現了價值44百萬蘭特的股票期權。競爭法庭裁定被告串謀勾結並罰款，但是，根據安妮·克羅蒂說，‘罰款很容易被虎牌食品公司吸收，’由於該公司當年的收益是22億蘭特。不久之後，虎牌食品公司的奧爾巴尼麵包價格每條上升40多分錢（引用的理由是較高的小麥價格，而非罰款），其後，其他三個糧食業巨頭相繼提價。競爭委員會批評這種加價行為，說：‘這種公然的暴利侮辱了全國人，特別是窮人。’後來，在與競爭委員會達成協議，先鋒食品公司承諾支付250萬蘭特給國稅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基金（National Revenue Fund）作為行政處罰，以創建農產品競爭力基金（Agroprocessing Competitiveness Fund），基金由工業發展公司（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管理。此基金旨在促進食物價值鏈的競爭力、就業和增長。該基金將以優惠條件向中小型企業提供融資。目前還不清楚這筆錢是否花了。其他串謀操縱定價的例子比比皆是。2009年，沙索（Sasol）公司因為其串謀化肥定價行為，被競爭委員會罰款250萬蘭特。競爭法庭已聽取了一些大交易商對最大的糧食交易商Senwes的反競爭行為的指控。競爭委員會還調查了乳製品產業，指控南非一些最大的乳製品企業——三葉草（Clover），帕瑪拉特（Parmalat），萊迪史密斯乳酪（Ladysmith Cheese），林地乳製品（Woodlands Dairy），蘭斯林木（Lancewood），雀巢（Nestle SA）和乳林（Milkwood）——包括操縱價格在內的反競爭行為。這個企業主導地位的結果是，造成南非糧食體系的深深不公正性、生態的不可持續性和不安全性。

不公正性：糧食不安全性的‘慢性暴力’

不公正性的最明顯證據，是浪費和糧食不安全性的‘慢性暴力’共存。暴力通常被認為是一個事件或行動，它在時間上即刻出現，在空間中突然爆發。然而，‘慢性暴力’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釀成重大損害。正如羅布·尼克森說的，慢性暴力是‘暗中為害的、受操控的、平平淡淡的、逐步發展的，並且比較隱蔽的’。

糧食不安全涉及到一種緩慢形式的暴力，因為其對人體的傷害影響相對隱蔽，其對人的能力和潛力的侵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發生。現在，由於長年營養不足，有些兒童現出了發育不良（生理的和智力的）的跡象，這就是明顯的證據。基於1萬戶的樣本調查，南非國家健康營養調查（South African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發現，幾乎一半的南非人要麼目前就遭受饑餓，要麼就面臨挨餓的危險。調查發現，45.6%的人口是‘糧食無

保障的’；26%的人在經受饑餓；進一步，還有28.3%的人處於遭受饑餓的風險之中；還有四分之一的三歲以下兒童，由於營養不良，有中度至嚴重的發育不良跡象。一個孩子，若從麵包或玉米稀飯中吃到了基本的卡路里，應會是活潑的，但根據萊奧妮·茹貝爾的說法，‘缺乏像維生素A、維生素B、鋅或鐵這樣的關鍵要素，意味著在身體系統裡面有危險的腐蝕。機器在繼續運行，但它運行的方式處在最佳情況以下。’在醫界有廣泛的共識，即：如果一個孩子在受孕和兩歲之間的成形關鍵月份裡，未獲得所需的營養，那麼身體和認知會產生不可逆轉的損害。

‘處理饑餓問題的第一步，也許是直截了當，描述它對真實的人們意味著什麼，而不是遮遮掩掩或把它推到“糧食安全”這類技術名詞的後面，’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Oxfam）這樣說。貧窮黑人家庭的孩子是這種慢性暴力最明顯的受害者。同時，在南非，估計每年糧食生產的31%——那就是，1000萬噸的食物——以某種形式的廢物浪費在整個供應鏈中，而可用的食物大約是3100萬噸。這種浪費發生在糧食供應鏈中的五個點：農業生產、收割後的處理和存儲、加工和包裝、配送和零售，以及消費者行為。食物浪費最厲害的是水果和蔬菜，其中超過50%的生產浪費在供應鏈上。

在南非，市場已經成為大多數家庭食物的主要來源，因此這些家庭獲得食物的關鍵問題是負擔能力。在南非（如同全球的情形），糧食價格近年來急劇增長。例如，玉米粉成本最近上漲了30%，白玉米上漲了73%，白色和棕色麵包上漲了將近13%。根據國家統計局（Stats SA）統計，2013年9月和2014年9月之間，糧食價格上漲了9.9%。隨著失業、外包和臨時工作的增加，家庭收入都在下降。因而，糧食不安全/饑餓問題處在兩個現實的中心：家庭低收入和食品高價格。在這裡，低收入的意思是，就像整個世界大多數人一樣，負擔不起好的營養糧食。城市貧民經常把70-80%的資源花在食物上，糧食價格增加時，他們極易受傷害。

在南非，糧食價格預計將繼續進一步上漲，

主要由七個因素造成：

- 產業化農業的投入成本不斷上升，比如水和電等。自2010年以來電力價格上漲了200%以上。油價波動。石油價格的上升提高了依賴石油的肥料、農藥和長途運輸的成本。

- 氣候變化。由於氣候變化（根據2011年的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報告），到2030年，主食價格將翻一番。更極端的天氣事件，比如乾旱和洪澇災害，特別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對農作物的危害尤其嚴重。

- 把可耕種土地用於生物燃料和採礦。在南非，農業用地被轉用於大豆和高粱種植，從而便於生物燃料的生產。幾乎有一半（46.4%）的南非高潛力可耕種的土地位於姆普馬蘭加，由於目前採礦活動的，那裡已經失去了其26%的高潛力耕地；有42個新煤礦計畫在該省開發。2012年糧食和農業政策局的報告估計，採礦活動導致的玉米產量損失，可能使玉米價格增加14%。

- 組織成強大聯合體的公司（如上文所述）共謀操縱價格。

- 大宗商品投機。幾位分析師得出結論，2008年全球糧食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的投機和生物燃料的推動。這場危機把數百萬的人推入貧困。正如蘇珊·喬治指出的，糧食危機並非對每一個人都是壞消息：‘在2007年的最後三個月，三個主要的跨國穀物公司之一，嘉吉公司（Cargill）的利潤上升了86%。’

- 過去三年的農業貿易自由化。推動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國際談判讓富裕國家受益，因為富裕國家獲得了全球北方和南方的市場。發展中國家的小農戶處於不利地位。在南非，對農業部門放鬆管制和實行自由化，就意味著把農民暴露在國際競爭中，讓他們無奈地面臨大宗商品的投機、零售力量的增加和多種形式的國家支持（如市場管理局，可靠的價格和市場）的取消。

生態可持續性

在這種不公平模式中，企業追求利潤，意味著窮人負擔不起的糧食價格，除此以外，當前糧食制度還是生態不可持續的。產業化農業要擔負11%的南非碳排放量的責任；如果把運輸糧食（‘食物里程’）的費用包括在內，這個數字還要高些。產業化農業嚴重依賴於兩種生產要素的可用性：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和水。水資源短缺將會加大氣候變化和能源的成本。兩者都將增加糧食的生產和運輸成本，特別是對基於石油的化肥和殺蟲劑的依賴。由於氣候變化，糧食價格會上漲，糧食生產會下降，家庭層面的糧食不安全性會隨之增加。

下降的糧食安全性

糧食安全性的下降也是該糧食管理體制的特點。在農產工業生產的食品，特別高度加工的食品中，有毒化學物質越來越多，在‘垃圾糧食’和‘速食’組成的日常飲食中，營養不良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就全球而言，快速變異的病毒和耐抗生素藥的細菌引發的流行病日益增加，而工廠化養殖是其主要的根源。因為許多飼養禽畜的農民經常把抗生素注入其飼養的禽畜，如沙門氏菌這樣的病原體對抗生素產生越來越強的抗藥性，從而更難被消除。根據邁克爾·坡蘭（Michael Pollan）的說法，‘對占主導地位的農產工業大公司而言，糧食被加工處理得越多，獲取的利潤就越多。’

至於有關基因修改（GM）糧食，其長期的健康風險尚在未知中。轉基因技術是受利益驅使的，它讓大公司對糧食鏈具有前所未有的控制力。

‘促進轉基因作物的資本主義動機是清清楚楚的，因為納入轉基因農業的農民依賴於企業銷售的種子及其附隨的農用化學品，’約翰·希拉蕊說。非洲生物安全中心揭露了南非最普遍的白麵包品牌中含有高水準的孟山都（Monsanto）轉基因大豆。正如該研究組織發言人所說的：‘轉基因大豆種植場噴灑大量的除草劑草甘膦（herbicide glyphosate），其殘留物進入到麵

包裡。大多數這種品牌的白麵包含有21%至91%水準的轉基因大豆；草甘膦同許多健康風險有關聯，包括慢性腎臟疾病，人類及動物的出生缺陷，以及自發性流產的風險的增加，都與草甘膦有關。’轉基因小麥目前正在研發中。

新自由主義的食物系統：毒根

饑餓是貧窮和無助的一面。它是無法獲得收入，無法獲取水和土地等生產資源的問題。問題的原因，是無良雇主和商人操縱新自由主義的食物系統，這個系統越來越不公平、不安全和生態上不可持續，由大公司控制，但驅動大公司的是利潤而不是社會的需要。這些公司的力量在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重組過程中，把南非納入金融化的資本主義制度。此制度威脅我們大家的生存，它對工人階級具有特別災難性的影響。

糧食危機的廣泛性質，為爭取替代性的生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提供許多不同的切入點。這樣一條道路的基礎將是‘糧食主權，意味著健康權利，可持續地以民主方式控制生產，意味著與自然協作而不是違背自然的農業生態學方法。我們必須這樣做。我們不能坐在著火的房子裡，讓火焰掠燒屋椽，掠燒我們的眉毛，卻詢問建一所新房子是否可能的問題，’貝爾托·布萊希特說。‘我們必須拋棄舊的結構，想法建立一個新的。’



伊斯蘭國簡史

亞當·漢尼

在11月13日巴黎襲擊事件之後，很多左派把伊拉克暨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的崛起同中東帝國主義暴力的加劇聯結起來。

一方面，是戰爭和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據信，是聖戰恐怖主義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同暴力和破壞鎖定在一起，愈演愈烈。“帝國主義的殘酷和伊斯蘭主義的殘酷相得益彰，”巴黎襲擊之後不久，法國反資本主義新黨（NPA）是這樣說的。為了打破這種虛無主義的死亡之握，我們需要反對外國干涉，制止帝國主義的暴力，並停止對中東、非洲和其他地區國家正在進行的財富掠奪。

這種說法的基本邏輯無疑是全面的。但就解釋作用而言，這種分析還遠遠不夠。它患在過於一般和抽象——關於這個特殊時刻的特殊性，關於伊斯蘭國運動的性質，沒有告訴我們什麼東西。如果認為原因不言自明，歸因於伊斯蘭國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天然相似，那麼我們可能錯過造成該組織異常迅速崛起的所有重要背景和歷史。

對西方侵略以及伊拉克、敘利亞和該地區其他國家遭受的災難性情況的反應，為什麼會採取這種特殊的思想政治形式？伊斯蘭國在阿拉伯世界和歐洲這兩個地方所獲得的支持，到底要如何解釋？總之：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會這樣？

伊斯蘭國崛起的真正成因，需要循跡追溯至2011年和2012年爆發的阿拉伯起義。這些起義代表了巨大的希望，一個必須繼續捍衛的希望。他們遭到了鎮壓和逆轉，無法有任何根本性的前進。正是在這個破綻，被伊斯蘭組織鑽了進去，它們的崛起，緊緊瞄準的，是對起義及其體現的人民民主訴求的鎮壓。

這一點沒有必然性。只是，起義所面臨的

困難，創造了一個真空，這個真空必然會被其他東西填補。

伊斯蘭國的世界觀是這種新現實的思想表達。需要明確的是，許多西方評論家似乎認為，伊斯蘭國的崛起，是意識形態或宗教的結果，這種簡單化的解釋，是不可取的。該組織的成長，有非常現實的社會政治根源可做解釋。

但是，意識形態上的表達，確實有助於我們理解各種交互因素——宗派主義的破壞性蔓延，敘利亞和伊拉克的破壞性壓制，以及中東的不同地區和國際強權的利益——如何相互作用，導致伊斯蘭國的崛起。

這就是退卻的辯證法：伊斯蘭國的增長，讓2011年的願望，困難更大，越發難以實現，因為該地區已陷入多重的深層危機。雖然框架這些危機的伊斯蘭國思想是顯然虛偽的，但卻同一些人的生活經驗產生共鳴，符合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因為這個世界讓人感到明顯的混亂和毀滅。這個過程中相互作用的各方，使得目前的局勢非常危險。

2011年幽靈

2010年和2011年在突尼斯和埃及開始的抗議者動亂活動，隨後引發整個地區的反響，這是中東地區五十年多年來所見過的最重大起義。重要的是，當太多的人很快地從一開始就看衰他們，——或者更糟，把他們當作外部詭計挑動的某種陰謀，在這個時刻，要記住這些運動體現的初始承諾。

這些抗議活動，在幾代人的時間裡，第一次吸引了數百萬人進入群眾性的政治行動，嚴重地動搖了現有的國家結構和西方盟友政權的鎮壓控制力。最顯著的，這些運動面向區域範圍內的普通人民和分享整個中東地區人民的經驗。

他們對政治覺悟和組織形式的影響，繼續在世界各地顯現。

這些起義從一開始就很明顯的表明，利害攸關的問題，遠遠超出了許多評論家所做的“民主與獨裁”的簡單描畫。其吸引人們走上街頭的深層原因，深刻聯繫著該地區的資本主義形式：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結構調整，全球性危機的影響，以及受西方長期支持的專制員警和軍事政權對阿拉伯國家的管轄方式。

這些因素都需要從整體上觀察，而不是當作單獨的或可分隔的原因。示威者不必一定明確地表達出這全部因素作為他們憤怒的原因，但這個基本現實意味著阿拉伯世界面對的深刻問題，絕不會通過簡單的去掉個別獨裁者而獲得解決。

為了防止任何對政治經濟結構的此類挑戰，西方列強及其地區盟友支援的精英迅速介入並試圖平息變化的可能性。採用各種手段，用一批政治演員在每個國家塑造不同的反革命過程。

在經濟政策層面上，幾乎沒有改變，在如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和約旦這樣的地方，西方捐助者和國際金融機構堅持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的連續性。除了這個經濟持續性外，還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推出新的法律和緊急命令，禁止抗議，罷工和政治運動。

同時，該地區的政治和軍事干預迅速擴大。在西方直接軍事干預下的利比亞分裂，以及沙特領頭的對巴林起義的鎮壓，是這一過程中的兩個關鍵時刻。2013年7月埃及軍事政變也標誌著舊政府結構重建的一個關鍵點，並證實了海灣國家逆轉埃及革命進程的有害作用。

也許最重要的是，敘利亞阿薩德政權造成的社會和自然的破壞，包括成千上萬人的死亡和邊境內外數百萬人的流離失所，進一步強化了整個區域意義上的絕望，取代了2011年的最初樂觀情緒。

伊斯蘭國與它的前身，同第一階段的這些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起義，2011年期間震撼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罷工和原創性抗議運動，基本上不相干。事實上，埃及獨裁者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後，有關伊斯蘭國（當時被稱為伊拉克伊斯蘭國）可能見到的唯一評論，是反對世俗主義，民主和民族主義的一份警告聲明，敦促埃及人不要“用更糟糕的取代較好的東西。”

然而，由於期待真正改變的最初願望看起來日益受挫，伊斯蘭國和其他聖戰組織作為這種逆轉的象徵而興起，表達了革命過程的表面退卻和對混亂之日益強烈的感受。為了更好地理解為什麼是這種情況，有必要回頭瞭解一下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和世界觀。

真實性，殘暴性，烏托邦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通常被定義為回到宏偉過去之路的理想，這個理想由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後的頭幾代伊斯蘭統治者塑造（按照遜尼派的說法）。伊斯蘭國主張這一目標，並意圖要按社會實踐和宗教法實行這樣的統治。

但把伊斯蘭國退化到一個簡單的七世紀式領土收復主義，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該組織重視政府建構計畫，投入很大的努力，在其控制的領土上建立各種金融，法律和行政機構。雖然這些地區的邊界在不斷地變化，對於什麼叫“控制”，有不同的評估，但伊斯蘭國擁有廣闊的領土範圍，一些估計認為，它統治的人超過1000萬。

作為這個非常現代化專案的一部分，該組織優先發展一個技術先進的媒體和宣傳網路，使它在性質上有別於其它伊斯蘭統治的實例，比如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在那裡電視-裝飾樹和電腦“運行”仍然處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老舊景象中。

一位研究人員估計，伊斯蘭國媒體單位每一天產生近四十個獨特的媒體作品，包括多種不同語言的視頻，照片散文，文章和音訊節目。這種級別的程式設計媲美任何電視網路，並同老舊

的基地組織模式形成對比，後者依靠的是自阿富汗的群山走私到半島電視臺的VHS顆粒錄影帶，在那裡他們受到變幻莫測的敵對新聞製作者和情報機構的挾持。

伊斯蘭國推行宣傳的分散式網路也很獨特，他們使用一大批推特（Twitter）帳戶和匿名的網站，如justpaste.it和archive.org 來承載他們的媒體。阿卜杜勒·巴里·阿特萬，一個阿拉伯新聞記者，他關於伊斯蘭國崛起的報導採用了熟悉內情者的資訊，他聲稱，該組織控制了十萬推特（Twitter）帳戶，每天的攻勢是發送五萬條推文。這和其他形式的社會媒體，是伊斯蘭國招募新兵和傳播其資訊的管道。

伊斯蘭國精通技術的一面已廣為人知，最近，在奧巴馬的淺薄描述中，稱他們為“一幫具有良好社會媒體的殺手”。但伊斯蘭國對技術的有效利用，或只是對秘密和不斷監測的條件的反應。相反，伊斯蘭國對社會媒體和技術的高度重視，指向的是該組織對表演性和自我表現的狂熱心。

事實上，很難想像該地區的任何其他政治或宗教實體如此嚴肅地對待“品牌”問題，並把某種自我形象投射到外部世界。

在這一思想資訊內，三個關鍵比喻脫穎而出。其中第一項是任何原教旨主義運動一個不言而喻的性質：宗教的真實性，或者對宗教經典不斷示忠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構成“真實性”的東西，是必須在對立觀點面前不斷加以確定，執行並捍衛的東西。

伊斯蘭國聚焦於這個問題的例子很多。例如，一些評論者已經注意到，該集團顯然奇怪地強調位於敘利亞北部的微不足道的小鎮達比克（Dabiq）。達比克並不擁有任何軍事用途或自然資源。儘管如此，伊斯蘭國的線上雜誌的名字就是該地名，當攻取該鎮戰鬥開始後，據報導，該組織湧入了大量新兵。

原因呢？達比克在伊斯蘭的末世論中有特定地位，是未來與異教徒軍隊決戰的現場，這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將預示著世界末日的開始。攻取這一敘利亞小城鎮，伊斯蘭國可以顯示自己忠實地追隨幾個世紀前預言的路徑。與此類似，該組織宣佈，拉嘎（Raqqa）鎮作為其西部總部，也引起阿拉伯穆斯林的強烈共鳴。這個鎮曾是哈倫·拉希德（Harun al-Rashid）的家鄉，哈倫·拉希德是阿拔斯（Abbasid）王朝的第五位哈里發，而許多人視阿拔斯（Abbasid）王朝為伊斯蘭的黃金時代。

伊斯蘭國宣傳的第二個核心性質，是眾所周知的“暴行”宣傳：現場斬首，處決，以及其他令人震驚的內容，已在世界各地通過電視和電腦螢幕讓該組織發聵振聵。刻意嚇人的資料保證了媒體報導的無孔不入和一舉成名。

比較之下，基地組織花了幾十年時間以及9-11的襲擊，才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是，殘暴，不只是一個吸引眼球的標題。它還特意用來產生恐懼。

這一策略非常成功——當2014年6月伊斯蘭國接近摩蘇爾城時，伊拉克軍隊所作的，只是棄械逃跑，讓聖戰者繳獲了數不清的武器和軍用運輸車輛，還有報導所說的伊拉克中央銀行的4億美元（儘管後一故事有爭議）。

最後，也許最重要的是，暴力的過度應用是有意的，伊斯蘭國把這個行為描述為“兩極分化”的戰略——目的是引爆血腥的教派戰爭，鞏固伊斯蘭國在全地區的擴張。

儘管如此，同西方媒體所散佈的刻板印象相比，伊斯蘭國宣傳的主要內容，實際上，比該組織最聞名的暴力更加世俗。該集團思想比喻中的第三個是：烏托邦理想，旨在展示“哈里發”時代平民生活的樂趣，展示他們中間的豐富經濟活動，美麗風景和生活的穩定。

一個詳盡的研究，記錄了從2015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該組織生產的所有宣傳品，發現超過一半的宣傳材料都集中在烏托邦這類主題上。同樣，上述的雜誌‘達比克’，大量地融入了這些題材。該組織如何在阿拉伯世界建立自己的

形象，是最為人誤解的因素，而且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其指向，似乎特別針對阿拉伯觀眾。

看看伊斯蘭國的阿拉伯語Twitter帳戶，看到的是沒完沒了的嘮叨，多是看似空洞乏味的伊斯蘭國日常生活瑣事：水管搞定了，熱鬧市場上五顏六色的水果和蔬菜，新鮮麵包，以及新的牙科診所。

該觀測指向不可否認的事實，即伊斯蘭國有意識地把自己裝扮成為一個在戰爭動盪的混亂區域之中的安定和平之島。要瞭解伊斯蘭國之所以拉近一些階層的人民，這一點是重要的。在危機深重的時刻，一定程度的安全承諾，是使伊斯蘭國具有吸引力（或者，最起碼，一個不太差的選擇）的部分原因。

認識這個烏托邦的承諾，是理解該組織在過去一年裡如何得以擴展的重要線索。這並不是說，伊斯蘭國統治，特別是在那些遭受其宗派暴力的地方，不是殘酷的或者鎮壓的，而是恰恰在其烏托邦承諾的空洞處，可以找到一些希望。

管理“野蠻混亂”

伊斯蘭國這個三位一體的宣傳——宗教的真實性，殘暴性和烏托邦——本身就是一種更廣泛末世論的反思：歷史和未來的時期劃分，立基於末世時間的迫近。這是伊斯蘭國同其他聖戰組織，如基地組織之間的主要區別。

不同于基地組織，伊斯蘭國傾向於大為強調的是，有順序地展開與先知預言時刻有關的歷史階段（達比克的例子就是一個說明）。這就是為什麼在該組織的宣傳中，真實性問題如此突出。不過，不那麼明顯的是，對於以上討論的殘暴和烏托邦比喻，這種末世論也為兩者提供了解釋。

最明顯的反映，可以在一個關於聖戰方略的普及參考書中找到：‘殘暴管理：最關鍵的階段，伊斯蘭國將通過這個階段’（AoS），該書2004年首次用阿拉伯文公佈在互聯網上，下麵的署名為阿布·貝克爾·納吉（Abu Bakr Naji）。不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應認為這本書是（像一些新聞認為的那樣）聖戰組織的執行手冊或戰略手冊；該文在這些圈子的流行，透露出一些與聖戰思想有關的世界觀。

簡而言之，AoS（‘殘暴管理：最關鍵的階段，伊斯蘭國將通過這個階段’ Administration of Savagery: The Most Critical Stage through which the Islamic Nation Will Pass）的主要目標是解釋他們需要採取的那些步驟，以便結束該地區的“大國”（主要是美國）支配，並按照伊斯蘭原則建立一個國家。AoS（‘殘暴管理：最關鍵的階段，伊斯蘭國將通過這個階段’）描繪了一個伊斯蘭國家得以成立前，必須通過的兩個不同歷史階段。

首先，作者認為，“煩惱疲乏”的階段是阿拉伯世界在該文寫作時間（21世紀初）經歷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任務是通過“煩惱運作”騷擾和破壞敵人，包括諸如轟炸旅遊勝地和經濟重區（特別是與石油有關的那些地區）的行動。

這些行動將迫使阿拉伯各國政府在整個廣大地區佈置他們的安全部隊，這是一個昂貴的任務，將不可避免地將新的目標暴露出來。此外，這些組織作出這些行為而不受懲罰之能力的表現，是一種行動宣傳，有助於吸引新的參加者。

這些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引起國家結構的動盪崩潰局面，這就是作者所描述的“野蠻混亂”階段。這時期對應於個人和社會不安全感的廣泛增加，缺乏基本的社會規則，各種形式的社會暴力上升。它被視為國家結構萎縮和崩潰的自然結果；此外，它的到來，被視為對聖戰組織是正面有利的。踏入隨後的混亂中，聖戰者的職責是對形勢負責，“管理或控制野蠻局面”。

具體來說，這意味著“給住在野蠻地區的人民提供食物和醫療，安全和司法保障，以組織的手段阻止任何試圖攻擊野蠻地區的人，從而保障安全邊界，以及建立防禦工事”這一類的服務。

“野蠻管理”的這一面，明確反映了伊斯

蘭國是如何看待它目前在阿拉伯世界的作用（特別是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並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在其宣傳中烏托邦主題是那麼突出。

此外，在AoS的設計中，暴力的作用也是基本的。對應於伊斯蘭國對殘暴性的運用方式，AoS建議要刻意極度使用暴力並讓它具高度表演性。“屠殺敵人，讓其恐懼”將有助於“使[敵人]在攻擊前思想一千次。”這包括所謂“付出代價”的行動，其目的是讓敵人由於恐懼後來的報復而不敢輕啟攻擊。

同樣，所有行動的目標，應該是通過使用極度的暴力，製造社會的“兩極分化”。就像AoS作者寫的：

“把群眾拖投入戰鬥，需要更多激發反對的行動，使人們願意或者不願意地進入戰鬥，這樣每個人都會去到他支援的一方。我們必須使這種戰鬥非常暴力，使得死亡是轉瞬之間的事，讓兩個組織認識到，進入這種戰鬥經常會導致死亡。”

此公式有一種不可抗拒的結局：情況越糟越好。作者承認（並鼓掌）這種自我實現的邏輯，並指出，即使聖戰組織在野蠻的直接管理中失敗，那麼結果實際上仍然是積極的：失敗，這是說，“並不意味著結束此事；相反，這種失敗會導致野蠻的加劇”。

簡言之，必然目的論已設立，即在廣泛負面的情況下興旺發展，相輔相成和日益惡化的暴力迴圈的存在，其本身就是該模式正確性的證據。

宗派主義和後-入侵伊拉克時代

伊斯蘭國世界觀和整個區域宗派主義的災難性上升，兩者之間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雖然AoS的作者和早期聖戰組織的領導人非常小心，以避免由於穆斯林內部的暴力而遭宗教制裁，並譴責針對其他穆斯林的任何蓄意攻擊，而2000年中期伊拉克基地組織（AQI）的出現將改變這

個情況。

在約旦的紮卡維（Abu Musab Zarqawi）的領導下，伊拉克基地組織（AQI）明白了，要造成兩極分化，爆炸宗教儀式和機構是最令人震驚的有效工具之一。在伊拉克，紮卡維有意識地尋求點燃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內戰，有計劃地對什葉派社區發動了一系列破壞性攻擊。

這樣的活動，再加上可怕的斬首錄影，讓他贏得了“屠夫教主（Sheikh of the Slaughterers）”的稱謂，導致烏薩馬·本·拉丹和紮瓦希裡的老基地組織領導層的憤怒增加了。事實上，後者在2005年寫了一封著名的信給紮卡維，責備這個約旦人，在信中他描述了“屠殺人質的場面”以及紮卡維對伊拉克什葉派的攻擊，認為這種戰術會使基地組織疏遠他們必要的支援基礎。

然而，不管紮瓦赫裡的抗議，有一系列與紮卡維無關的因素，為宗派主義的興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首先，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後美國佔領軍實施了臭名昭著的去復興黨（de-Ba'athification）政策，導致該國遜尼派人民被深廣地邊緣化。在此政策下，任何薩達姆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成員立即被解雇失去工作，排除在公共部門就業之外，並被禁止領取他們的養老金。

正如當時許多分析師指出的，這是一個災難的處方。復興黨黨員身份曾是幾乎所有國家工作的要求，所以這個政策導致成千上萬的教師，醫生，員警和低級公務員的大規模解雇。通過這種方式把政府掏空，美國實實在在地保證了基本社會服務的崩潰——一個社會的災難性情景，而這個社會過去遭受了二十年的制裁和戰爭。

遜尼派邊緣化不只是發生在經濟領域。美國軍隊頻繁對遜尼派聚居的城鎮和村莊發動攻擊，數萬囚犯禁錮在美國管理的監獄中，在那裡，隔離，酷刑，以及“泰羅化官僚式拘留（Taylorized bureaucracy）”[2]被經常使用，以加強佔領。

這些監獄中最臭名昭著的是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拘留所，2003年顯示美軍在這裡虐囚的照片發佈之後，震驚西方意識。緊接著這種醜聞，許多囚犯被從阿布格萊布監獄轉到另一個監獄，布卡營（Camp Bucca）監獄。正是在這裡，一名被拘留者，後來聞名的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來此同一群曾在阿布格萊布監獄呆過的前復興黨軍官們建立了牢固的關係。

當然，今天，巴格達迪是伊斯蘭國的領導者，這同一批前復興黨官員現在是他最親密的代表和顧問。在這種方式下，落在美軍手中的遜尼派囚犯經驗不僅進一步確立了該國的新興宗派分支，而且腳踏實地，鑄造了伊斯蘭國本身。

從2006年起，宗派裂痕繼續深化，隨著美國與伊朗的默契，什葉派民兵支持的什葉派主導的政府得以合法化。隨著2011年美軍從伊拉克正式離開後，形勢只是惡化。在再加上社會經濟的不安全性，遜尼派邊緣化產生了真正的社會基礎，伊斯蘭國對其的吸引力，超越了宗教或意識形態的因素。

伊斯蘭國中層幹部的很大一部分是前復興黨人員，他們之所以被該組織吸引，部分原因是經濟激勵措施所致。經濟回報也吸引普通人員。例如，支付給伊斯蘭國戰鬥人員的錢，估計是大約每月300至400美元左右，超過伊拉克軍隊薪水兩倍。現在，卡車司機和走私者運送伊斯蘭國生產的石油從敘利亞到伊拉克[3]，其主要動機是獲得謀生的機會。在其所有的宗教偽裝下，伊斯蘭國的國家建設項目有一個非常物質的現實。

許多伊拉克問題評論家經常把這一結果粉飾為布希政府的愚蠢和傲慢，以及佔領後繼承明顯失誤的政策所導致的。這種方法有個假定，就是美國確實在尋求一個穩定統一的伊拉克。

然而，由政府領導的，具有較強民眾支持的，非宗派的統一的伊拉克，對於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是一場災難。這種可能性從未有過機會，不

難看出，從一開始，伊拉克沿著教派分支而碎片化，是美國佔領的最可能結果（特別是因為這也正好符合伊朗的利益）。分而治之是殖民統治者鍾愛已久的方法。

該地區目前的宗派轉變有其實際的物質政治根源。不管伊斯蘭國，沙烏地阿拉伯或伊朗會說什麼，教義或民族分裂是一直存在的，自遠古就存在並持續不變至當代，而宗派主義並不是其結果。

正如黎巴嫩共產黨人馬赫迪·阿梅爾幾十年前指出的，它一直是一種政治權力的現代技術，一個手段，統治階級用它試圖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和社會基礎，以便分裂任何人民反對的潛力。後-入侵伊拉克時代和後續的伊斯蘭國興起，為該論點提供了悲慘的證明。

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和伊斯蘭國

當然，在支撐俗世權力方面，宗教的運用在該地區有一個漫長的血統。現在人們普遍認識到，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和海灣國家，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聯盟，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包括伊斯蘭國的祖先）組織的根源。[4]

面對該地區不斷增長的左翼和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伊斯蘭教的贊助被視為一種有效的和解制衡物。到了80年代，這個政策最系統的應用，是美國和沙特對阿富汗的阿拉伯伊斯蘭武裝的支持。正是在這裡，武裝聖戰的準備活動獲得了其第一次實際的推動。

這種長期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工具化，導致一些觀察家認為，伊斯蘭國是海灣國家的工具。乍一看，這些說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在意識形態上，沙特政權和伊斯蘭國之間有相近的共性。雙方都同意伊斯蘭懲戒法（hudud）的一個特別限制性解釋。事實上，在伊斯蘭國控制的地區看到的簽名斬首和截肢，在該地區除了沙烏地阿拉伯，其他地方都不見有。當伊斯蘭國為其執政的學校尋找教科書時，被認為是唯一合適

的那些版本都來自沙烏地阿拉伯。

在沙特人口中，還有一大部分無疑是同情伊斯蘭國的，這些人中有做財金捐助的，也有志願參戰的。然而，儘管由於倒戈或繳獲的原因，沙烏地阿拉伯（和卡塔爾）提供給敘利亞反對派團體的武器可能落在伊斯蘭國的手中，卻很少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伊斯蘭國從沙烏地阿拉伯或任何其他海灣國家獲得了直接的資助或武裝。

在口頭上，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深刻的反感和仇恨之一。伊斯蘭國認為沙特君主制是其最鄙視的敵人之一，推翻沙特統治家族是該組織的主要目標之一。沙特君主制不會容忍任何其他對全球伊斯蘭領導的聲索，它擔心伊斯蘭國對自己統治所呈現的威脅。

在另一方面，伊斯蘭國不斷增強的實力，同阿薩德政府指揮的對敘利亞起義的鎮壓有明確的聯繫。起義幾個月後，阿薩德釋放了數百名囚犯（其中包括訓練有素的聖戰分子），其中許多人成為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的領導和戰士。前敘利亞高級情報人員聲稱，這是該政權蓄意煽動宗派紛爭，把起義抹上伊斯蘭色彩。[5]

阿薩德政府有一個長期記錄，試圖操縱這些群體[6]，包括在2000年初釋放囚犯，便利成千上萬聖戰志願者跨境與伊拉克的紮卡維網路聯合起來。事實上，2010年2月，敘利亞情報官員試圖推廣他們的滲透，並且操縱聖戰組織，讓其作為深化本地區與美國安全合作的基礎。[7]

也難怪，敘利亞示威者面臨炮彈，坦克以及阿薩德不分皂白的軍機空襲，那是因為訓練有素，久經沙場的聖戰組織中，有一些開始轉變。這些組織包括“努斯拉陣線”（Jabhat al-Nusra, JaN），該組織成立於伊拉克伊斯蘭國在2011年年底派出戰士到敘利亞後，並在2012年1月首次公開亮相。

在2013年，暴力和流離失所愈演愈烈時，努斯拉陣線（JaN）在戰略方向的問題上，遭遇了

同其上級組織分裂的痛苦：是把重點放在對付敘利亞的軍隊上，不再強調宗派分裂，還是根據伊斯蘭法以及竭力使所有其他組織兩極化的策略，優先控制領土。在伊拉克的伊斯蘭國選擇了後一條道路，並在2013年4月9日宣佈驅逐頑抗不從的努斯拉陣線（JaN）幹部，構建新的伊斯蘭國組織。

反思這些戰略重點後——與大眾的看法相反——伊斯蘭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與阿薩德政府的直接對抗[8]。相反，利用其對走私路線和跨越伊拉克與敘利亞邊境口岸的控制（讓它有戰略縱深和退卻安全性，這是任何其他武裝組織所沒有的），伊斯蘭國開始尋求領土擴張。

在這一努力中，在布卡營（Camp Bucca）監獄呆過的前復興黨將領的軍事諮詢是成功的關鍵——重點是控制連接戰略節點的出入路線及供應路線，而不是癡迷執著於固定點本身，要確保油田和核心基礎設施（特別是水和發電）。

這一戰略不僅使該組織富可敵國（掌握了至少九個敘利亞和伊拉克的豐厚油田，每天的石油銷售，估計價值超過1.5百萬美元）。這也使得敘利亞領土的其餘部分（無論是政府還是反對派控制的地區）嚴重依賴伊斯蘭國滿足他們的能源和電力需求。

另外，通過綁架，敲詐聚斂，買賣文物，走私和稅收，獲取大量的資金，伊斯蘭國不像中東地區幾乎所有的實際國家——財富獨立，財政上自給自足，並且在境內操作，有意識地違犯二十世紀早期殖民強權建立的邊界。

更多干預？

這些情況下，呼籲提高西方軍事對該地區的干預，只會使該組織得以進一步的維持。正因為戰爭和佔領為伊斯蘭國的發展提供了沃土，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反應只會使局勢惡化。事實上，按照這種兩極化的戰略，伊斯蘭國的近期攻擊已經明確地瞄向這個結果，要吸引更多的西方干預進入該地區，作為加深危機感和混亂感的手段。

反對外國干預，不單單是一個需求，指向反美或反歐洲國家的需求。儘管官方的說法是針對伊斯蘭國，但9月30日開始的俄羅斯在敘利亞的空中轟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避開了伊斯蘭國控制的地區，反而是集中于非伊斯蘭國反對派所在的地區。

這些俄羅斯的攻擊——受到真主黨，伊朗軍隊，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和敘利亞軍隊的地面支持——主要是力求鞏固阿薩德的位置，因為在敘利亞的主要地區玩家和國際玩家之間一個新交易似乎要出現。在此背景下，伊斯蘭國的存在確實有加強阿薩德“抵抗恐怖主義”說法的作用，顯然，眾多的西方國家現在搖身一變，轉而支持把他的政府作為一個可能的必要之惡。

當然，俄軍方向可能會在西奈，貝魯特和巴黎的襲擊之後發生變化，但事實是，伊斯蘭國與阿薩德政府之間長期存在的默契緩和[9]，一直到現在都服務於雙方的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左派有幾個簡單的回答。是的，我們需要另一個徹底的願景，這個願景植根于民主的訴求，植根於社會和經濟的正義以及對宗派主義的排斥。但是，這也需要冷靜評估力量的平衡，對過去幾年的問題，做某種分析。

有些分析，把某種自動相互反應性歸到伊斯蘭國的崛起與戰爭和帝國主義的陰謀上，我們需要警惕這種分析。這個結果沒有什麼必然性。2011年起義的逆轉——他們未能從根本上挑戰獨裁統治者——使伊斯蘭國發現了可以讓它發展壯大的生態系統。

政治忌憚真空，隨著過去三年民眾民主運動的挫折，伊斯蘭國是收割該退卻果實的力量之一。該組織以寄生的方式，鎖定在該地區各國統治者刻意培養的宗派暴力衝突上，首先在伊拉克，後來在敘利亞找到了宿主。在這兩個國家，該組織遇到了（並有助於其應運而生的）適合其“野蠻管理”的陰慘現實模式。

然而，儘管形勢明顯慘澹，但還是有希望的理由。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地方勢力正在對

抗伊斯蘭國——最重要的是，庫爾德人運動（同時面對土耳其政府的鎮壓[10]），以及在敘利亞的非伊斯蘭國反對勢力。

與此同時，在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埃及和其他地方，勇敢的社會政治運動，繼續對抗宗派主義的邏輯，表明爭取另一種進步狀況的鬥爭仍然在繼續。

伊斯蘭國可以設計一個穩定和繁榮的烏托邦承諾，但這畢竟是遠離現實的。我們可以絕對肯定，它將遭到其內部的反叛，就像伊斯蘭“國”那類聲明例子過去所面臨的那樣。

此外，如果我們瞭解到伊斯蘭國是通過扭曲撤退而崛起的，那麼我們就會有一些信心，因為知道，對於該地區目前的困境，該組織沒有提供任何有效的答案。它不代表任何一種反帝國主義的反應，或者也不代表可行的，讓中東免除無論是國外還是本地的統治或壓制的路線。

儘管有過去幾年的所有挫折，一個真正的替代性左派力量的增長還沒有被撲滅，而最重要的是，它變得更加需要。

感謝拉勒·卡裡裡 和 拉斐夫·茲阿達的評論。

亞各賓

注釋

- [1] <https://www.ctc.usma.edu/posts/zawa...>
- [2] <http://www.sup.org/books/title/?id=21640>
- [3] <http://ig.ft.com/sites/2015/伊斯蘭國-oil/>
- [4]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1/...>
- [5] <http://www.thenational.ae/world/syr...>
- [6] <http://www.lrb.co.uk/v36/n07/peter-...>
- [7] <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
- [8] <http://www.nbcnews.com/storyline/is...>
- [9] <http://www.nbcnews.com/storyline/is...>
- [10]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11/....>

土耳其重啟對庫爾德人的戰爭

菲爾·赫爾瑟、撒拉·派克

經過兩年多事實上的停火，土耳其已經恢復了對其邊境的庫爾德工人黨（Kurdish Workers Party）實行戰機空襲，而且還推出了新一波對該國東南部庫爾德人的壓制。菲爾·赫爾瑟請長期致力於庫爾德人團結的活動分子撒拉·派克（Sarah Parker）來對此作解釋分析。

菲爾·赫爾瑟：7月以來，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埃爾多安下令其空軍對伊拉克庫爾德戰士發動巨大的攻擊，據一些報導，攻擊已造成多達200人的死亡。對土耳其境內庫爾德人的鎮壓已經加劇。這種轉變的背後原因是什麼？

撒拉·派克：自2013年起，那裡出現了事實上的停火，實際上，90年代末以來，只有間歇性的戰爭，但停火被埃爾多安和他的伊斯蘭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正義與發展”）破壞了，原因是六月大選的結果。

埃爾多安一直希望能獲得多數席位以便修改憲法，使統治更具“總統制”的形式，給他更多的權力，但是HDP --- 人民民主黨 --- 的崛起阻止了他，因為人民民主黨得到了14%選票和80席國會議員。人民民主黨（HDP）是一個聯盟，其基礎是庫爾德人權利的支持者，左派團體，婦女組織和其他的土耳其被壓迫群體，如阿雷維斯人（Alevis），亞美尼亞人，以及爭取同性戀交叉型戀者（LGBTQ）權益的團體。

人民民主黨（HDP）所獲的14%選票，是一個驚人的結果 --- 親庫爾德人的政黨首次跨過了10%的關口獲得議會席位。10%的選票閾值，是非常高的，這種設計的意圖，就是要把親庫爾德的左派政黨排除在外。

埃爾多安想要的，不只是‘正義與發展黨’重新掌權，還要一個絕對多數，以確保更大的總統權力，以便讓他更不在乎一般的政治反對派和公民社會。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為設法扭轉AKP（‘正義與發展黨’）六月遭遇的失敗，一個新的選舉將在十一月舉行，而AKP（‘正義與發展黨’）要重新啟動刺耳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試圖抹黑人民民主黨（HDP），說其同“恐怖主義”有連結，在政治上孤立它。這不只是一個宣傳的基礎 --- 在很多地方它包含有組織的大屠殺式襲擊，並對人民民主黨（HDP）的建築物做了100多次的攻擊，想必既是為了傳播恐懼，也是為了阻礙選舉動員。

此外，有可能用反恐立法來直接對付人民民主黨（HDP），騷擾其領導人，並留有餘地可以把人民民主黨（HDP）定為非法組織。這是埃爾多安的一個高風險策略，因為，絕大多數土耳其人顯然希望和平。另外，人民民主黨（HDP）繼續為和平奮鬥，堅持要AKP（‘正義與發展黨’）重返談判桌，並堅持致力於建立和平運動。

重新發動對“恐怖分子”空戰的直接藉口，是今年七月在敘利亞邊境蘇魯奇鎮的新聞會議中一個左翼青年代表團遭受的爆炸，這次爆炸造成33人死亡，100多人受傷。

人們主要譴責ISIS，因為一組青年社會主義者原本打算越境進入科巴尼（Kobani），花幾天時間協助重建的工作。但許多觀察家認為，土耳其情報機構參與其中，製造了公眾的憤怒，使AKP（‘正義與發展黨’）發動對“恐怖主義”的空襲。

九月初，在城市吉茲雷（Cizre）發生了十天的衝突，有30餘人死亡。政府用坦克和狙擊手攻擊人民。衝突也發生在迪亞巴克爾和土耳其庫爾德的其他城市。這怎麼解釋？

吉茲雷（Cizre）是一個有著非常激進歷史的市鎮[1]。它就在敘利亞邊境的庫爾德斯坦土耳其東南角，跨過德利克（Derik）邊界就是，過去，

那裡的庫爾德運動一直強大，是敘利亞庫爾德人（Rojava）（“西部”，即西部庫爾德斯坦/敘利亞庫爾德）的抵抗中心之一。看來，所發生的事是一種城市起義，特別由青年領導，但不只是他們，女人也非常重要，他們反對恢復戰爭和持續鎮壓。

儘管和平進程和停火已經很久了，對庫爾德人的鎮壓仍在繼續，尤其是逮捕數千的政治活動家，學生，庫爾德語維權人士，地方政府代表等。數千名被關政治犯的環境條件一般都很苛刻。

當地人顯然決定抵制即將到來的攻擊，你可以從這些事件的影片注解和照片中看出，這是一個真正的群眾運動。

土耳其軍方的反應是兇惡的：摧毀行動看上去就像發生在加沙和敘利亞一樣。其中一個特別可怕的地方，是軍隊狙擊手擊斃在宵禁期間出門尋找食物和水的男人，婦女和兒童。

一個類似的衝突發生在土耳其東南最大的庫爾德城市迪亞巴庫爾（Diyarbakir）。就庫爾德抵抗戰術而言，這意味著什麼，尚有點言之過早；但‘商業內幕’（穀歌的雜誌）聲稱，有一個挑戰土耳其政府的轉變，是一個立足於城市的鬥爭，由愛國革命青年運動（YDG-H）領導，後者是一個同庫爾德工人（PKK）黨掛鉤的青年民兵。

‘商業內幕’還聲稱，土耳其政府被這些事態的轉變弄得驚慌失措，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它。在城市裡傷害群眾會在國際上聲名狼藉。[2]。這種說法大致上可能是正確的 --- 正如文章指出的，以往的激烈戰鬥主要發生在農村，所以軍隊的訓練應該是針對農村的，而不是針對城市的。在庫爾德工人黨的報復行動中（對蘇魯奇（Suruc）屠殺和殺害庫爾德平民或遊擊隊的反應），當時土耳其軍隊和員警似乎遭受相當慘重的損失，肯定有問題的是，將軍們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從事再度的戰爭，在多大程度上士兵們願意或準備戰鬥。

庫爾德工人黨的領導層表示，到目前為止，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他們的部隊只從事自衛和反擊特定的暴行，尚未完全參與戰爭，他們仍然希望和平，不要戰爭；但戰爭已被AKP（‘正義與發展黨’）重新啟動。

在去年年底，庫爾德人被世界譽為挺身對抗ISIS的一支力量，並在伊拉克北部成功地抗擊了ISIS。美國國務卿克里甚至稱讚他們：很可能在保衛科巴尼的戰鬥中，同庫爾德工人黨連結緊密的敘利亞庫爾德YPG（人民保護組織），和轟炸ISIS的美國空軍之間有一些合作。但在七月底，土耳其舉辦北約的特別會議，給埃爾多安開了綠燈，讓他發動對庫爾德人的轟炸進攻。是什麼改變了？

從外面很難知道美國人的想法，但我猜他們是在玩一個玩世不恭的遊戲，以應對來自土耳其的壓力。一方面，美國可能不希望ISIS變得不可收拾，並希望能夠保持盡可能多的庫爾德善意，這樣才能保住庫爾德斯坦作為其在充滿敵意的中東地區的一個基地；但另一方面，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他們似乎不願意約束它。

在一個層面上有實際的交易。北約會議給了土耳其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攻擊“恐怖分子”的實行權，並且強烈的暗示，這主要是針對所謂的‘伊斯蘭國’。當然，這主要意味著庫爾德工人黨及其在YPG（人民保護組織）的盟友，對此美國人一定清楚。作為回報，美國軍方獲准使用土耳其因吉爾利克（Incirlik）基地自行攻擊ISIS，而土耳其此前是拒絕美軍使用該基地的。

其實，約翰·克里並沒有讚揚YPG（人民保護組織），他祝賀了‘佩什梅格’（庫爾德語，意為“面對死亡的人”，也可譯為“（庫爾德）自由鬥士”-譯注）。而庫爾德工人黨和YPG（人民保護組織）並不認為自己是‘佩什梅格’，這個詞更經常用於形容馬蘇德·巴爾紮尼的庫爾德民主黨的戰士。這反映的是，對作為一個客戶的巴爾紮尼的偏愛，過於任何一種真正自治的新興庫爾德實體。

對伊拉克庫爾德飛地的控制，由巴爾紮尼同

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PUK)分支戈蘭(Gorran) (已經處在改革競選平臺的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的一個分支),和幾個伊斯蘭政黨的領導人分享。他是英國和美國喜歡的庫爾德人領袖,他的戰士時不時地會表明他們在同ISIS的戰鬥中毫無用處。‘佩什梅格’這個叫法,也用於稱呼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戰士。YPG(人民保護組織)是科巴尼的主要保衛者,其中很多戰士都是婦女,她們越來越多地在庫爾德革命過程中脫穎而出。

說到底,在一場大規模的公共競選後,少數配備反坦克重型武器的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PUK)和庫爾德民主黨(KDP)戰士,被勉強允許作為援軍通過土耳其進入科巴尼。科巴尼是一場幾個月的戰鬥,目睹庫爾德人的沉重傷亡,而幾英里遠的土耳其軍隊袖手旁觀,對於ISIS人員和物資流入該地區無動於衷 --- 實際上,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他們促進了ISIS運動。

目前,建築設備和醫療用品進入科巴尼的運動,仍遭到土耳其的封鎖,所以物品仍然須要被偷運進去,或者從伊拉克通過120英里的劣質道路運進去。來自西庫德斯坦的主要訴求之一,是開放從土耳其到科巴尼的一個人道主義走廊。

關於西庫德斯坦重建工作,當局最近發佈的消息說,到目前為止,幾個星期前,歐盟主持下舉行的重建會議,沒有作出有用的承諾,所以顯然需要更多的壓力。歐洲人需要認識到,科巴尼仍然倚重當地人民的努力和團結運動,在可預見的未來,它處在某種威脅之下。

在2014年夏季攻擊辛賈爾山(Shengal)時,YPG(人民保護組織)和PKK(庫爾德工人黨)還負責從ISIS手中搶救幾千雅茲迪教徒,所以,北約同意針對他們在土耳其及土耳其的伊拉克庫爾德斯坦西南山區營地的庫爾德抵抗力量進行猛攻,卻舉著打擊“恐怖主義”的旗號,是極具諷刺意味的。

在北約強權中,只有德國外交部長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不同意對庫爾德人的攻擊。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當然,英國政府仍然把庫爾德工人黨歸類為恐怖組織 --- 沒有變化,的確,一個名叫史蘭的年輕庫爾德女子已在英國監獄呆了幾個月,正在等待與庫爾德工人黨有關的審判,據稱原因是她去德國並且要去敘利亞加入庫爾德工人黨,目的是同ISIS鬥爭(!)[3]

美國人還進行了一些空襲,以支持科巴尼的防禦,支援YPG(人民保護組織)/PKK(庫爾德工人黨)把科巴尼和加資日(Jazireh)聯結成庫爾德人的“州”(毗鄰敘利亞-伊拉克庫爾德斯坦邊境)的舉動。這兩個區域都在敘利亞,但也靠著土耳其邊境,土耳其庫爾德地區南方,那裡的庫爾德運動就像吉茲雷(Cizre)一樣強大,所以這個區域對土耳其政府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很難理解美國為什麼這樣做;也許它開始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對全球聲援科巴尼運動的回應 --- 因為人人都知道,他們在該地區有飛機並且在進行反對ISIS的全面戰爭,如果他們讓科巴尼倒下,會讓他們顯得愚蠢。

要做到這點,必須同時減少該地區的ISIS力量並且增加建立庫爾德實體的潛力,或者與他們處理敘利亞本身的計畫有關 --- 很難知道,哪些因素是最重要的。

也可能是有些更深層的東西在那裡。ISIS提供了一個藉口,讓美國可以不斷介入伊拉克和周邊地區。我想,他們有時是把ISIS作為“有用”的敵人,也許他們想要一種可以控制的混亂。也許,至少美國人不想讓ISIS過於失控,並時刻準備甚至與YPG(人民保護組織)作戰術聯盟。

需要注意的是,西庫德斯坦各州的連接以及像土耳其15個庫爾德地區自治政府那樣的聲明是很重要的 --- 兩者都代表庫爾德運動走在解放道路上的新一步嘗試。在這方面,我們應該瞭解土耳其在敘利亞北部製造一個‘緩衝帶’的要求 --- 它計畫製造一個土耳其/西方控制下的區域,防止在其邊界的庫爾德走廊的自治整合。

所以,現在為了回報西方對空襲坎迪爾(Kandil)庫爾德工人黨領導層的支持,AKP

（‘正義與發展黨’）領導被迫遏制其對美國從土耳其境內襲擊ISIS的敵意？

是的。你應記得，在海灣戰爭中土耳其拒絕美軍使用他們在因吉爾利克（Incirlik）的基地，並拒絕讓其從北方陸路攻打伊拉克。

關於使用土耳其基地攻擊ISIS的問題，美國人與土耳其政府商談了大約一年。說美國情報機構不知道埃爾多安政府和ISIS之間的聯繫，是完全不可能的。無疑，已經幾年了，土耳其政府允許戰鬥人員和裝備越過其陸地邊界送到ISIS手中。

還有證據顯示土耳其情報機構和ISIS之間的連結（在ISIS分子屍體上發現的MIT/土耳其情報局檔，等等）。所以他們允許美國使用土耳其基地攻擊ISIS，對他們來說，這是很大的變化。但很明顯，他們希望這可以用庫爾德工人黨領導人遭受的損害來彌補。

但是對於控制北敘利亞的問題，土耳其和美國之間肯定是有些緊張的。我們不應該忽視的還有，如取用石油，天然氣和海洋這樣的問題。[4] 撇開沙文主義與哈裡發帝國不談，顯然，在地區大國之間圍繞對敘利亞北部的控制問題出現了緊張關係 --- 從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到阿夫林（Afrin）地區，一個很大部分是庫爾德人自治的地區，幾乎會把土耳其同地中海切割開來，也意味著，石油或天然氣可以從伊拉克或更東的地方出口而無須通過土耳其。

這將是土耳其國家的戰略性災難。如果西方國家能夠使土耳其的西庫德斯坦和庫爾德工人黨的自治組織中立化，並通過他們青睞的代理人巴紮尼派（Barzani clan）管理一個傀儡庫爾德國家，同樣的情況也可能出現。

所以很容易看出，關於誰控制敘利亞北部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緊張關係，這同阿薩德能夠在西部拉塔基亞周圍堅持多久沒有關係。順便說一句，一些評論家認為，英國因為在該地區的歷史作用，還有因為其參與了石油黑幕交易，

十月評論 2016年第1期

使其比美國更接近土耳其和巴爾紮尼。最近拿非茲·艾哈邁德（Nafeez Ahmed）的調查文章，對這一問題作了很好的分析。[5]

因此，埃爾多安準備撕毀與庫爾德工人黨達成的和平進程協定，製造危機的氣氛，鼓動土耳其民族主義，現在大概是希望十一月的選舉讓他得到他想要的多數，把人民民主黨（HDP）邊緣化。但到底是什麼導致了AKP（‘正義與發展黨’）遭受選舉挫折。2013-14年的加濟公園（Gezi Park）抗議活動的重要性如何？

你必須看到AKP（‘正義與發展黨’）政府有兩個相互聯繫的方面。它是一個腐敗的，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的政府，但還是一個極端伊斯蘭主義的政府，同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和整個地區的類似組織有聯繫。因為政府的這兩個方面，針對埃爾多安的抗議在增長。

加濟公園（Gezi Park）抗議活動是一場戰鬥，反對伊斯坦布爾的部分城鎮化，但是支援在整個土耳其發生的抗議和罷工活動，抗議展現了廣泛的關注，核心問題是新聞自由，言論和集會的自由，以及政府對土耳其世俗主義的侵犯。除了左翼和群眾組織，環保運動也是加濟公園（Gezi Park）抗議活動的一部分。當然，許多年輕人剛剛嘗到了伊斯蘭威脅，針對的是他們的自由 --- 他們希望如何打扮，聽他們想要的音樂，在酒吧喝酒，等等。

該城鎮化是把公共地方私有化，為了發展豪華區而摧毀貧困社區，這顯示了在過去10年中，土耳其經濟的繁榮所產生的財富分配不均。是的，有一個相當富裕的中產階級，但也存在大規模的貧困和不滿。就像土耳其大多數的抗議活動一樣，加濟公園（Gezi Park）抗議活動的一個有趣方面，是青年的大規模參與 --- 土耳其左翼比歐洲許多國家的左翼年輕得多。

2014年索瑪礦難突顯了腐敗和專制。311個礦工喪生於一個巨大的不安全礦裡，該礦的所有者與政府有關聯。怒火指向政府，因為AKP（‘正義與發展黨’）政府強行進行私有化，放鬆管制

和減薪。目的就是為了保住土耳其礦山的盈利以及對西方資本的吸引力。作為該戰略的一部分，就是減低成本費用，於是就放鬆安全管制程式，打造‘靈活’的工作條件，降低培訓的標準，把工作轉包給不熟練的，甚至未註冊的未成年工人。

當埃爾多安訪問礦區時，他不得不躲避高喊著“殺人兇手”和“小偷”口號的受害者親人抗議者。在混戰中，埃爾多安的一名助手踢一名倒在地面的示威者，這個場景成了一個符號，象徵著政府對群眾的態度。

但AKP（‘正義與發展黨’）政府的另一面，伊斯蘭的一面，也很重要。當最後的哈裡發王朝以奧斯曼帝國的形式存在時，它的總部就在伊斯坦布爾。我認為，埃爾多安希望成為該地區遜尼派穆斯林的領導人，實際上是製造一個新的哈裡發王朝。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他必須擺脫土耳其國家的世俗傳統，這個傳統體現在基瑪律主義（Kemalism）的意識形態中，基瑪律主義是一種專制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由1923-4建立現代土耳其國家的基瑪律·阿塔圖爾克(Kemal Ataturk)和青年土耳其運動創立。埃爾多安一直試圖擺脫出現在軍隊，員警和司法部門領導層中的傳統“基瑪律”形象。

AKP（‘正義與發展黨’）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清理了國家機器的上層人物，還有待觀察。土耳其軍隊是非常強大的，而且其上層人物對於向庫爾德人發起一場新的戰爭，似乎興趣不大。你永遠不能排除軍事政變的可能性。

總體來說，庫爾德問題仍然是土耳其統治階級，是事關AKP（‘正義與發展黨’）政府未來的重要問題。庫爾德領導人很辛苦地推動和平進程，甚至面臨挫折和失望，但土耳其政府做得很少 --- 只有一些語言和廣播上的小讓步等 --- 難以解決庫爾德民族的要求。這是人民民主黨（HDP）選舉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 --- AKP（‘正義與發展黨’）失去了很多保守庫爾德人的選票，

因為未能提供庫爾德問題的解決方案，埃爾多安真實的態度，表現在其臭名昭著的預測“科巴尼將陷落！”中

從未有過任何確切的跡象表明，AKP（‘正義與發展黨’）有意思做出顯著的讓步，甚至不能保證和平以後會釋放囚犯，或讓山上的庫爾德領導人重返公民社會。

即使主流媒體對埃爾多安的政策表達了一些擔心，也沒有見到英國政府有任何外交反應的跡象，換句話說，他們根本就可能打算繼續在政治上支持土耳其。土耳其的大部分其他媒體被關閉，特別是在庫爾德斯坦東部，甚至歐洲的親庫爾德網站目前也受到駭客很多的襲擊和騷擾，所以我們需要積極地尋找資訊，並加入我們可以參加的各種聲援活動和示威活動 --- 九月在倫敦武器交易會的庫爾德青年和反武器運動的聯合示威，其中土耳其是該交易會部的榮譽貴賓，這就是我們可以做的工作的一個好例子。



註腳

- [1]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sec...>
- [2] <http://uk.businessinsider.com/turke...>
- [3] <http://peaceinkurdistancampaign.com...>
- [4] 感謝貝斯吞·巴班 (Bestun Baba) 在這些地緣戰略方面所作的討論。
- [5] medium.com/insurge-intelligence/bri...

如果希臘政府聽取了真相委員會的建議會如何？

埃裡克·杜桑



2015年9月25日，在希臘議會裡，真相委員會舉行了關於希臘公共債務問題的新聞發佈會，會上，委員會的科學顧問埃裡克·杜桑，對一個記者的問題做了詳細的解答，這個問題是，如果希臘政府聽取委員會的建議，暫停償還債務，會發生什麼情況。杜桑解釋說，遠不會導致災難，暫停還債，結合其他措施，對付這場危機，有可能為希臘找到一個比目前第三備忘錄的實施更好的結果。

埃裡克·杜桑：謝謝你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招致了那些主張別無他法者的主要反對意見。問題是說：如果政府把調查報告的發現考慮進去，那就不得不暫停償還債務，這將導致災難和混亂，那對整個國家非常不利的。

截至公投為止，希臘尚沒有得到任何幫助。

為了提供一個答案，我們必須檢查實際發生了什麼。在1月25日的選舉和2015年7月5日的公投之間，希臘償還了接近70億歐元（€）的債務，而它卻沒有收到任何幫助，儘管還有至少72億歐元的債務，根據計劃，這個債已被延期到六月底。 [1]

其他金額還可以從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和從希臘債券收取高息的歐洲央行（ECB）獲得。但債權人想要扼殺齊普拉斯政府，一分錢都不願給。

那麼，讓我們問自己以下問題：如果2月20日，希臘政府不照規矩償還債務，而是說：“我們應用2013年5月21日歐洲議會通過的472/2013號條例第7條第9節，上面寫著‘一個受到宏觀調控的成員國應進行其公共財政的全面審計，特別要評估債臺高築的原因，並追查任何可能的不當之處，’” [2] 如果談判人員說，“我們執行監管，因為我們正在審計債務，追蹤可能的違規行為，我們暫時停止還款，不做進一步的發展”，並且如果希臘政府也同時採取了必要的措施來解決銀行危機，並且保護儲戶的存款，那麼，情況會不會比2015年2月至6月間發生的情況好得多呢？

讓我們走得更遠。如果政府用了我們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會發生什麼？請記住，我們的委員會成立於2月20日之後的時間，是4月4日，清楚知道472號條例。如果根據6月17日和18日公開的初步調查結果以及7月5日的公投結果，希臘政府表示，“過去六個月，我們在繼續還債。已經花費了70億歐元。國庫現在是空的。我們已經對債權人作了巨大的讓步，沒有收到回報；而他們甚至還增加了他們的要求。”所以，如果依據公投和我們的研究結果，政府若從7月5日就停止償還債務，就會保住70億歐元，可是這筆錢最終在2015年7月與9月之間支付給了歐洲央行。

必須採取的強力措施

正是因此，希臘政府完全可以同時使用全民公決（即拒絕債權人的提議）的結果和我們的調查結果，暫停償還債務，並在銀行業採取有力的緊急措施，因為銀行已經被歐洲央行和希臘央行關閉。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以保護儲戶存款，同時把銀行社會化，建立一個平行的貨幣；

也要在稅收征管方面採取強有力的措施。[3] 如果這個B計劃已經實施，我相信，它不會導致災難。我深信，債權人將被迫開始認真的談判。

在債權人的壓力下，齊普拉斯政府選擇了另一條路。當它簽署第三個備忘錄時，在議會中不存在真正的辯論或修正的可能性，對公投結果沒有最起碼的尊重，它委身於第三個“救市”計劃，涉及的額外貸款量為860億歐元，以用於償還以前的債務，而這筆債務，我們已經認定是不符合規定的，非法和不可持續的，它包括用於希臘銀行資產重組的250億歐元，自2010年以來，那些銀行已經收到了480億歐元。

我們清楚地知道，250億歐元不足扭轉希臘銀行的情況。這是不夠的，因為所謂的“不良貸款”，即可能永遠得不到償還的銀行貸款，超過希臘銀行的股票。希臘銀行資不抵債。這是真實的情況。必須說出真相。在六或九個月內，10萬歐元以上的存款都可能被侵佔以拯救希臘銀行。

正如我的同事蜜雪兒·胡森的解釋，緊縮措施將讓希臘無法滿足歐盟設定的未來幾年的目標。歐洲債權人將繼續要求那些業已榨幹的人更加使勁。

聲稱如果希臘暫停還債，聽從委員會的初步調查結果，那情況將是災難性的，這個說法是錯誤的。

我的結論是，聲稱希臘如果暫停還債，聽從委員會的初步調查結果，情況將是災難性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總之，首先，我們認為，不應該繼續在不正當和非法的情況下借款 --- 實際上第三備忘錄只是非法的，不合規矩的東西；其次，正如蜜雪兒·胡森解釋的，該國的經濟形勢不會康復。

我們將在短期內公佈委員會通過的關於希臘銀行情況的最後文本。它表明，在何種程度上這種情況仍是希臘深為憂慮的。我們提請大家注意一個事實，即250億歐元簽約注資銀行的額外債務落入了私人股東的手中。雖然希臘金融穩定基金（Hellenic Financial Stability Fund）以及希臘政府是銀行的主要股東，他們沒有履行其

作股東職責，採取行動，原因是他們接受無表決權的所謂的優先股；因此，希臘銀行的命運掌握在私人股東手中。

這個金融穩定基金由皮埃爾·馬里亞尼（Pierre Mariani）管理，[4] 此人是德克夏（Dexia）銀行失敗的禍首，而這個銀行，我知道很多，它是一個由比利時、法國和盧森堡政府不得不做三次保釋的比利時-法國機構。

確實難以想像，一個機構，其使命的方向是管理希臘銀行的資本重組，可這個機構卻委託給這樣的人，這個人在對比利時、法國和盧森堡公共財政造成重大後果的金融災難中起了重大作用？

難道真的可以想像，一個機構，其使命的方向是管理希臘銀行的資本重組，可這個機構卻委託給這樣的人，這個人在對比利時、法國和盧森堡公共財政造成重大後果的金融災難中起了重大作用，這個人還出售有毒貸款給當地社區？馬里亞尼怎麼能信賴呢？當德克夏（Dexia）銀行由比利時政府救助時，皮埃爾·馬里亞尼因為其災難性的管理而被解職，雖然還有一百萬歐元的分手費。2012年，德克夏銀行付給他170萬歐元。[5] 然後，他來到這裡來管理希臘銀行。不是麼，希臘公民和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利益，就在這樣的人手中？如果我們考慮到國家的利益，這不就是一個真實的重大醜聞和矛盾嗎？

如果委員會的建議已獲聽取，希臘問題的解決方案可能已經找到了。我們的研究結果未被考慮在內。所取的道路是第三備忘錄的緊縮措施。希臘的問題遠未解決，債務仍然是人民背負的一個沉重負擔，人民不得不面對債權人強制執行的5年緊縮期。

然後，債權人可能以較長償還期的幌子，考慮一些債務減免，以換取投降條款。但是我都知道，在希臘簽署的協議裡沒有任何減免債務的承諾，僅僅有對債務做些處理的可能性，前提是希臘政府符合債權人的要求，但沒有比這更多。

你我都知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希臘債務將飆升到GDP的200%，同時還指出，

它不會降低自己的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要求減少債務，但其本身不會參與。你能想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要動動嘴，“債務是不可持續的，但我們不會放棄任何欠我們的錢。你們歐洲人應該做出犧牲。”就能說服歐洲人減少希臘債務？

你真的相信，接受第三次備忘錄的邏輯，就可以拯救國家？我們不這麼認為；我們認為，在未來幾年，希臘債務問題仍是中心。2011年開始審計希臘債務，當時一個希臘債務公民審計委員會成立，其中一些人後來成了2015年4月創建的當前委員會的成員。幸虧希臘議會主席的幫助，當時受到總理和共和國總統的支持，第一委員會得以復活。記住：4月4日，他們在場。



我們幫助希臘的決心是穩固的。

不幸的是，政府沒有聽從我們的建議。我們不知道，一旦議會有了新的主席，我們的狀態會是怎樣的，[6] 但不管如何，我們將繼續工作。由於我們沒有薪水，沒有什麼會改變。我們幫助希臘的決心是穩固的。如果我們要自己支付我們的航班，找到一些希臘家庭住宿，我們會這樣做。

我希望有一天會有一個希臘政府為了希臘人民的利益，會考慮我們的研究結果。我向你發誓，我們的唯一目標，是為了希臘人民，以及歐洲和世界各國人民挺身而出，找到非法債務問題的公正解決辦法。

瑪麗艾拉·卡彭尼托（Mariella Caponetto）和厄裡克·杜桑（Éric Toussaint）專訪。

翻譯：克利斯汀·帕格諾勒（Christine Pagnoulle），邁克·克羅裡廓夫斯基（Mike Krolikowski），維琪·布勞爾特（Vicki Briault）。

注解

[1]第二份備忘錄計劃，本應於2015年2月28日終止，但根據齊普拉斯政府和歐元集團之間2月20日達成的協議，延長四個多月。

[2]2013年5月21日歐洲議會和理事會通過的472/2013號條例（EU），涉及的是，對於金融穩定遭受嚴重威脅和困難的歐元區成員國的經濟和預算加強監督的問題。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

[3] 此處是法語。

[4] <https://fr.wikipedia.org/wiki/Pierr...> (法語)

[5] <http://www.rtf.be/info/economie/de...>

[6]在2015年10月4日，齊普拉斯政府國內事務部的前部長，尼科·沃茨斯（Nikos Voutsis），當選為議會議長。佐伊·孔斯坦托坡樓（Zoe Konstantopoulou），提交了委員會關於第三次備忘錄的報告，並聲稱，她將繼續支持該委員會的使命。



胡謫叙懷

熊安東

明天是新的一年開始，有感，寫打油詩一首，敘懷。

回首九十五年，
歲月瞬逝如電閃。
孟浪求索三十年，
楚冠撒謊三十年，
大興公民三十年。

世事多變，
人生短暫。
古今往來誰不老？
今年悵惘送春去，
來歲尚能迎春來？

生老病死，
自然規律，
我心平順從。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小周注：上海有條“大興街”，所售物品常有“次品”，“劣品”。上海人把次品劣品叫做“大興貨”。“大興公民三十年”意指“有公民之名，無公民之實”三十年。

九十小周胡謔

周履鏘

我枕邊有幾本書，是從書堆中隨意找出來的。1 《新選唐詩三百首》，2《唐宋名家詞選》。其實我並不想讀這些書，不過作為我的“安眠藥”，每當睡不著，就隨便翻閱幾頁，很快就能入睡，比吃安眠藥有效，還沒有副作用。

隨意亂翻書時，多次讀到李商隱的《無題》：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燭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我步韻（其實是不合韻的）胡謔幾句：

相見無期何言別，東風凶殘折枯枝。
春蠶吐絲可織錦，燭光黑夜能照明。
對鏡滿頭現白髮，無多時日要珍惜。
蓬山雖遠不須愁，就火飛灰隨風到。

亂扯以上幾句作為自壽。

寫於2016年3月12日



此刻(轉載)

尾生

梁太平，筆名尾生，1984年出生於四川南充，大學畢業後就職核工業230研究所任工程師，並入籍湖南長沙。因長期參與公民社會運動，追求自由民主，倡導普世價值，積極捍衛人權，2014年底受政治迫害被工作單位開除。2016年6月1日在北京被涉嫌尋釁滋事遭刑事拘留，目前被羈押在北京市豐台區看守所，以下詩歌是梁太平在看守所寫就。

日子在不斷的重複中麻木
時間在一片蒼白中虛無

此刻，肉體僅僅是肉體
絕不是一顆綠色的樹

此刻，靈魂就是靈魂
一隻小鳥從我的胸中飛出

2016年6月6日

《我看你是要飛了》

看守所廁所的螞蟥最自由
看守所板床上的被子最鋒利

我們就像沙子形成沙漏
我們就像原子形成鐵

四圍高高的牆壁
讓整個天空塌陷

我打開一扇語言的窗戶
管教說：我看你是要飛了

羅孚和《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

周履鏘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史事與回憶》鄭超麟自序寫道：“我在這裡要感謝范用、羅孚先生和其他幾位不相識的朋友，沒有他們的幫助，我的這部晚年文集是不會同大家見面的。”

《史事與回憶》第三卷有附錄二：是羅孚寫的《鄭超麟老人最後一封信》。文中寫道：“幾個月前，偶然看到香港《大公報》上有朋友范用的一篇文章，說他手上有一部幾十萬字的稿子，是一位‘九十七歲老人，一個早期黨的歷史的見證人’寫的，出版無期，在他的手裡仿佛捏着一塊紅炭。我心一動：莫非是鄭超麟老人的著作？一問，果然不錯。”羅孚又寫道：“從他（指范用）那裡證實鄭老有大著在他手上，我們就商量要使它及時出而問世，為鄭老祝賀他的百年大壽。得‘天地’的幫忙，書終於能夠出版。書的編校完全是范用的功勞。“印出的第一冊書1989年8月1日中午寄到上海，可凌晨鄭老去世了，他未能聞到油墨的芳香。只能夠說陪了他的大去，為他壯了行色。

天地圖書公司是香港頗有聲望的出版社，出書質量很高。而市場上高質量的書不一定暢銷，所以有些要收出版費。據說為出版鄭超麟的三卷本《史事與回憶》，羅孚先生出了出版費，曾傳說羅先生為此賣了字畫。

范用的《存牘輯覽》收錄有羅孚給范用的信一封(248頁)，但影印手稿却是另一封信(310頁)，此信正是談出版權費之事，摘錄如下：

用兄：

我此刻在香港，自美返港，已一月有餘。回來是參加香港第三屆文學節。十一月二十八到港，文學節是十二月十日結束的。然後進醫院，“刮”掉了前列腺，現在等待康復，將於月底回美，但一年後，仍將返港定居。

在港時，天地相告。鄭超麟的三卷文集不用付錢，天地願意負責所有費用。據說，這是書出版以後反應甚佳，使他們改變了主意。我於是問他們版稅還付不付呢？他們說當初沒有談過。但如付版稅，就要扣回賣書的錢。鄭曉方哪裡取了一百五十套，如扣書錢，剩下的版稅就不會有多少了。這樣我要和你商量，因當時不知道是怎樣對她說的。

總之，出書的好名譽被我佔去了。人家都以為是我付了錢，現在却可以分文不出，說來不免有些慚愧。

你看這事怎麼辦才好。鄭曉方哪裡還應付她多少錢？天地付得如不多，不如由我這邊禮足為好。

（信的另一部份談出版《聶紺弩詩集》，不再摘錄）

羅孚
2000.1.7

為出版這部《史事與回憶》，范用和羅孚兩位先生作出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為後人留下了這部大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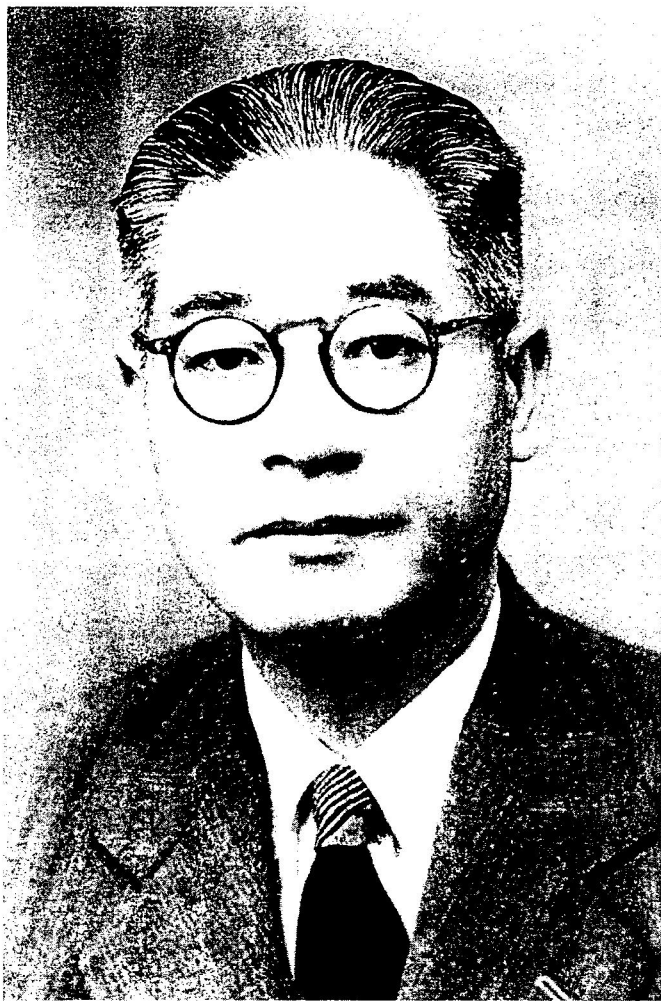
鄭超麟老人已於1998年8月1日去世，范用先生於2010年9月14日去世，羅孚先生也於2014去世。我寫下這些，以表達對三位老前輩的尊敬和懷念。

寫於2016. 1. 24

我的一生經歷憶述（一）

彭述之

（訪問者：鄭致祥）



彭述之（1895年11月－1983年11月28日）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著名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

這篇回憶錄是1976年1月1日起由訪問者錄音，再由衛眾一邊聽和記錄（未經講者過目）。本刊現特予刊出，刊前曾代為刪去一些重複的講話，以便閱讀，大小標題為本刊所加。講者另有一本回憶錄，分上下卷，已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印出發售。

（一）窮鄉僻壤中的童年

1895年11月我在銅鑼村出生，隆回區中一村，隆回區屬寶慶縣，有時叫邵陽縣，地方非常偏僻。離開邵陽縣城有180華里，因沒交通工具，全靠走路。從家鄉到縣城只有走山路，隆回區有幾十村落是小山隔離，我家更是窮鄉僻壤。大山腳下有一百戶人都很貧窮，只有兩家人有多餘的田地可以出租，祖父是其一，還有些小地主，其餘是自耕農或半自耕農，有點田地還要租些田地，其餘都是僱農，自己沒有田地需幫他人耕田糊口。因租不到田地就學手藝，有地方每年請他們到湘西給貴州人做手藝，因很貧窮，所以文化更貧乏，整個村一百戶幾百人口，能夠寫字的只有三家。讀書在老私塾，不是新學校。

我學生時期，家裡算有點文化，父親讀了四五年書能夠寫，叔叔讀了十幾年書算有點文化。總之普遍的村落都文化很低。我出生在大家族，有祖父母、伯父母。還有叔父沒結婚，二個姑母，共住一間相當大的屋裡！是中國很普通的大家庭。

祖父讀了很多年書，但他不大能寫，字可認識很多，後來也變成農民種田。我家也是農民的家，父親完全是種田的，伯父初期開藥房做生意，後來也種田，叔父讀了二十幾年書，也變成農民，不過他們種的是自己田地。其餘的田地就租給佃農，所以經濟算是富裕。有多餘的穀子賣出去。有時還買入小塊的田地，窮人把田地賣給我們。

這種農民家庭，當然夠吃、有自己的屋，要買粗布衣服“穿”，很樸素省儉，吃和穿都不好，農民就是這樣，非常勤勞。一年沒有幾次吃肉機會，過年過節外，平常都是蔬菜。有時豆腐，

豆腐在鄉間是上菜了。而油就更少的，因為貴！他們看起來，生活就很苦。吃的東西不夠營養，健康當然有問題。鄉村更不講衛生，常常手和身上生瘡，是很普遍的情況和很艱苦的。農民還非常保守。本來我家可以吃和穿得好一點，但是他們不願意，卻把錢留起來，再買田地，農民就是這樣，是個小地主也很樸素和很苦的。

其他村民，我的鄰居更貧窮，他們是自耕農，比我們生活更壞，至於佃農，尤其是僱農，替人耕作的農民非常苦，想起來都可怕，他們經常替別人做工，農民的工作有季節性，夏天春天種地，秋天收成有工作，冬天沒有就失業，但飯還是要吃，他們到山上砍柴，賣給地主來生活。他們非常苦。到了冬天有時沒飯吃，吃稀飯。我少時印象最深刻是我堂叔，父親兄弟輩的，是一個僱農，有妻子和一女兒，卻養不起！他的妻子，生一種營養不良病，一身都腫起來的病。窮人很年青就死去，女兒也死去。他自己勉強自食其力，度日如年，他很痛苦，我離家的時候，他還沒有死，不過他是非常艱苦的。我才10歲，跟他的女兒玩，非常深刻的印象。因同情他們，我對母親說：“給他一點糧食！”，村民給糧要還的，要錢的，他拿不出錢來，只好賴帳。這樣的情形，不是個別例子，還有很多人不夠吃的，我年輕時的深刻印象。我還不懂什麼平等，就覺得很難過。總結家鄉是貧窮和文化水準很低。

我家是十幾人的大家庭，這種家庭是不合理的。我父親、伯父、叔父，他們相處不壞，但是伯母、姑母和祖母們常常有磨擦。少時不懂，覺得她們不和諧，芝麻小事都矛盾衝突。一般家庭都是這樣的，尤其婆媳之間。母親和姑母之間的不和是大家庭給我的印象。但是，我是幸福的，因是家中第一個男孩，長子嫡孫、大孫子。所以得到祖父母的寵愛，連姑母也愛我，尤其小姑母比我大十來歲。我在家中地位特殊的被大家保護，但他們不懂得愛、他們沒有受過教育。我雖然感覺到愛，祖父母特別寵愛我。母親生下我後，連續生了六個孩子。她的負擔很重和沒有精力。除

了照顧孩子外，大家庭媳婦做飯是份內事要輪流負責，伯母和母親每人負責一天，那負擔很重，還要給孩子洗衣服，到晚上，還紡棉花和紡紗，很苦。所以母親根本沒時間照顧我，就交給祖母、姑母照顧。父親種田，但有點特別，他讀過私塾，平常中國人讀私塾四年，只認得字，不能寫，不能看，讀些古書。我父親讀了四年書，能寫和可以作詩，他常常看書。算是有文化的農民學者了。因他經常看書，耕種完就看書，也不照顧我、也不管我。到我稍微長大，鄰居有一批孩子和我年齡相若，也沒有玩具，附近有一條小河，河裡撿些花綠綠的石子，給我們玩花樣來的玩具了，孩子的生活非常枯燥單調。所以我的童年在家裡受到保護，好像很愛我，而鄰居因我家環境好些，孩子對我也好點，鄉間非常勢利的。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不過我喜歡外婆，她是個中地主。我們每年總要到她家去一兩次。外祖母非常喜歡我和父親。所以過年過節到她家就是最大的享受。此外，鄉間有神功戲，是一種迷信，一年或兩年一次喜慶的是了不起，是鄉民最快樂的時候。

（二）思想漸起變化

因鄉間貧窮，沒新式學校。只有“私塾”，私塾是幾家人合起來請一位老師到家教書。鄉村貧窮，所以請不到好老師。1902年約七八歲，在“私塾”讀三字經、四書、五經、論語、孟子、中庸、詩經等。每天老師讀幾段。要是不懂，他也不給你講解，只有死背，記在腦裡，到下午寫字。孩子常常讀了三、四年書也不懂。只認得字，不明白字的內容意思。先生自己也許不懂。我讀了五年，先生沒有講課。就是背。我可以背很多本書，背，像歐洲中古時代背聖經一樣。這情形下孩子很苦，讀書是件很苦的事，因為要背，死記，又不懂，所以讀書覺得很苦。我讀了五年，認識上萬的字，四書五經可以背，就不懂書中內容。連教書先生自己也不懂。到了第五年，去較

遠的地方讀書。有個同學約二十歲，他能夠寫文章。跟他同房。老師才第一次講論語。還講一些古文，教我們作詩，對聯等、故進步很快。日後才可以自己看書，自己看懂了。

1909年，我的思想受影響。當年我沒有讀書，因祖母病得快死了，每天請醫生，給她買藥。我們的醫生很苦的。住得很遠。要清早起來跑去請醫生。否則他就出去了。所以我就替祖母請醫生、買藥。父親見我有空閒時就講講書。他給我講古文、講左傳，講得不錯，甚至講詩。我才發現父親是有文化的。我受他的教育不少。那一年，我的思想起了大變化。當時沒有報紙的。對外的世界根本不知道。就是聽說，慈禧太后、皇帝都給外國人趕走了。完全沒有國家的知識或認識世界，我們的生活範圍只是小村落中。

遠房的叔父是大地主的兒子。離我家有二十幾里，他有田地租給人。他在湖南省城長沙讀書，約1905和06年，中國開始有新學校，他去讀書時，本身已經有點知識。他來我鄰居收租，見我讀書，好像喜歡的樣子，從背包找《醒世鐘》給我。《醒世鐘》作者陳天華——離我家不很遠的新化縣。陳天華1901年到日本讀書，因他很有天才和研究世界的情形。1903年他寫了《醒世鐘》。當時中國出現民族主義運動，《醒世鐘》是最有力的，起了很大的作用。又是白話文寫的，不是文言文，所以很容易讀。1906年陳天華在日本東京反抗日本，鼓動一個中國學生運動。他反抗日本人壓制，非常氣憤的投海自殺。因此在中國學生中起了很大的一個運動。由於這一點，我特別感興趣。一個晚上就讀完。我腦海裡完全被驚濤駭浪衝擊著。才第一次認識中國很大，但是非常危險。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便被外國人打敗幾次，割地求和、賠款、訂不平等條約等。外國要瓜分中國，書本上說侵略情形。《醒世鐘》就是提醒國民“滿清政府”是這樣敗壞國家的。陳天華反滿的。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欺負中國。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國是這樣一個敗壞國家，我們要反對東洋、反對滿清、反滿、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思想

等，我第一次有政治思想。

1910-11年開始注意報章，教師是懂的，懂舊的，刻意講解。我用中文講，也作文或寫詩，自己看書，看歷史。我作為一個學者覺得國家很敗壞，覺得讀舊書沒意思。到了1912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要到外讀書。再不能讀舊書了，這對我有很大影響。家中可以夠吃，但要到外地讀書就有問題。剛好那一年，十幾個村合辦了新學堂。一位本姓地主紳士勸我到那學校讀書。學校請了兩教員，一教中文，一教科學、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學。這位教師是北京大學學生。辛亥革命時回來了。他懂一般的物理化學、數學和天文地理。他就教我們，我們只有五六個孩子。第一次學科學、自然科學、物理化學、數學、地理。把我的眼界擴大了。有初步的知識，因我的中文底子好，學得不錯。

(三) 進行反袁世凱、反日等各種鬥爭

一位姓龍的教師告訴我，他很看重我。他二十來歲是大學沒畢業。他說我的中文比他好，應到外地讀書。我受他的鼓勵，更決心要離開鄉村到長沙讀書。但經濟很有問題。母親同情我、在起程時還有點錢給我做路費。1912下半年我離開鄉村到長沙讀書。第一次離開家鄉到長沙新式學校邵陽中學，邵陽人在長沙辦的。這中學從校長和教師都是日本留學生，更是國民黨同盟會的會員，老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他在日本留學有深厚的學養。我到學校正是辛亥革命一周年，有盛大的集會遊行，學校是紀念辛亥革命第一年，事前，我對辛亥革命稱之為小便士，認為辛亥革命是英國錢幣中最微少的一個錢幣，差不多是一毛不值的意思，這就是我的反應，其實是我認識不深。到了長沙，學校都是同盟會的人，校長是湖南人，和宋教仁組織國民黨，在那波瀾壯闊的運動中黃興是第二號人物，也是湖南人，回到湖南目的是組織國民黨。校長和我、學生們都歡迎他

和遊行，我才知道同盟會的歷史。那時候因為校長從前是革命黨人同盟會會員，他的辦學比較新式。所以除了功課外，有一種集會、學生自由演講。校長出題目，例如是共和國好還是君主共和國好？那時與袁世凱有衝撞的。首都在北京還是南京好？還是在漢口好？這樣的題目叫學生講演爭論。我是第一次上講台。就爭論“首都在什麼地方好？”我講“在武漢好”。南京被外國霸佔了，而北京是官僚的，校長賀炎武給我很大的鼓勵。私自找我說，你的演講非常好。可以成為演說家，可以加入國民黨，在湖南，他是國民黨的一個領袖，我就這樣接觸政治關係的。賀炎武是舉人、拔貢生，所以有資格到日本留學，是有派頭氣派的。他鼓勵我，自此，我在學校出了名，凡有演說都叫我做代表。雖然我還年輕就參加了政治活動，已經在政治圈中很有自信。天天看報，因看了報，我們要發表意見。有集會來了，我們就表示意見。政治上，跟我以前讀陳天華《醒世鐘》的時候，活動更擴大了和更政治化。那時很看重中文作文。我們中文課題跟政治沒關連的，我也要把政治意見加上去。那時的政治思想就是反對袁世凱。因我們已經知道袁世凱是北方一個官僚軍閥。我們一般尊重孫中山和黃興，黃興在同盟會有很大的聲望，宋教仁辛亥革命後也是國民黨人。所以，有他們的影響，湖南的學生很政治化地反袁。教育司管教育的，派兩人到學校來調查。剛剛我們作文，寫完的卷子交監學，派來調查的人把卷子拿走，看學生的思想。我們寫的文章都是反袁的，不一定有這思想，但像我和幾位寫的文章就可以看出那個傾向。於是，大批軍隊包圍學校。先找校長，校長已經不是姓賀的。劉校長沒有政治思想，但較有道德感，軍隊指導員把校長和教員拘捕。姓李教員說：跟他們不相干，是我責任，卷子是我的，我個人負責任。這事對我影響非常大。我認為他很偉大。結果槍斃了李教師、校長監禁十五年。校長寫了封很漂亮的信給學生。非常感動地說我們的李教師很堅韌，在牢裡絕食，一切是他個人責任。我們

聽了，都哭起來。這給我們上了很重要的政治一課。我們想暗殺敵人，幾個學生當然辦不成。我們立志要暗殺他，沒有武器，所以很頹喪，就決定離開學校。因為換了校長，袁世凱派來的。

1914年下學期離校，回到寶慶，結束了兩年中學，寶慶中學是五個縣聯合辦的，邵陽、新化、隆回、武岡、新寧，一個大的中學。在長沙可以看雜誌，在寶慶就很少。也有私塾偷賣帶有革命性的雜誌，不過不能滿足我。就很用功地讀古書。研究中國歷史、古文詩詞等。看一點改良派梁啟超的書，他的文章寫得很好。另方面，他講民族主義、講改良主義。對初步的學生也有用處，我的思想不斷發展。

1914年發生的世界大事是帝國主義內部戰爭和袁世凱要做皇帝。他把宋教仁刺殺了，袁世凱比滿清沒什麼不同。另方面，這世界中，帝國主義的思想，還不叫帝國主義，那就是英法俄，同德國奧國、德奧、德奧土結盟。我們還沒瞭解，為什麼要有這個戰爭，不過有一個感動，就是他國也是人，為什麼鬥爭呢？他們所謂文明，我們國家打仗很野蠻，到處死了很多，對於文明兩字，不過如此，我們不懂帝國主義，看不出這種文明。

1916年袁世凱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是無恥的，消息公佈後，全國的人，主要是學生，尤其南方反對最激烈。把日本的貨物燒掉，表示反對日本。我在學校是第一個主張，凡有日本的東西把它燒掉，以示抵抗。因我是高年班快畢業的。表示對二十一條不滿，校長就反對我們，他也是留日學生很頑固的。我不管他，就對學生演說，我們要組織學生會。學生因我是高年班，還有幾個人贊成我的意見，就把全體學生鼓動起來組織了學生會，我就是學生會的主席。校長非常討厭我，借題發揮要開除我。因開除我的牌子已經掛出來，我都快畢業，於是引起全體學生抗議，把開除我的牌子用腳拔掉，並引發學校風潮。結果開會，校長要說服教職員，而我就跑去反對校長，教職員會沒人支持他。我是學生

會第一個出來鬥爭的。湖南也組織學生團體，到鄉村和小市鎮演說。說二十一條是一種賣國條約很危險的。在鄉村我和另一人演講了一個月。我第一次把愛國思想和民族主義帶到農村去。同時瞭解農民對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反應，那個月走了很多地方，農民聽了我們的話，反應很熱烈。我們要想辦法反抗帝國主義、反抗日本、也反抗自己政府。我第一次得到農民的反應，對於國家的思想認同。當然也見識鄉間學校的教員和紳士。但是反映最好的還是普通人、工匠、農民、小商人。整整一個月，就是我第一次到農村的政治活動。下半年我畢業。畢業後，我的志向是想到北京或上海上大學。和父親商量，他把所有的地賣了，還不足夠我上大學的。

(四) 在長沙工作

1913年，我從長沙回到鄉間，和幾個長沙讀書的學生要辦學校，鄉村要辦新式學校。鄉間有一幢屋是從前辦書院的。這屋被土豪劣紳霸佔變成私用。我們三個學生要爭回這幢屬於大家的屋。於是我們回到家鄉糾集同心思有改良主義的人，和他們討論，我們要辦學校，把書院的公屋拿回來。當然有紳士支持我們。一些老紳士就非常反對。於是我們三個學生，姓袁和姓花的去縣政府控告他們。我們背後有會做狀子的支持我們。這鬥爭使我得罪了當地的老紳士，尤其本姓的宗親紳士。他們給我父親很大壓力，反對族長是要被開除的，不許姓彭。中國傳統就是這樣，你姓彭的，不許你姓彭。弄得我父親很狼狽，因他們輩份高。我告訴父親，辦學校是對的，公房被紳士拿去抽鴉片私用是不對的，結果學校被我們辦成了。

讀書的問題。沒有辦法，父親有道理，家中沒能力，我很頹喪。那一年剛有人請我教書。學校是我們最好的學校，請我去當教員，有四個教師，待遇很好。我在學校工作三年，是我人生中

最好的生活，因為環境很好，待遇很好，雖然錢不多。不過很舒服。我利用這個時候研究中國的舊學問、中國的歷史、中國古代的哲學、等於一個大學的文科。我的習慣就是喜歡看書，一輩子都是這樣。所以，一有時間就看書、研究。在這個時候對中國的舊學問，我比較有一種眼光，一種所謂西方科學眼光、民主主義的眼光。對古代的哲學、中國哲學的發展，我很有興趣。我研究古代的莊子、孟子、老子三人。同時，寫文章寫得很好，像古文，我能夠寫古文詩詞，算是很好的。

到了1919年，學校是較特別的有報紙，在我們鄉村有幾間學校，其他是沒有報紙的。因我們有朋友在安徽縣衙門做公務員，把報紙寄回我們，他們不要的報紙，看完了按時寄回來，所以我們經常可以閱讀，就知道城市的發展情形，也知道發生了十月革命。

1917年。我還弄不清楚十月革命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對這事很有興趣。勞工政府又說共產主義，又說國際主義，我就去讀歷史。那時我第一次考慮這個問題。我看過無政府主義的書《民聲》，也是我叔叔給我《醒世鐘》的。《民聲》是劉師複辦的，我覺得《民聲》很有意思。覺得他說的是理想，但辦不到和空想的。沒有很深的印象。到了1917年，俄國革命以後，報紙常有刊載，我就更多地思想，更多地注意這問題。但搞不清楚。到了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了，他帶這些書給我，我非常有興趣，對這件事，從前弄不清楚的問題，看了這些有點清楚。那份《新青年》五月號，1919年五月號——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還登載了其他的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和各種思想。《每週評論》也談社會主義。尤其對陳獨秀提倡白話，陳獨秀跟胡適之倡議白話文。這一切對我是完全新的。第一次看了馬克思主義專號的文章談俄國，介紹俄國文章，完全是新的社會主義。認為舊文章不應當。年輕人、小孩要把文章讀好，要讀十年八年。我覺白話文很簡單。所以那一年，我就提倡新文化。我在學校教孩子

學白話文。當然其他的教員還是教古文。我鼓勵學生到外地去讀書。我的學生很多，當然那些學生相信我。1919年完了，我決心離開學校到邵陽去。我的思想很複雜，有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我覺得社會要改造，所以我是第一個要徹底改造的。為了做這事情，我不能在學校。有朋友跟我說，我們辦一個山莊也好，無政府主義的山莊。我覺得有意思，但何來土地呢？用什麼來做房子呢？我也考慮過這些問題，1920年春，我決心離開我的家鄉。因我教書有點錢作路費，我就不再管父親和外公了。

那一年的初春，另外一個同事學校的校長，他要到外地去，他是地主，有兩個學生，也是那學校畢業的。1920年，我離開了家。從湘江乘船轉到長沙。隨後到武漢，我準備到北京去，可是京漢鐵路斷了，因為戰爭——割據內亂。弄得我很狼狽，沒有辦法到北京去。我妹夫在貴州做生意，他說你不能到北京去，就到我這裡來看看。我到了貴州也有好處。相近湖南，跑到貴州銅仁鎮，就是取漆的，我妹夫是開漆房的，在那裡住了一兩個月。

一位姓羅的，他在湖南長沙中學當教員。他對我很好。他是校長賀民範一位教員，是我的好朋友。我到貴州旅行的時候，跟他通信。信內有寫我的理想，發表了我的意見觀點，一種社會主義的思想。我朋友把信交給賀民範校長。賀民範看了我的信，說是社會主義者，我的朋友不很清楚。校長叫他趕快寫信，叫彭述之到長沙來。我們學校準備要組織社會主義的團體，就是組織共產黨的意思。我得了信，就從貴州到長沙。到長沙見賀民範校長，他跟我談得非常好。要先組織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因他看到我的信，知道我的意見，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我當然贊成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九月初，賀民範要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賀民範已經六十歲的老頭子，本來是日本留學的，經過辛亥革命的，他喜歡看新書新雜誌，長期看《新青年》。他學校有幾位學生後來都很出名的，他介紹他們到上海去參加

‘工讀互助團’，這些學生是上海開始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分子。當然跟陳獨秀有比較直接的聯繫。通過這些學生告訴賀民範，賀民範就直接跟陳獨秀通信。大概從1920年夏天陳獨秀跟賀民範通信。因上海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從1920年7月開始成立的，所以他知道這個情形。雖然他是個老頭、老青年，他自己也幹青年團方面的工作。我在湖南第一次才有社會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約在9月初，我跟他談論社會主義青年團。那時長沙還沒有共產黨的，上海已經有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1920年5月開始成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7月成立的。當然，長沙還沒有共產主義的組織，他和我談起，大概4、5人有這傾向，想組織一個共產主義的團體。他提到毛澤東，還有船山中學李教員。上海已經有共產主義的團體。他建議我到上海去，算是我們共產主義團體的一個發起人，所以他就寫信給上海陳獨秀。

(五) 參加共產主義小組

我在1920年9月中到上海，上海因我已是共產主義的一分子，就第一次見了陳望道。陳望道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負責人，主編《新青年》，我第一次到著名的漁陽里，後來就是共產黨組織，共產主義組織的漁陽里六號。已開始辦俄文學校。而且準備派人到俄國去。我到了，陳望道就安排我(大概有十幾、二十年輕人)去學俄文。俄文的教師就是楊明齋是山東人，在俄國加入共產黨，給魏金斯基做翻譯。我學俄文差不多半年。每星期有會議，會議是共產黨方面跟青年團方面一起討論各種問題。最普通的關於青年人的、社會主義的問題。有一個特別組織，就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會是一些比較重要的人參加。就在漁陽里，那時住在漁陽里的有兩人，楊明齋和陳望道，在外就是李達，他是復旦大學的教授教哲學的。另一李漢俊，他

們都是上海小組的發起人。陳獨秀因住在法租界不太方便出面。法租界捕房很注意他。所以在漁陽里，共產主義小組的領導機關就是四人，經常碰頭的是陳望道、楊明齋、李漢俊和李達。他們組織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我到的時候，有兩個年輕學生也是漁陽里的學生。因我跟他談一些問題，他覺得我的瞭解程度比別人深入一點，所以，他就介紹我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該研究會每星期一次聚會，討論的是唯物史觀、歷史唯物論，討論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我們都有書本，先看了，每次討論一個問題。是中文，從日文翻譯出來的。有一本是考茨基論資本論的第一卷。我們把那本書做預備，按部就班地研究。後來，劉少奇等七人，也是賀民範介紹的，他寫信給我，要我給他們安排學俄文，到俄國去。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劉少奇是七人中的一位領袖。我看劉少奇較其他人更深入認識多，他很認真，所以我把他介紹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會內有四人是比我們長一輩的，有四個較年輕。其他人沒參加，因他們瞭解程度不足。其中有蕭山，他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最初的七人之一。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最初的七人之一，有二人是很出名的。一是任弼時，一是蕭勁光海軍部長。當然還有其他人，特別是工人運動的。這些學生是學俄文的，在漁陽里好些都在工人運動很活躍。我的湖南話不行，不懂上海話，所以我不能夠到工人運動，還有其他的人都不能夠，要懂上海話才能夠接觸工人。所以，我們沒參加工人運動，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李啟漢，他懂上海話，也是湖南人，在上海罷工，是很出名的工人運動領袖。我沒參加工人運動，專心做研究，我對研究有興趣，尤其對理論、哲學、政治學等。我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在該研究會有兩人較高修養，一是李達。李達正翻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史觀，他在復旦大學講哲學，也是日本留學生。一是李漢俊亦是日本帝國大學的畢業生。他在上海的一批領袖中是他認識較深入，因他日文很好，還懂德文、英文，所以能夠直接閱讀馬

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是很認真研究。所以，在研究會遇到難題，經濟學是李漢俊解釋，哲學是李達解釋，所以得益良多。劉少奇也很認真，不過他一般的知識水準不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剩餘價值等理論，他就不容易懂。其他人也不易懂，我倒能夠掌握，故較有興趣。當年在漁陽里，來往的有二三十人，大半是湖南人。這些都是賀民範介紹的，賀民範可說是湖南共產主義運動初期的領導發動者。他非常熱心。所以他接見青年，就把他們說服，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再介紹到上海。其餘是上海本地留俄學生，其次是浙江人。陳望道是浙江人，是浙江師範學校的教員，所以他的學生後來都轉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有其關係的。此外四安徽人，還有二江西人。主要是湖南和浙江人。

（六）到蘇聯留學

我簡單說說如何到蘇聯。先到上海，主要是想去蘇聯研究。1920年，蘇聯開辦了一間黨校東方共產主義大學。這間學校是為了蘇聯少數民族開辦的，俄國組織有很多來自東歐，像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第三國際決定，也應該為亞洲的東方民族開放。開放消息是通過魏金斯基，問中國可否派學生到俄國。魏金斯基和陳獨秀討論，陳獨秀是求之不得。就決定派年青的共產主義者到俄國留學。為這事就開辦俄文學習班。名義是外語班，並不是俄語班，因在上海必須掩飾。所以我一去就和其他人齊學俄文，後來劉少奇也學俄文，目的是俄國去。這批人都加入青年團或入黨。那時，黨最感覺是缺幹部，與歐洲和美國不同。為了未來是對的，所以要培養幹部。因我們在中國只有幾本馬克思主義的翻譯中文書，例如共產黨宣言。當時我們的英語不行，不能看書，看得很吃力。怎樣研究馬克思主義？當然到俄國去，俄國那時革命了，年青人都把俄國看成共產主義聖地。所以非常強烈要到俄國去研究。

到俄國很不容易，因俄國剛剛成立遠東蘇維埃共和國，是俄國的東方一部分。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參威，是日本軍隊控制的，一條阿木然河隔住，東邊是日本軍隊佔領，西邊是紅軍，所以到俄國是危險的。如果走滿洲方向很難，因張作霖軍閥監視很嚴。俄國同志魏金斯基認為較安全的，是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當然危險，但年青人是冒險，不管的，我把人分開，三人或者兩人一批，都裝扮工人的樣子，我和姓殷一起，其他的三兩人一起乘俄國的船到日本，在日本轉到海參威，符拉迪沃斯托克。上岸是很危險。日本人檢查很嚴厲的，我和姓殷的每人一介紹書，是魏金斯基簽名的。我們拿著信件，在俄國就得到招待，但是，上岸的時候，日本人檢查得非常嚴厲，船上的人都說，檢查是共產黨人就要拘捕，所以把信撕掉丟落海。後來便很麻煩。檢查我們，讓我們上岸。

找到一中國人開的旅館在海參威住下來，海參威有很多華僑。我們問沒有介紹信怎麼辦？要想辦法通過奧莫爾鐵橋到俄國去怎麼辦？後來就寫了篇通訊，講從上海到日本，到海參威的，寫了一首新詩，關於海上情況，投稿給海參威中國人辦的報紙。想找路線關係，投稿到報館，第二天登出，報館主編跑到旅館，我們不敢說真話，我們說到德國留學的。他很高興和很有興趣說：如果你們到德國，能給我們通訊嗎？我說可以。他是報館主編，掌握各方情形，於是把從海參威，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哈巴羅夫斯克，怎麼移轉到紅軍區，這情形讓我們知道了。

買到火車票，到哈巴羅夫斯克。哈巴羅夫斯克就是黑河。到了黑河車站，上車就有問題，因為身份是到莫斯科學習的。但證件呢？我們告訴他，怕日本人檢查，撕掉了，當局把我們軟禁起來，不許動。因我們的俄文不行，跟俄國人交涉不清楚，簡單的話可以說一說，但解釋就不行。

所以，車站的職員找華僑翻譯。我們告訴他，我們的情形，他說，你們還有幾個人在前面去了。我說，是的。所以那個車站的職員告訴他說：

“OK”，於是我們和幾個中國人還沒走，如劉少奇他們還沒走，他們在我們前面便算通過了。麻煩在哈巴羅夫斯克有華僑工會，要人去辦報紙，同志要到莫斯科的，大家推我來辦報，我就住下來一兩個月辦報。在西伯利亞的紅軍又派人來，紅軍要中國人參加紅軍工作，工會便解除我工作。我離開哈巴羅夫斯克的一個城市。那裡有幾百人的中國軍隊，也有幾百人北韓軍隊，正在組織訓練。所以西伯利亞的紅軍，總司令甘達施負責的。還有一個政委負責教育。所以要我們做教育工作。這些軍隊都是中國東三省人。他們還有紅鬍子，紅鬍子就是地痞流氓，他們什麼都做，包括強盜。我和姓殷的住了一兩個月，每星期對中國的軍隊講話，從最簡單的共產主義告訴他們。不過也知道他們要革命，他們都是貧農失業的，是北方的真正低下階層人。但到了1921年7、8月間，莫斯科有一命令，停止中國的紅軍和北韓軍。因當時俄國已經跟日本講和了。日本的軍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準備撤退，我們這支專門對付日本軍隊就不需要了，我們當然也不需要在那裡做政治工作。那時就要我們到莫斯科。起初到庫斯克，因庫斯克設有遠東局，管理東方的運動。大概在8月底9月初，遠東局把我們送到莫斯科。第一次到莫斯科，有人報告俄國人叫他們招待我們。我們就直接到東方大學留學。

(七) 在東方大學

到東方大學的中國人有二十個以上，這批人分成兩派系，有五個人中一人說俄文很好。他跟學校接觸買食物，辦交涉等等。那時候是饑荒最厲害的時候，沒東西吃，吃得很壞。所以，麵包吃不飽和非常苦的。

一位姓涂的領兩份，他也節省地給別人吃。但其他人一看便反對，弄得很壞。事實上，不一定領麵包的人特別壞，不過這也證明，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制度，也有官僚腐化的機會，他們五

人，對領麵包的事情，促使其他人反對，這情況非常壞，很難調解，所以，我出現，就很多人跟我說，像劉少奇一批人，還有其他的人。我就找他們商量，那領雙份麵包的人要公開說出來是個錯誤，不應該的；他們認錯就算，不是很大的政治問題。一點物質問題。所以我把糾紛解決了。

我來到前，沒有組織，全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中有少數是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沒有組織，我覺得情形不對，把團員在莫斯科組織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制度，後來變成黨員，是共產國際允許的。我們中國人俄文不懂，不能參加俄國的黨。後來我被大家推舉來做書記，是黨團書記，黨跟團的。我把好的和壞的條件都說出來讓大家研究。告訴他們，我們來幹什麼的？我們來學習馬克思主義，將來要改造中國，說一般的道理。大家當然明白。我們要認真學習。首先學俄文，再學其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哲學、西方文明史、俄國共產黨史。這樣便沒有22我們討論中國問題，討論世界的政治經濟局勢。當然是很緊張的。但是物質生活非常壞吃不飽，各人都有病，我有肺病，營養不良，但我們很用功，學習很緊張，所以一些人的身體很衰弱。

俄國最壞的情況是1920、21年饑荒，內戰剛剛停止。沒有生產，新建的經濟政策在1921年3月剛剛通過，還沒實現。加上頓河流域大饑荒，數以萬計的人死去，還有美國的胡佛（後來做了總統），他就是去放債給俄國，他出名了便當選總統。他帶了幾百萬美金來放債。這是非常重大的事，這情形到了1922年秋天，收成才好一點。新經濟政策實現了，所以情形就好。到1923、24年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在1924年我回國時，經濟恢復得很快，是由於新經濟政策的結果。

所以我在那裡很苦，每個人都是，有病的。所以有些人不願意學下去了，要回國，怕留在那裡要死去，要餓死，生病。劉少奇和蕭勁光一批人要回國工作。在1922年暑假，他們大批人回到國內，留下的是少數人。我也是留下的。1922年末、23年初，陳獨秀出席了共產國際第四次代

表大會。陳獨秀跟我談到歐洲的學生。那時在歐洲，主要是法國、比利時、德國，大約有上百人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1921年自己成立的。成立組織的發起人是蔡和森、汪澤楷、陳延年、周恩來、任卓宣即葉青這批人。那時在德國不過六、七人，就是周恩來、朱德們在德國柏林。陳獨秀跟我談起，要怎樣使法國的、比利時的、德國的那些年青人，除了朱德是老人，願意到東方大學學習，於是他就建議把莫斯科的中國支部，變成歐洲的聯絡支部，同法國巴黎的支部、柏林的支部人通信。因我是莫斯科支部書記，於是就設法和巴黎的支部、柏林的支部通信，與他們討論，能否派人到莫斯科來學習。這是陳獨秀認為有必要的。

所以，從1923年1月份開始，我就寫信到巴黎，那時巴黎負責任的是陳延年，陳獨秀的大兒子在讀書。於是他帶了約十幾二十人，從法國到莫斯科。這些人很多後來都是出名的人士。像陳延年、陳喬年是最出名的。我同歐洲的關係密切是由這而起的，一直到我最後離開莫斯科，我和德國負責的書記、巴黎的婦女工作等人保持通信。後來，他們都大批到莫斯科去。只有少數人不到莫斯科，直接到中國待命。以後的東方大學人數越來越多，一方面是歐洲來的；一方面是國內去的，像1924年下半年陳碧蘭到莫斯科，已經有上百同志。我在時最多不過四十人，後來的人更多在那裡學習，都是一般的功課、歷史唯物論、經濟學、西方的革命運動史、俄國的工人運動史，一般都是這樣。當然是一般性，不過對中國人來說是有用的，那些教學雖然不是很好，但他們畢竟懂得多了，他們有系統地講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以對任何國家的幫助都很大的。當然，初步的自己也可以研究，自己學習，日後就更有用了。

我在莫斯科對一些重要的事情，是共產國際的第四次大會、第五次大會及1923年開始的托洛茨基跟斯大林的鬥爭，當然還有1923年德國的革命。

在1921年底1922年初有一個遠東勞動委員會的會議，就是遠東的勞動者革命的代表會議，包括了日本、中國、越南、印尼、北韓，正當巴庫會議後召開，這個會議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是各民族的、民族主義者、民主主義者都可以參加，所以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人、當然也有中國共產黨員、有無政府主義者。日本、北韓也差不多，不一定是共產黨，不過中國共產黨代表有三個，張國燾就是出席的代表之一。我是東方大學的學生代表參加會議。會議在莫斯科召開的。後來到彼得格勒去旅行。這個會議，多少有一點影響，就是把東方的各民族的革命分子，給他們一個聯絡，把共產國際的第二次大會的決議所表示的，告訴這些代表。主持這個會議的是薩法羅夫，他是共產國際內東方局的主任。薩法羅夫，在俄國很出名。第二個是辛格勒·布哈林。不過會議叫我當時參加是有一些意思，但沒多大作用。因參加會議的，像國民黨的人、像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沒訓練，北韓人也是如此。

第二次是1922年末，23年初，陳獨秀參加第四次代表大會，我沒參加，因我不是代表。只是旁聽的。當然該會議本身是很有意思的。因這是跟第三次大會來的，討論最具體的策略問題。這對後來的共產國際的發展很有意義。第二次大會是討論原則的問題、戰略和策略的問題，不過我沒參加，但知道情況。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23年，第一是1923年5月開始的德國革命，到10月完了，這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在這個革命開始以後，俄國的工人群眾是非常的興奮，因為希望西方有個革命的先例，俄國還是很窮、落後的。所以莫斯科、其他的城市，希望看到5月的德國革命，非常的狂熱。像我們那一年開始做指導員。我那時開始學德文。東方大學有個德文班，凡是願意到德國去幹革命工作的人，可以學德文。我第一次學德文，想到德國去。一般人對德國的革命很嚮往和非常高興，普通群眾、工人都希望德國革命勝利，我們蘇聯就有希望，寄望在德國革命上。但到了1923年9月10月，革命失敗了。我

不說這革命失敗的原因，太多了，有很多書籍提到的。像杜契也提到這事，他寫得很好。那時我們還不能夠瞭解，這個革命為什麼失敗？因為我們只看到，拉狄克那時候非常的出頭，《真理報》都見到，拉狄克是德國的列寧。革命一失敗，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很失望，有許多過分熱心的人沒有希望。德國革命在1923年失敗，對於蘇聯是嚴重打擊，有助官僚、斯大林主義的興起，因為群眾變得冷淡失望。（待續）



Living Proof of Revival of Capitalism in China

Zhang Kai

China's economy has bloomed for over 30 years since its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 door. China is ranked Top 2 economic entity in the world. Unfortunately, public ownership,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the main sector of economy, is gradually surpassed by non-public ownership. There has not been any relevant data in official document until *Nanfang Daily*, dated 11 March (quoted by *Wen Wei Po*, dated 12 March), discloses the truth. The article states that the non-public ownership of economy has started from nothing, then from weak to strong, and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Nowadays, the non-public ownership accounts for over 90% of the main sector of market economy, produces over 60% of GDP, over 80% of employment, over 65% of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over 67%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article continues: due to those great achievements, we have no reason to change the current policy; in order to build a general well-off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mobilize different sectors of society. 'Any idea of negating public ownership or non-public ownership is all wrong, as it is not compatibl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or to the requirements of development.'

The above figures show that the sector of public ownership, which was emphasized by CPC, is no longer the main sector of economy. It accounts for less than 10% of the market, produces less than 40% of GDP, less than 35% of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less than 20% of employment.

It seem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reluctant to disclose those figures which may bring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sector of public ownership. However, what *Nanfang Daily* has disclosed clearly proves that public ownership is no longer the main sector, and the authorities have also provided the non-public ownership a policy of development regulation. Ironically, it reiterates that 'keeping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stay of the economy and allowing diverse forms of ownership to develop side by side which is the basic system of economy', and "unswervingly encourage, support, and guide non-public ownership, which is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policy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quoted from *Wen Wei Po*, dated 12 March). The sector of non-public ownership has developed stronger than the public ownership. The latter is suppressed by the system of privatization. China is reinforced to become a capitalist country. It is tragic for CPC to make China develop like that. The last quotation of "the idea of negating non-public ownership", discloses that there is disagreement to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ector of non-public ownership. In reality, China has already become a capitalist country with the system of privatization revived and even dominant. However, the CPC still claims that Chin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in November 2015,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Proposal on Formulating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2016-2020)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ates that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reiterates adherence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is absolutely not socialism that Marxism proposes with public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materials being the basic system. The socialist system is to abolish exploitation, to implement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deeds" at the primary stage, and then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Nowadays, what China has carried out is absolutely not socialism, but the revival of capitalist system. China has never realized the state of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as there are massive unemployment and semi unemployment. The policy line of CPC has given up socialism, but it still insists to usurp the name of 'socialism'. It is indeed a grave mistake and a betrayal!

1 May 2016

The Difficulties of Tackling Soil Pollution in China

Qing Yan

Chen Nengchang,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Guangdong Institute of Eco-environment and Soil Sciences, points out that for the last 30 years,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soil problem: soil erosion, soil pollution, and soil degradation. The last two problem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soil qual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have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resolution measures are not well established, which made soil pollution become worse. In addition, a change of use of fertilizers (from organic fertilizers to chemical fertilizers), abuses of fertilizers, herbicides and pesticides, lots of plastic sheeting, among others, have caused soil deteriorating, high acidity, hardening, and the imbalance of nutrients and microorganisms. This has led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deteriorating quality of farm products, low production, and high amount of heavy metal.

Since 1994, the NPC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Committee has concerned with the legislation of prevention of soil pollution. In December 2004,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issued a report on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Soil Quality and Specific Task of Preventing Pollution”. In early 2005,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vided specific fund to support the task.

From April 2005 to December 2013, China has started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soil pollution. In April 2014, Communiqué of Investigation of National Soil Pollution was issued, which covered all arable land, parts of forestry, grassland, unus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with a total of around 6.3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It stated that “in general, the situation of soil environment is not optimistic. Some regions of land are seriously polluted, the quality of arable land is terrible, waste land of industrial and mining areas are clearly problematic.....The degree of soil pollution has four categories: slight pollution, 11.2%; light pollution, 2.3%; medium pollution, 1.5%; and serious pollution, 1.1%.....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pollution, the land in the south is more serious than the north.”

In 2011, the news report of “The Cadmium-polluted Rice”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about soil pollution and its legislation. On 28 May 2016, the State Council released Soil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ion Plan, or “Ten Clauses on Soil” which clearly states that a worsening of soil pollution will be brought under initial control by 2020; and that soil quality nationwide will be stabilized or improved by 2030. By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China’s soil would be required to show an overall improvement.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90% of China’s polluted land (including arable land and other types) must be made safe to use, with that figure required to rise to 95% by 2030.

Lack of data

Chen Nengchang remarks that soil is rare and strategic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base of national and human livelihood. However, in the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we do not pay enough respects to soil; when we face the question of soil governance, we do not have basic understanding about soil. He explains that in principle, two question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One, the degree of seriousness of soil pollution; second, the use of land after soil improvement. Soil is a highly imbalanced and complicated system. Firstly, we should conduct scientific analysis of soil structure, micro-organisms, among others. Based on the result, we should design different strategies and goals for different areas. Generally speaking, if the land is used for crop production and involved in human food chain, we should raise the standard of regulation. Now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soil management in respect of ecology. In actual cases, we should also consid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specific areas, and the effects on specific food chain. In

China, the current standard of soil quality was set in 1995. Although some standards are very loose (such as lead), it is the most rigid standard of the world (particularly cadmium and merc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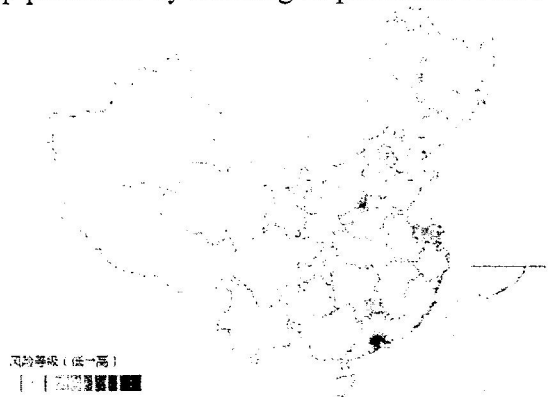
He thinks that there are good suggestions of macro-framework of the Plan, for example, the establishment of surveillance network on soil pollution, different managements of arable lan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seriousness, reinforcement of protection of unpolluted land, among others. However, the key point is that there is lack of data about soil pollution, such as the scale of polluted land and their locations, the scale of polluted land with “safe use”. So he cannot predict the workload and the difficulty of feasibilities.

There are no accurate figures in the 2014 Communiqué so the reality of soil pollution is still unknown. After the incident of soil pollution at Changzhou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in April 2016, Chen Jining, the minister of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clare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national soil pollution. The first clause of “Ten Clauses on Soil” mentions the tasks to investigate the scale of polluted arable land, distribution, and the impacts on farm products before 2018; to identify the distributions of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of polluted land caused by large enterprises before 2020.

After the Changzhou scandal, 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PE) published a map of soil pollution risk – the first such map to b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n China. The IPE produced its map by filtering its pollution database, identifying 4,500 companies in 13 polluting industries such as chemicals, mining and metals. Of these, 3,998 were state-controlled and 502 non-state controlled, and 729 industrial zones home to the same industries. These locations were then marked on a map of China.



Map produced by filtering of pollution source data. Source: IPE



Map of levels of risk, based on locations of 4,500 companies in key industries and over 700 industrial zones. Source: IP

Hugh costs of Improvement

Another challenge to soil improvement is the cost. Zhang Junjie, assistant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argues that the Plan's principles of "polluter pays" and lifetime liability for pollution should be made as powerful as those in the US Superfund law. However, the Plan does not specify what form that liability takes (on which companies should contribute to a clean-up fund, to hire a third party to carry out remedy) so further discussion is needed. Meanwhile, Ma Jun of IPE, is worried that the existing regulation, which makes the purchaser of a site liable for historical pollution, could be a loophole that companies could exploit if they are unabl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Existing regulations might also make it possible for companies to opt for bankruptcy and avoid paying for a big clean-up, which would require the government to step in.

The Heavy Metal Pollution Fund was set up in 2010 and has received billions of yuan in funding every year, with a sharp increase last year, to over 9 billion yuan (US\$1.36 billion). However, that pot of cash is deemed insufficient to deal with the huge scale of the problem. This is tiny in comparison with the trillions of yuan that is needed to clean up soil pollution. The action plan calls for more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he use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but as yet there are no specific programmes for doing this. Currently it is unclear to what degree the private sector will be involved.

Chen Huaiman, a well-known soil scientist and a senior researcher of Nanjing Soi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s, remarks that only the government can put "Ten Clauses on Soil" into practice. He explain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surveillance network of soil quality should be reliable to the grassroots units. Over the whole country,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its surveillance units,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has its agro-environmental units and soil fertility units. The main issue is how they can implement their obligations and how they can join and work together. This is indeed a task of government.

In general, the seriously polluted land is seldom caused by peasants themselves. The origins of pollution are always due to factories or mining.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a compensation system that the government pays the right of land use and carries out the principle of "who pollutes, who pays". Only the government can put the policy into effective use.

Sources:

- (1) Well-known Soil Scientist Chen Huaiman: "Ten Clauses on Soil" are very accurate, but is there any problem of implementation?", 4 June 2016, *Soil Watch*, quoted from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 June 2016.
- (2) Chang Chun, " 'Ten Clauses on Soil' is issued, does it mean the problem is resolved?", *Chinadialogue*, 14 June 2016.
- (3) From "The Cadmium-polluted Rice" to "Ten Clauses on Soil", 19 January 2016, *Soil Watch*, quoted from *Landscape Design Studies* (Volume 3, no. 6, 2015).

Hong Kong

- 2 Support Lam Wing Kei, Defend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and human rights..... Zheng Yan
- 3 Memorial in Hong Kong of the 27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Fourth Massacre..... Jun Xing
- 4 Touching the stone across the river ? Da Jin
- 5 “I Resist, I Exist” Words of Thank You (reprint)..... Leung Kwok Hung (Long Hair)

China

- 6 Living proof of revival of capitalism in China..... Zhang Kai
- 7 CPC reinforces control of Internet..... Lau Shan Ching
- 10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 should fight against China’s Organization Law on Overseas NGOs (reprint)..... Lau Shan Ching
- 11 The difficulties of tackling soil pollution in China..... Qing Yan

International

- 13 After 5 Years: The truth of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Po Mi
- 16 Climate: disaster is on its way!..... FI Bureau
- 18 Confronted by the ecological emergency..... Daniel Tanuro
- 2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in South Africa..... Jacklyn Cock
- 29 A brief history of ISIS..... Adam Hanieh
- 37 Turkey resumes its war against the Kurds..... Phil Hearse, Sarah Parker
- 42 What if the Greek government had heeded the Truth Committee’s recommendations?..... Éric Toussaint

Poetry

- 45 Nonsense talk and nostalgia..... Xiong Andong
- 46 Nonsense talk by 90-year-old Xiao Zhou..... Zhou Luqiang
- 47 This moment (reprint)..... Wei Sheng

Book Review

- 48 Luo Fu and “History and Memory: Collections of Last Years of Zheng Chaolin”..... Zhou Luqiang

Memoir

- 49 Recounting my life encounters (part 1) Peng Shuzhi

Article in English

- 59 Living proof of revival of capitalism in China..... Zhang Kai
- 60 The difficulties of tackling soil pollution in China..... Qing Yan

香港	2	支持林榮基，捍衛言論、出版、人身等自由！.....	振言
	3	悼念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在香港.....	軍行
	4	摸著石頭過河？.....	大進
	5	《我反抗故我在》謝辭 (轉載).....	梁國雄(長毛)
中國	6	中國資本主義復活證據明確.....	張開
	7	中共加強控制網絡.....	劉山青
	10	對中國境外非政府組織法，社聯應據理力爭(轉載).....	劉山青
	11	中國治理土壤污染難度.....	青岩
國際	13	五年之後：福島核輻射泄漏遺害真相.....	破謎
	16	氣候災難逼近！.....	第四國際書記局
	18	面臨生態緊急危機.....	丹尼爾·坦努落
	25	南非的食物政治經濟學.....	傑克琳·科克
	29	伊斯蘭國簡史.....	亞當·漢尼
	37	土耳其重啟對庫爾德人的戰爭.....	菲爾·赫爾瑟、撒拉·派克
	42	如果希臘政府聽取了真相委員會的建議會如何？.....	埃裡克·杜桑
詩	45	胡謔叙懷.....	熊安東
	46	九十小周胡謔.....	周履鏘
	47	此刻(轉載).....	尾生
書介	48	羅孚和《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	周履鏘
回憶	49	我的一生經歷憶述(一).....	彭述之
英譯	59	Living proof of revival of capitalism in China.....	Zhang Kai
	60	The difficulties of tackling soil pollution in China.....	Qing Yan